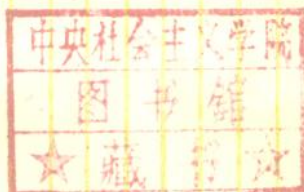


毛泽东哲学思想二十讲



山西人民出版社

A841.63/2

5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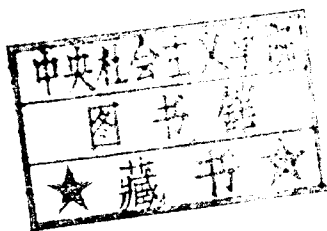
D620.63

毛泽东哲学思想二十讲

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



200016730



山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二十讲
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井州路十三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625 字数：236千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

书号：2088·82 定价：0.88元

编 者 的 话

我们这本书是专为广大干部和职工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而编写的辅导读物和参考材料。

毛泽东哲学思想除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专著中外，还贯穿于他的其他一系列著作中。本书只着重讲解八篇，即《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

本书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原理的专题讲解。讲解方法基本上按照《实践论》、《矛盾论》原著的结构顺序，分专题进行解说。第二部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军事战略指导上的运用和发挥。内容包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些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范例。为了集中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军事战略中的运用和发挥，没有按照四篇著作逐篇讲解，而采取从中抽出重要专题进行讲解的方法。为阅读原著时参考的方便，每个专题下面都注有“阅读书目”。第三部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运用和发挥。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编写的方法与第二部分相同。第四部分是参考材料。考虑到按专题讲解不便于讲明写作每篇著作时的历史背景，而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又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部分首先简要地介绍了八篇著作的历

史背景。其次还考虑到八篇著作中有些重要名词、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有关人物，有的在《毛泽东选集》中已作了注释，有的还没有，而对广大读者阅读原著来说，加以注释又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在这部分编写了重要名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注释，以供读者参考。

为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本书在专题讲解中，注意突出重点，并力求联系实际，通俗易懂。讲解原理时，注意吸收了现代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注意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在编写参考材料部分时，注意了紧扣原著和上下文的衔接，以便于读者加深对原著的理解。

本书是在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领导下由理论研究室的同志集体编写的。参加编写的有：吕华、阎光田、谢文德、贾志谊、申存良、时新、晋兴虎、刘新春、毛月平、高正献、陈坤石、杨开山、石亚兰、黄征等同志。由陈斌同志审稿。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以时间紧迫，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和方法论·····	(1)
--------------	-------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几个基本原理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

和基本的观点·····	(15)
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	(27)
真理是客观的，又是相对的和绝对的·····	(39)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49)
事物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	(59)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70)
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85)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98)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110)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战争战略中的运用和发挥

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注重研究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117)
把握战略全局，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	(128)
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的实在情况·····	(138)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光	
辉范例·····	(146)
根据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及时实行战略转移·····	(156)
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把游击战争	
放在战略地位来考察·····	(166)
持久战及其结局的英明预见来自对客观矛盾	
的科学分析·····	(178)
正确分析中日双方力量的消长,把握持久战	
的发展趋势·····	(190)
重视发挥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	(197)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206)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革命实践中的应用和发挥

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原	
理的光辉典范·····	(215)
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实际出发,创立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理论·····	(225)
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	
制定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235)

附录

《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背景·····	(248)
《实践论》注释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	(251)
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	
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	(251)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	

品格, 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252)
认识的感性阶段·····	(253)
理性认识·····	(253)
感觉·····	(253)
印象·····	(253)
突变(飞跃)·····	(253)
论理(逻辑)·····	(254)
概念·····	(254)
判断·····	(254)
推理·····	(255)
思维·····	(255)
科学的抽象·····	(255)
自在的阶级·····	(255)
自为的阶级·····	(256)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笼统的排外主义·····	(256)
唯理论·····	(257)
经验论·····	(257)
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	(258)
机械唯物论·····	(258)
知行统一观·····	(258)

《矛盾论》注释

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260)
宇宙观·····	(260)
德波林学派·····	(261)
形而上学(玄学)·····	(261)
庸俗的进化论·····	(262)
内因和外因·····	(262)
古代的辩证法·····	(263)
黑格尔的辩证法·····	(263)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	(264)
第三等级·····	(264)
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	(264)
新军阀战争·····	(265)
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	(266)
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	(267)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267)
土地革命战争·····	(267)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268)
陈独秀主义·····	(269)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	(269)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	(270)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	(270)
平衡论(均衡论)·····	(270)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271)
巴黎公社·····	(272)
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和社会主义的联系·····	(272)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历史背景·····	(27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释	
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277)
战略、战役、战术·····	(277)
持久战·····	(278)
速决战·····	(278)
阵地战·····	(278)
运动战·····	(279)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80)
苏联内战·····	(280)
游击主义·····	(281)

两个拳头主义·····	(281)
“围剿”和反“围剿”·····	(281)
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282)
战略防御·····	(282)
战略进攻·····	(282)
湘赣边区的三次“围剿”·····	(283)
福建的两次“围剿”·····	(283)
军事冒险主义主张的“御敌于国门之外”·····	(284)
曹刿·····	(284)
立三路线以前的党中央·····	(285)
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285)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285)
孙子所谓“示形”·····	(285)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286)
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	(286)
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 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 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286)
堡垒主义·····	(287)
灭此朝食·····	(287)
福建事变·····	(288)
歼灭战·····	(288)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 的历史背景·····	(289)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注释	
元朝灭宋·····	(291)
清朝灭明·····	(291)
英国占领北美和印度·····	(292)
拉丁系国家占领中南美·····	(293)

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	(293)
历史上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	(293)
《论持久战》注释	
亡国论、速胜论·····	(295)
上海战争·····	(295)
徐州战役·····	(296)
汉奸托派·····	(296)
芦沟桥事变·····	(296)
西安事变·····	(296)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297)
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297)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经验·····	(298)
流年·····	(298)
张伯伦的“现实主义”·····	(298)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99)
抗战建国纲领·····	(299)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	(299)
盖然性·····	(300)
消耗战·····	(300)
李服膺·····	(300)
韩复榘·····	(301)
南京失陷·····	(301)
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	
具备马德里的条件·····	(301)
《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历史背景 ·····	(303)
《战争和战略问题》注释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	(306)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	(306)

《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背景·····	(307)
--------------------	---------

《新民主主义论》注释

观念形态·····	(309)
-----------	---------

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和新范畴的民主主义·····	(309)
------------------------	---------

社会形态·····	(310)
-----------	---------

中法战争·····	(310)
-----------	---------

国体·····	(310)
---------	---------

政体·····	(311)
---------	---------

节制资本·····	(311)
-----------	---------

平均地权·····	(311)
-----------	---------

基马尔主义·····	(312)
------------	---------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 《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	(312)
---	---------

人莫予毒·····	(313)
-----------	---------

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313)
------------------------------	---------

民生史观·····	(314)
-----------	---------

平民文学·····	(314)
-----------	---------

叶青、张君勱等人的反动·····	(314)
------------------	---------

《论联合政府》的历史背景·····	(315)
-------------------	---------

《论联合政府》注释

法西斯·····	(317)
----------	---------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	(317)
-------------------------------	---------

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	(317)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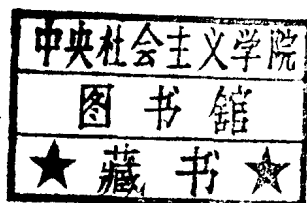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	(318)
-----------------------------	---------

一九三三年在热河、察哈尔的抗日同盟军·····	(318)
-------------------------	---------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国民党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	(319)
-------------------------------	---------

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 的全国代表会议·····	(319)
---	---------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	(320)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	(320)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	(321)
曲线救国·····	(321)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	(321)
先亚后欧论·····	(322)
一九四四年九月的国民参政会·····	(322)
训政·····	(323)
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	(323)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	(324)
中国民主同盟·····	(324)
二五减租·····	(324)
国民党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	(325)
国民党一九四四年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 件及对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	(325)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 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充分认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大意义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全党干部都要普遍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党中央的这一号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的行动总是受一定的世界观支配的，想问题、做工作都有一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人人都有的，差别只是坚持正确的，还是坚持错误的；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世界观是人们对于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看法，用世界观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一般来说，对世界的基本观点怎样，观察问题、做工作的根本方法也就怎样。用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便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便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方法论。我们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毛泽东同志是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光辉榜样。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奋斗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他不仅为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抓住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点，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于他的全部革命活动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一整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加完善，更加具体化，和党的各项工作更加有机地融合了起来。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永远是我们党根本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其它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教材。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

我国革命实践一再证明，无产阶级一刻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当我们什么时候较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革命事业就胜利，就前进；什么时候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甚至在实践中背离了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受挫折，甚至暂时失败。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尤其重要的是要全党干部从世界观的高度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彻底清扫“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人们思想上造成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灰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我们党曾经同党内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作过艰苦的斗争，在斗争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国以后，党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同时也犯了一些错误，甚至在一个时期内犯了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在我们的错误教训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就是从哲学上看，大多集中在能否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究竟是形而上学地观察和处理问题，还是辩证地观察和处理问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党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严重地歪曲和篡改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破坏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人们的思想方式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甚至有极个别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毛泽东思想竟然发生怀疑和动摇。粉碎“四人帮”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经验，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从而也就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但是必须看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并不能代替我们每一个同志亲自总结经验教训。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了解某些具体历史结论，不从世界观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使认识来一次飞跃，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接受“前车之鉴”的教训。甚至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用主观片面性反对主观片面性。这样，我们纠正了旧的主观主义，还会冒出新的主观主义。为什么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人就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我们批判了“精神万能论”，有人就贬低精神的作用，企图削弱或取消政治思想工作，搞“一

切向钱看”；为什么我们批判了“穷过渡”，有人又否定我党在五十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甚至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为什么在我们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时候，有人又否定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这个客观事实；为什么我们强调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人又提出不要党的领导，不要集中，搞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还做得很不够，很需要通过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我们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重要途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离不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叫做思想方法；改造世界的方法，一般叫工作方法，对领导干部来说也叫做领导方法。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现代化建设和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等各方面的重要任务。这就更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否则，即使有良好的工作愿望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要注意工作方法，认真解决好“船”和“桥”的问题。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如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群众路线，一切经过试验，点面结合，解剖麻雀，两分法等等。这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具体化。特别是他把认识论原理，引入工作实践，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这是直接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为哲学基础的。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无法掌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有的同志没有做好工作，总以为仅仅是个方法问题。其实，根本原因还是个世界观问

题，是没有能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 and 解决方法问题，因而他们也就不能较好地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十分宏伟、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我们面前必然会遇到许多过去不熟悉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而研究和解决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主观认识和客观规律关系的过程，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实践的过程。如果说总结过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那末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就更加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怎样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怎样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怎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今后二十年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而奋斗，怎样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怎样理解建设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怎样处理好四个现代化中各方面的矛盾，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等等。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我们去研究和解决。所以，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所做的理论概括。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又是多方面的，对不同方面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就形

成了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例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等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它是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各方面内容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比毛泽东思想的其它内容，更加深刻地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基本的特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既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简单转述，也不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重新创造。它是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因此，我们既不能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看成是两种哲学体系；又不能简单地把两者等同起来，看成完全是一个东西。我们必须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运用这些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所以具有这样的基本特点，主要是由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已经创立。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使命，不是重新创造一种哲学体系，而是解决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它是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他们当时的革命实践活动又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不能照搬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就必然会产生上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

既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在这个相结合的过程中同时也还产生了一些其它具体特点。

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来看，毛泽东同志不仅在他的哲学专著《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在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的过程中，还提出一整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具体化了。这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和概念，也不是一些具体方法，而是一种带有丰富哲学思想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它们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重要哲学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它主要不是同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斗争，而主要是同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斗争，即同表现为“左”的或右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因此，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突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坚决反对那种以主观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47页。

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为特征的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

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表达形式来看，它继承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理论思维的优良传统，具有中华民族的气派、风格、语言，可以说它是用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语言和经验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民族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些特点说明，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可以一般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活生生的运用。这就有助于我们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我们的亲身经历，具体地、生动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要着重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八篇著作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贯穿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革命活动和全部科学著作中，而在他八篇重要著作中体现得更加集中，论述得更加系统。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就要着重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八篇重要著作。

毛泽东同志的八篇重要著作，不仅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成熟、在实践中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较完备地包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原理，同时还具有在实践中成功地运用这些原理的鲜明特色。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解决中

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具有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哲学观点，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阐发的一些重要哲学思想，如：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注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的主要方法；把握战略全局，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等，都已经包含着后来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可以说，这篇著作是《实践论》、《矛盾论》的雏型和理论准备，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和八月。这两篇哲学专著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成熟、形成科学体系的重要标志。这两篇著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从军事角度论述的许多重要思想，进一步做了哲学的概括，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使之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论述。

《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都写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五篇著作，连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起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是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这些著作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中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其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军事领域中的灵活运用；

《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自觉运用。毛泽东同志在这些运用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实践论》、《矛盾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这几篇著作中的许多光辉思想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实践论》、《矛盾论》中达到成熟以后，并没有停止不前，在他以后的许多著作中又逐步为这一科学体系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这几篇重要著作同样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以上八篇重要著作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所占的这种重要地位以及它们所具有的那种注重运用的鲜明特点，决定了学习这八篇重要著作对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有重要作用。首先，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概况。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每一革命阶段上，是如何依赖于革命实践逐步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完善起来的，懂得毛泽东同志在各个时期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哪些新的内容。这样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其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学习这八篇重要著作还便于我们集中地系统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毛泽东哲学思想包括认识论、辩证法、军事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这几方面的主要内容；当然不限于这些内容。而《实践论》和《矛盾论》就集中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四篇军事著作生动地反映了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集中阐发。所以学习八篇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基本上能使我们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原理和内容。而更为重要的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八篇著作，能使我们学会在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

思主义哲学原理。建国以来，我们曾多次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但是学习毛泽东同志是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这些原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我们却注意不够。毛泽东同志这八篇著作中的六篇都具有鲜明的运用特点。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水乳交融，树立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典范。学习这八篇著作，必将有助于克服多年来学哲学中存在的只会学习原理，不会自觉运用的不足，把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坚持革命的学风

建国以来，在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怎样才能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收到明显的效果呢？端正学风是最重要的一环，是关系到能否学好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键。我们只有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要求的那样，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原理和科学体系，着重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坚持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方向。

要端正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风，首先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指导作用。如上所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不仅仅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本人的哲学观点，而且关系到我们现在和今后应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极其严肃和科学的态度，

绝对不能随意地和轻率地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哲学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有的同志在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和哲学观点的时候，武断地贬低和指责毛泽东同志的许多科学命题，轻率地否定它的科学含义和指导意义。有的甚至得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过时了的错误结论。在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反对和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就难以使学习坚持下去，深入下去。诚然，毛泽东哲学思想决不是象林彪等鼓吹的那种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另外一个“体系”，决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毛泽东哲学思想并没有封闭和终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我们在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并不反对对毛泽东同志的某些观点和提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使之更加科学更加完善。但是这种研究和讨论应当是十分严肃和慎重的，应当是有充分的理论论证和大量的事实根据的，更不能因这种研究和讨论而否定和贬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在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及时地防止和排除“顶峰论”和“贬低说”这两种倾向对学习的干扰，才能使学习沿着正确的轨道深入发展。

要端正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风，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我们党历来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受到了严重的歪曲和破坏。主要表现为，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既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也存在着曲解理论联系实际，搞所谓“立竿见影”的错误倾向。在这两种倾向特别是后一种倾向的影响下，有些同志在学习理论的时候，总想企图从书本上找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和具体办法，否则他们就认为这是理论脱离实际，就是理论无用。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大部分是在民

主革命时期写的，许多哲学思想又反映在军事著作中和政治著作中，在学习中，必然会遇到认为“远水不解近渴”、“战争问题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沾边”等类的思想认识。为此，必须在学习中引导大家正确理解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反复讲清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目的和意义。要使大家明确，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并不表现为能给各项具体工作提供现成的答案，而在于它为人们揭示了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给人们提供了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这种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学习它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为搞好各项工作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写的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就决不是离题太远，决不是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沾边”。毛泽东同志在这些著作中阐发的许多哲学观点，特别是它注重运用的鲜明特色，将对我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有极为重要的启示。因此，那种认为学习军事著作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无关的认识是十分错误的。需要我们在学习中努力加以克服。

要端正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风，还应当把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学习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战争史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书斋里的哲学，不是脱离实际的哲学观点的拼凑，而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每一哲学思想都是和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密切相联系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原理和精神实质，就要在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著作的同时，结合学习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战争史。学习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

加深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原理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还可以使我们学到毛泽东同志运用哲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和方法。只有这样学习，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几个基本原理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一篇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的最本质的特征是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认为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最根本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从认识论的高度，通过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揭露了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轻视实践的认识论根源，突出地强调了充分发扬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

* 本专题阅读书目《实践论》第一自然段至第五自然段。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9—2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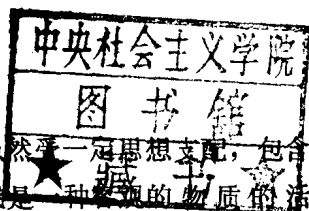
性，系统地、深刻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整个认识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以及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关系。《实践论》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奠定了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极为宝贵的理论武器。

学习《实践论》首先要着重领会实践在整个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牢固地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这既是《实践论》的根本思想，也是学好《实践论》的关键所在。

一、实践的特点和形式

实践这个概念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一些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家都已经提到过实践，但是，他们对实践这一概念都未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中国古代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修身”、“养气”、“静坐”、“致良知”等精神活动就是实践。十九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把实践仅仅理解为人们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或者看作是商人的营业牟利活动。过去的哲学家由于不能对实践作出科学的说明，因而尽管他们也提到过实践这一概念，但都看不到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只有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实践的本质，从而把人们的认识紧密地同实践联系在一起，正确地解决了认识同实践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实践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具体说来，它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点。



首先，实践是客观的活动。实践虽然受一定思想支配，包含有一些主观因素，但从本质上讲，实践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活动，而不是精神的活动。因为实践的主体、对象和手段都是可感知的客观实在；实践的结果也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实践的过程又受着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所制约。实践的目的本身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它在没有同实践结合以前，带有很大的主观任意性。然而，目的结合到实践中，构成实践的要素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实践中的目的已经受着客观规律所支配，失去了主观的任意性。所以，不能因实践中含有目的的因素就否定它的客观性。认识实践的客观性，对于正确理解实践对认识的作用非常重要。正因为实践是客观的，才能成为检验认识的标准，若否定它的客观性，就会成为主观检验主观。同样，实践能成为认识的来源，发展的动力等，都与实践的客观性息息相关。

其次，实践是能动的活动。实践的能动性主要指实践能够改造客观世界，这是人类所特有的。动物活动有时也会给自然界留下一定的痕迹，如蝗虫可以毁掉大片植物等，但这不是它们有目的有意识活动的结果，而是盲目的本能活动所带来的后果。它根本不同于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因而，能动性是区别人类实践活动和动物本能活动的重要标志之一。

再次，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实践是人的活动，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实践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受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这就是实践的社会性。当然，实践的社会性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它既指集体性的活动，也指单个人的活动，但归根结底，实践是劳动群众的社会实践。如科学家可以单个人从事科研实践，从表面看，好象是孤立活动。其实，科学家所用的仪器、资料以及生活用品等都是劳动

者集体的实践提供的。如果割断社会联系，个人的实践就无法进行，因此，个人的实践也具有社会性，是社会活动的一种表现。

与实践的社会性相联系，实践也具有历史性的特征。实践既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那么一切具体的实践的对象、手段、范围、规模和方式等就都要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并随历史条件发展而发展，这就是实践的历史性。从实践的范围来说，古代人们实践范围非常狭小，象生产活动开始仅局限于渔猎、采集的圈子里，后来逐渐扩展到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等活动中。在各种条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许多过去仅存在于想象中的领域，如太空世界，都被纳入实践的范围。

在认识实践特点的同时，还必须正确认识实践的形式。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实践的形式，同样不能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人类社会实践的内容丰富多样。毛泽东同志曾经正确地把实践的主要形式概括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实践活动。此外，还有教育、文化艺术等实践活动。在三项主要的实践活动中，生产斗争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着其它一切实践活动。因为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人们要生活，就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的问题，而这些都是离不开生产实践的。没有生产实践就没有人类社会，也就谈不上其它实践活动。生产斗争的实践是人类认识的最基本的源泉。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改造社会的一项重要实践活动。阶级斗争是在生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阶级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最本质的关系是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给予人们的认识以重大的影响。科学实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从生产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的，是人们认识自然、探索自然规律的一项重要独立的实践活动。

实践的形式和各种实践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改造社会的主要实践活动。在社会主义时期，剥削阶级消灭后，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大量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活动则成为改造社会的主要实践。另外，在现代，科学实验活动对其它实践活动，特别是对生产活动影响越来越大，它同生产斗争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此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当然，不管社会怎样变化发展，生产斗争永远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的这种地位是不会改变的。

总之，社会实践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区别，各自具有独立的内容。我们绝不能片面夸大某一种实践形式，贬低某一种实践形式，更不能用一种实践形式代替其它形式。“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任意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否定生产斗争和其它实践活动。他们把重视生产斗争诬蔑为“唯生产力论”；把从事科技、教育、文艺等活动，斥之为“三脱离”，从而搞乱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实践观，就必须正确认识各种实践形式的作用和正确处理各实践形式的相互关系。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同唯心主义认识论是根本对立的，而且同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旧唯物主义^①认识论也有根本

^①指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特别是指十九世纪前期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区别。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承认不承认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旧唯物主义否认实践对认识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①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根本区别的概括说明。正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才使人类关于认识的理论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我们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中，可以看出实践的观点在认识论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

旧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在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也是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出发，承认认识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人的认识究竟怎样反映客观世界的问题上，旧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分道扬镳了。旧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头脑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架照像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一种镜子式的、照像式的反映。这种理论看不到人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能动性，所以说它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直观的反应论。从现象上看，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似乎有点像镜子式的、照像式的，但实际上，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同镜子式的反映有本质区别。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获得的。改造客观世界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人们通过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不仅能够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且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客观世界只有首先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9页。

作为人的实践和改造的对象，才能成为人的认识对象。离开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反映，也谈不上什么认识。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人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的主动性、能动性。所以说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从这里不难看出，旧唯物主义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论同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区别，本质就在于承认不承认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性。按照前一种理论，人们要取得认识，只要对客观世界作静止的观察就行了，根本不需要投身于变革现实的实践中去。这样的认识论，至多只能对世界作某些现象上的描述，不可能真正改造世界。后一种理论则与此相反，坚持要取得正确的认识，必须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旧唯物主义把实践排除在认识论的范围之外，根本原因在于它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不懂得人的社会本质。他们所说的人，实际上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抽象的人，而不是生活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和一定社会关系中实践的人。他们把自然界、客观世界仅仅当作可以感觉的东西，是感觉的对象，而不是看作人的实践和改造的对象。这样，人类特有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在旧唯物主义的视野里就消失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以能够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更重要的是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和一定社会关系中实践的人。动物只能适应环境，不能改造环境。所以它们对客观世界虽然也能产生一些简单的反映，但并不是什么认识。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不是消极地适应环境，而是能够改造环境。所以只有人类才能谈得

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所谓认识（指科学的认识），就是人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人对自然和社会实行改造的产物。

旧唯物主义由于把实践排除在认识之外，也不能了解认识的辩证过程。列宁指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由于把实践引入认识论，能够揭示出认识辩证发展的规律。客观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也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认识，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必然是一个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辩证发展过程。

三、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那么实践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究竟起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首先，实践是认识产生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人们的任何认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实践是一切认识的源泉。

关于自然科学的认识主要产生于生产斗争的需要，并且是在生产等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不论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还是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现代尖端科学，都是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提出来的。如电子计算机技术产生于军事斗争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国家制造出导弹武器。导弹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为保持导弹在发射中不偏离运行轨道，需要一种能在0.02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秒内，把每秒一千米以上的速度的偏离数值计算出来的高速计算工具，一九四四年提出这种要求，一九四六年二进制制的第一代真空管电子计算机就产生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如此，对社会的认识也是这样，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产生各种经济学说；没有政治活动，则不会有政治方面的知识；没有教育活动也不会产生教育理论，等等。

认识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是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实践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实践每发展一步，都向认识提出新的课题，推动认识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实践又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仍从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来看，四十年代中第一代电子计算机产生后，解决了控制导弹偏离值的计算问题，但这种计算机由两万多个真空管组成，体积大、使用不便。根据生产与军事等实践发展的新要求，一九五六年制造成功了体积小、运转灵活的半导体计算机。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六十年代初，制造出集成电路计算机。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又制造出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电子计算机从一代到一代，体积、重量和功耗越来越小，计算频率则越来越高。现在的微式计算机每秒钟可运算几百万次、几千万次甚至上亿次。计算机的发展过程标志着人类在这方面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而这每一步提高都是社会实践推动的结果。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也是由实践推动的。如大家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则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今天，各国无产阶级又在实践中遇到许多新问题，这必然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推向前进。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说明人们要获得真知，必

须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生而知之的“天才”是不存在的。需要说明的是，知识来源于实践，是就知识总体来讲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要取得知识，除参加实践活动外，从书本上获取前人所积累的知识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并不否定学习书本知识的重要性。但是，书本知识也是前人在实践中获得的。因此，归根到底实践是人们获得认识的唯一源泉。

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人们在实践中获得认识后，究竟是否正确，还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进行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认识，才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所以要由实践来检验，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认识才称得上真理性的认识。那末怎样判明主观是否符合客观呢？如果以某一理论为尺子来判别，那结果只能证明符合不符合某一理论，并不能证明是否符合客观事物或是否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因为理论、意见等仍然是主观意识的东西，在主观范围内是不能检验主观自身的认识是否正确的。那么把认识直接交给客观世界是否能检验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认识与客观世界之间需要有一个桥梁才能沟通。这个桥梁，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离开这个桥梁，二者互相不能发生关系，更谈不上什么检验了。实践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才能起到沟通主观与客观的桥梁作用，因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① 实践的现实性正是检验认识的主要根据。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

要理解实践标准的唯一性，还必须弄清逻辑验证与实践检验的关系。不可否认，逻辑验证在人们认识中起着巨大作用，不符合逻辑的认识，很难说是正确的。但逻辑也属于主观的范围，符合逻辑的认识是否正确，最后还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符合逻辑而不符合实践的认识仍然不是真理。另外，逻辑思维本身也是实践的产物，因此，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

诚然，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也有它的相对性。列宁说：“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①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即绝对性，是指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的客观标准，离开它再没有别的客观标准；实践最终一定能鉴别出认识的真理性。它的不确定性即相对性，是说任何实践都要受一定历史条件所局限，而且实践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坚持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就必须反对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观点；同时也必须反对把已被实践证明的真理变成一劳永逸的观点。

掌握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曾经犯过一定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了曲折的道路。但是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的险恶用心，把毛泽东同志的言论神圣化，否定了实践标准。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因“两个凡是”观点的影响，沉积多年的混乱仍未得以澄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实践标准的权威，全国人民才从现代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对于完成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的拨乱反正，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顺利实行

^①《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2—143页。

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起了巨大的作用。

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世界只是手段，而改造世界才是目的。认识服务于实践就是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①认识服务于实践，一方面是认识目的所决定，另一方面又是实践本身所需要。人们的实践虽然总的来说是自觉的，但也有带盲目性的时候。要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就必须接受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认识的目的与实践的需要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一般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总之，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且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检验认识，发展认识。认识的源泉和动力是实践，检验认识的标准和认识的归宿也是实践。这就是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发展。那么，认识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阐明了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决定作用之后，接着分析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的辩证运动过程，展现了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初级到高级，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

一、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

人们在实践中认识事物，首先接触到的是能够通过感官直接感觉到的表面现象，即获得感性认识；然后通过理论思维，过渡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理性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感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一步，也就是认识的初级阶段；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二步，也就是高级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两个不同质的阶段。

什么是感性认识阶段呢？感性认识阶段即感觉和印象的阶段。它是客观外界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即眼、耳、鼻、舌、身而产生的。感性认识的形式有感觉、知觉和表象。感觉是物质作用于人们的感官的结果，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

*本专题阅读书目：《实践论》第六自然段至第二十三自然段，第二十六自然段。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1—272页，第273页。

接联系，它们中间没有别的环节。感觉是感性认识的起点，也是整个认识的起点。感觉是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它只给我们提供客观对象的单一的特性和特征的映象。这些特性和特征的映象还是孤立的没有联系的。人们在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感觉的基础上，把这些感觉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客观事物的整个映象，当作整体来反映，便是知觉。知觉虽然也属于认识的感性阶段，属于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但它已经具有对事物概括的因素，已经通过概括，把各种孤立的感觉彼此联系了起来。表象则是知觉的再现，是感性认识的最高阶段，向前发展就通往认识的理性阶段。它的特点是不和客观事物发生直接联系。它虽然也是对事物表面的、整体的反映，但它已经离开了具体事物的实体，通过回忆和联想再现出来。例如，对某个熟人的印象，虽然多年不见，仍然能够在头脑中再现。从感觉到知觉到表象，已经表现出认识发展的趋势：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整体，从直接感觉到联想回忆。特别是表象，已经有了抽象概括的因素。这些感性认识形式之间彼此是有区别的，但都没有超出感性认识的范围。

感性认识具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可靠性。它是对事物直观的、生动的、朴素的反映，在实践中，外界给感觉器官以什么刺激，它就能如实地反映什么。这一特点决定了它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无论要认识什么事物，必须从感性认识开始。如果没有这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就不可能有理性认识，因而，也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科学知识。二是它的局限性。它只能反映事物的现象、事物的片面、事物的外部联系，而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例如我们凭感觉只能感知气候的冷、热、风、雨，却不能把握气候的变化规律，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感性认识的这一特点

决定了它对事物的认识还是初步的，还不是对事物的本质和全面的认识。如果我们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就不能完成认识的任务。因此，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

什么是理性认识阶段呢？理性认识就是对感觉的材料进行综合、整理和改造。它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是对感性认识的抽象和概括。概念、判断和推理是理性认识发展中的基本逻辑思维形式。概念是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的结果。“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①在认识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概念，虽然还没有运用其他思维形式，把概念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但是，它已经进到理性认识阶段，已经开始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质变（飞跃）。判断是对事物的情况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它比概念进了一步，已经可以反映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了。推理是比较判断又高的思维形式，是由已有的判断过渡到新的判断的思维活动，能够帮助人们从事物的联系中，由已知的东西推出未知的东西；它不仅反映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而且还能反映事物的发展趋势。

理性认识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它不是直接接触具体事物，而是在通过感官接触到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间接地进行的；二是它是通过思维活动抽象出来的；三是它是对事物本质的、全体的、内在联系的反映。理性认识对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来说，比感性认识更加重要，因为感性认识只解决现象问题，而理性认识才解决本质问题。通过现象到本质，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抽象获得的理性认识，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

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认识。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阶段。两者是对立的,是说它们有区别。一个反映现象,一个反映本质。从现象到本质,在哲学上就叫质变,也叫飞跃。因此,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否则在认识上就要犯错误。但是,又要注意这种区别是相对的,区别的界限随着我们知识的发展而变化。例如现代物理学实验就很难同理性认识严格区别开来。因此,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只能大体上区分哪些属于感性认识,哪些属于理性认识,不能认为有什么纯粹的感性认识或纯粹的理性认识。因为实际上,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不是从零开始,而都是在前人经过无数次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人的认识往往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交织在一起的。对某一事物的认识一开始是感性认识,但认识它以前,可能对认识的对象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因此这种认识既属于感性认识,但又渗杂有理性认识。在理性认识阶段也常常与事物的生动形象联系起来。所以,两者的区别是相对的。说两者又是统一的,是指两者有紧密的联系;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两者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感性认识怎样上升到理性认识呢?

首先要取得尽可能丰富的感性材料。感性材料在不同的领域中表现是不同的。在自然领域中人们可以直接取得丰富的感性材料,也可以通过科学仪器间接取得人们的感官感受不到的材料。例如,在对天体的研究中,人们用肉眼只能看到六千个星体,但通过射电望远镜就可以观察到千千万万个类似银河系的星系,遥望的距离可以远达一百亿光年^①以上。肉眼只能看清大小0.1至

①计量天体距离的一种单位。指光在一年中所走过的距离,约等于94,605亿公里。

0.2毫米的物质细节，而借助电子显微镜，可以直接观察到微观世界中的单个重原子和大分子。人的肉眼看不到紫外线、红外线和超声波等现象，可是借助现代光感器、声纳器和磁感仪等都可以观察得到。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认识工具将进一步延伸人的感官的功能。感官功能的延伸将为人们掌握更丰富的感性材料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和可能。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则不能象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那样，随时观察他们所要研究的对象。除了可以利用“试点”、“解剖麻雀”的方法外，是不能使用象科学实验那样的方法的。特别是对历史的材料更不可能直接观察，谁也不能使已经经历过的历史现象再呈现在眼前，只能依靠各种渠道获得不同史料，如遗迹、实物和文字记载等来掌握材料。

在掌握丰富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思维加工是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手段。如果说感性材料直接反映着实践中的各种事物的现象，思维则是对这些感性材料的加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进行思维加工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概括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①。通过这种加工，已经可以撇开事物的各种现象，从大量的材料中，提炼出和抽象出最重要的、能够反映事物内部联系的东西。例如，人们对闪电表现出的各种各样形式进行概括，抽象出闪电是一种放电现象，这个结论是通过思维加工取得的。再例如，数学上有无限大和无限小的概念，这个大和小是不能测度的，在现实中也找不到的，但它是从大量的现实的感性的材料中概括出来的。

由于社会科学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更需要在掌握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通过思维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活动，把它上升到理性认识。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不少著作中，把实现这种上升的途径具体地概括为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所谓调查就是掌握大量的、可靠的感性材料。所谓研究，就是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思考，运用抽象思维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非常重要。例如，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类比和假设，证明和反驳等，如果不能正确运用这些方法，即使掌握了丰富的感性材料，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可能加工出“次品”或“废品”，得出错误的结论来。

二、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才能 完成对一个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对一个具体过程的认识来说并没有最后完成。还必须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的能动的飞跃。

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所以是认识过程中一次更重要的飞跃，首先，因为在这里实现了对立面的转化，即主观向客观的转化。认识的能动性，不仅在于能够深刻的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正确地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能够运用这些正确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区别于任何别的认识论的重要标志之一。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例如我们总结中国革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的经验，就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总结我党建国三十二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统一认识，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如，我们总结工作，是为了指导工作。制定工作计划，是为了实施。搞设计，是为了施工。总之一句话，认识的完全是为着实践。理性认识所以要再回到实践中去，就在于它能为实践活动指明方向，指出方法。

其次，理论回到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检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①认识在没有被实践证明以前，还不能够确定它的正确程度，只有回到实践中去，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这种认识是否与客观事物相符合。例如，在自然科学中建立在一定科学事实根据上的假说，是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形式。但假说只有经过科学实验检验，经过一定的修正才能成为正确的科学理论。我们制定一个工作计划，实施中很难说就没有改变。可见，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实现这一飞跃时有两个问题应引起注意。第一是理论返回实践，必须将理论具体化。理论是一般的东西，比较原则，而实践则是具体的、复杂的。因此，只有把理论的东西具体化，才能使之更接近于复杂的实际情况。就是比较具体的工作计划、方案等也带有原则性特点，在实施中同样有一个具体化问题。至于其它方面的理论更是如此。第二是理论在回到实践中去以前，特别是对社会影响面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的行动，必须经过一定试验。我们常说的“典型引路”，就是这个道理。不然就可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失。例如在全国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农业生产责任制，都是经过一定的试点取得经验才推广的。一项新发明的技术，必须在小范围内试用后，才可能全面推广。

总之，认识回到实践中，经过实践的检验，正确的东西被证实了，不完全的可以充实，错误的可以纠正。这样，认识也就发展了，丰富了。所以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的这一飞跃，一方面改造世界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检验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是认识过程的一个新阶段。

三、坚持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循环不已，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认识

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这样，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答复是又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就对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来说，原来的认识回到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检验，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全部或大部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为什么说这时的认识又没有完全完成呢？

第一，是因为变革现实的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常常受着许多条件的限制。诸如科学条件、技术条件客观过程矛盾暴露程度的限制，还有主观方面的一些限制，等等。一般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的事是很少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

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因此，有时须反复失败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达到与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就以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道路和战略策略的认识来说，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时间长达二十四年之久，到了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才真正统一了全党对民主革命路线的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是几经挫折，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总结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新路子。有的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过的曲折道路表示懊悔，他们认为“八大”曾制定过基本正确的路线，如果能不犯错误坚持下来该多好啊！殊不知社会主义对我国、对人类都是新的事业，我们从事这样一件空前未有先例可循的事业，走一些弯路、遇一些挫折、遭受一些失败，并不是值得懊悔的。对历史的埋怨是徒劳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经验和教训中取得正确的认识，从而开创新局面，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自然科学发展史也证明了认识的反复过程。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说，认为太阳处于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着太阳运动，并认为行星旋转的轨道是圆形的等，这个学说否定了“地心说”。虽然他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其中太阳宇宙中心观点却是错误的，以后的科学实践证明，太阳只是太阳系的中心，而不是宇宙的中心。在太阳系之外，还有无数的恒星，宇宙是无限的，没有中心。以后，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通过长期观察研究，又证明太阳系中行星的轨道是椭圆的，对哥白尼行星轨道圆形的观点作了修正。可见任何一个自然科学理论都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是因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是无限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运动也永无止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只是完成了对事物某一具体过程的认识。随着事物自身的发展变化，人们对于事物的反映，也必须跟着推移和发展。这正是认识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前者是说主观认识要同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客观实践相结合；后者是说主观认识要同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实践相符合，这种符合是历史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每一个革命的指导者，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与客观形势不相符合时，就要随时进行修改补充。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阶段推移时，更要善于使自己主观认识跟上推移转变，也就是要根据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任务，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这样才能引导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

总之，人的认识决不是通过一次认识过程就可以完成。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如此无限循环往复，这是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

毛泽东同志把认识的辩证过程运用于具体工作中，形成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不断往复就是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四、坚持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必须反对唯理论和经验论

哲学史上有一种流派叫“唯理论”，也叫“理性主义”。它只承认理性认识的可靠性，不承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唯理论又有唯物主义的唯理论与唯心主义的唯理论之分。唯心主义的唯理论不但认为理性认识不依赖于感性认识，而且根本否认客观物质世界是认识的对象和来源。唯物主义的唯理论承认规律是客观的，但是认为只有理性认识，才能把握规律，而感性经验是靠不住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虽然在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它片面地、形而上学地夸大了理性的作用，实际会导致把理性看作主观自生的东西，是对唯心主义的让步，所以它在认识论的全体上是错误的。

哲学史上还有一个流派叫“经验论”。它只承认感性认识的可靠性，否认理性认识的可靠性。这一流派又分为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和唯物主义的的经验论。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认为经验只是纯主观的东西，根本否认外界事物是感性认识的源泉，否认理性认识。唯物主义的的经验主义认为感觉经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知识的唯一源泉，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它却轻视理性认识，只承认感觉经验在认识上的可靠性。由于它片面地夸大感性认识的作用，不懂得感性认识还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所以在认识论的全体上也是错误的。

哲学史上的这两种错误理论，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有些同志往往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在理论上重复了相似于唯物主义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轻视实

践中得来的经验，而迷信书本上写的、上级文件中讲的东西，把这些当作解决不断发展的现实问题的教条。他们往往因为从书本上、文件里找不到根据而否认客观形势变化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忽视从现实生活中总结出的新经验，这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轻视从大量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有的借口理论距离实际工作太远，而忽视理论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做党的工作的基层领导干部也不愿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拘守于自己的局部经验，看不到理论对行动的指导作用。他们要客观实际服从于自己主观的狭隘经验，往往因此而犯错误，这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思想，就要同时克服这两种倾向。

真理是客观的， 又是相对的和绝对的*

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中去的过程，就是不断掌握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真理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什么是真理？承认不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二是如何认识真理？一下认识的，还是逐步认识的。真理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哲学史上围绕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哲学派别都企图把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愿望说成是真理，用以论证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斗争归根到底都集中在真理问题的这两个方面。在现代，真理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一九七八年曾经在全国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真理问题重要性的具体表现。

一、真理的客观性

人们在认识同一事物时，往往出现不同的看法，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也有的部分正确，部分错误。那么，怎样确定什么是正确认识，什么是错误认识呢？这就要看某种认识是不是能够正

* 本专题阅读书目：《实践论》第二十四自然段。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凡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或者说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认识，就叫作真理。否则，就叫作谬误。“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①真理是一种认识，它的形式是主观的；但它所反映的对象是客观事物，所以，它的内容是客观的。唯物主义承认客观真理，指的就是真理中含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以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而不是说真理之外还有一个客观真理。通常所说的客观真理，真理是客观的，或真理的客观性，指的都是真理的客观内容。凡是真理，就一定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因而也都是客观的。事实上，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理是不存在的。真理的客观性决定了它的唯一性，就是说，关于同一对象的真理只能是一个；虽然人们因各种原因对同一个认识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例如电发明以后，在如何送电问题上，发生过一场争论。爱迪生认为直流送电好，乔治·威斯汀豪斯持相反意见，认为交流送电优越性大。究竟哪一个正确呢？后来实践证明乔治·威斯汀豪斯的认识符合客观规律，是真理。而爱迪生的意见则是错误的，不是真理，尽管他在其他方面有许多发明，他的意见也会被否定。

唯心主义根本不承认客观真理，否认知识和概念中的任何客观内容，认为真理是主观的。主观唯心主义否认客观物质世界和客观规律的存在。认为人的思想不是外界事物的反映，而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所以，在它们看来，客观真理是没有的，真理从内容到形式纯粹是主观的。客观唯心主义虽然承认客观真理，但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是它们所说的客观，不是与主观意识对立的物质世界，而是先于物质世界并独立于物质之外而存在的客观精神，或精神原则。因此，归根结底也是否定了客观真理。

一切唯物主义都承认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因而也都承认客观真理，并把它作为认识真理的前提。但是，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看作是死板的、机械的、直观的，根本不懂得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不懂得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因而整个来说，它并不能如实地、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实在内容。所以它们对客观真理的了解是不彻底的，并且往往容易滑向否定客观真理的深渊。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第一次对真理问题做出全面的、完善的、科学的论证。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承认客观真理，而且彻底摒弃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坚持认识的辩证法，重视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把旧唯物主义被动的反映论改造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才真正创立了科学的真理观。

既然真理只有一个，为什么对同一个对象人们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由于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存在呢？这就要看哪个阶级代表着时代的主流，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无产阶级是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它的阶级利益同客观规律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它肩负着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因此，它要求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要求发现真理，掌握真理，并勇于为真理而斗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同承认客观真理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它是真正掌握真理、坚持真理的条件。由无产阶级的阶级特点所决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唯一科学的世界

观与方法论，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更好地发现真理，掌握真理。尤其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立场、观点和方法显得更加重要。至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情况有所区别，一些自然科学家不是无产阶级，但因为他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或者能够自发地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一些观点，也就能够取得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或者有所成就。这说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对人们认识真理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二、真理发展的辩证过程

真理是客观的，回答的是真理反映的内容；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回答的是如何认识和发展真理？真理是一下子就可认识的，还是逐步认识的？

人们认识和掌握真理，都不能一下就获得、一次就完成，而是步步深入的辩证过程，也就是由相对真理达到绝对真理的过程。这是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

那么，什么是相对真理，什么是绝对真理，以及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从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发展过程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十九世纪中叶，恩格斯在总结细胞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成果基础上，第一次揭示了生命的本质。认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

不断的自我更新。”^①恩格斯这一论断，首先指出生命的物质基础是蛋白体，生命是蛋白体所特有的运动形式；其次，指出了生命这一运动形式的本质特征是蛋白体的不断的自我更新，即由同化和异化所构成的新陈代谢。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是真理。那么，这一真理是绝对真理，还是相对真理呢？回答是：既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相对真理？什么是绝对真理？

人们获得的每一具体的真理，因为受历史等条件的制约，都是对客观事物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认识。从广度上看，它只是对无限发展的宇宙的一个部分、一个片断的正确反映；从深度上来讲，它只是对某一对象的某些方面、一定程度和一定层次的正确反映，还没有完全地、详尽地反映了某个对象的全部本质。因此，每一具体真理都具有相对性，都是相对真理。蛋白体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但蛋白体的化学成份是什么？其内部结构以及功能又如何？在当时条件下，恩格斯没有能够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恩格斯的认识是相对真理。任何一个真理，虽然局限于一定深度和广度的范围内，然而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它又确实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它同谬误有着原则的界限，而且不会被以后的实践所推翻，这一点，又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真理同时又具有绝对性，是绝对真理。蛋白体的确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一百多年来的科学发展没有把它推翻，而且给它提供了佐证，这是它的绝对性。这样看来，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不是两个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每一真理都有绝对性和相对性，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对立统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0页。

当完成某一真理认识后，人们并非就此止步，还需要不断地探索新的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①这里仍然以对生命的认识过程来说明，继恩格斯之后，人们对生命本质获得一系列新认识。近几十年来，随着量子力学，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对生命本质问题的研究，从细胞水平跃进到分子水平。已经探索清楚，蛋白体是由蛋白质和核酸以及酯类、多糖等化学成份构成的物质体系。其中，蛋白质和核酸又是最主要成份。另外，对蛋白质和核酸各自的内部结构、功能都有所认识，搞清了生命新陈代谢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蛋白质中酶的作用。生命遗传的实现主要靠核酸中的脱氧核糖核酸这种物质等。研究生命本质另一个新发展，是人工合成新的生命体。一九六五年，我国制成结晶牛胰岛素。七十年代，国外一些科学工作者还合成了某些核酸分子等等。这些新成果，补充了十九世纪对生命的认识。但是对生命本质是否完全搞清了呢？远远没有。人们必然要不断地向新的高度攀登。对其他领域的认识同样如此。人类对真理的认识就是这样不断向前发展，以至无穷。而这个过程就是由相对真理逐步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这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辩证过程。

宇宙的发展是无限的、绝对的，每一个人以至每一代人的认识能力因受时代等条件制约，是有限的，作为认识成果的真理必然是相对的；而无限发展着的人类思维是无限的，按它的本性、能力和可能性来说是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的，它的认识成果即真理则是绝对的。这个绝对真理是在无限发展着一个个相对真理中实现的，因此，“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对的真理。”^①如果把绝对真理比作一条长河，那么相对真理就是其中的“水滴”，“河段”或“支流”。人类已经取得的任何一个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中的一个颗粒，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的环节，没有无数个相对真理作环节，绝对真理的整个链条就不会存在。

由此可见，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寓于相对之中，任何相对真理都包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另外，绝对中有相对，相对是绝对的一个成分，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绝对真理。这就是二者的辩证关系。

要正确把握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就必须反对两种错误见解。一种是独断论。这种观点片面夸大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认识真理是一个过程，认为人们一下子可以穷尽真理。因此，把一切真理看作绝对的、僵死的。杜林就曾将自己的学说贴上“终极”、“永恒”的标签，林彪、“四人帮”鼓吹的“顶峰论”以及所谓的“两个凡是”的观点也是独断论的表现。

另一种错误见解是相对主义。与独断论相反，相对主义把真理的相对性夸大了，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相对中包含着绝对，否认真理的客观内容。因而就抹煞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陷入唯心主义诡辩论。辩证唯物主义承认真理的相对性，但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②

客观世界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人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到顶，马列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不断认识真理的道路。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136页。

三、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发展真理

根据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原理，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坚持真理，发展真理。

真理的绝对性告诉人们，某一真理在一定范围内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那么，在这个范围内，它对人们实践就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人们只有坚持真理，遵循真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才能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才能把真理变为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重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所以必须坚持。若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就不能达到。在真理问题上决不能盲目地“喜新厌旧”，对新发现的真理要坚持，对于过去提出的，经过实践证明仍然是真理的，同样要继续坚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经常出现新的科学成果，这是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表现。当新的科学成果否定了陈旧的结论时，当然不应再抱住陈旧的结论不放，但是，当新的成果并不能否定过去已发现的理论，而且被实践一再证明仍然是真理时，就应该继续坚持。

坚持真理，并不是要凝固真理。真理的相对性表明，任何真理都是有条件的，超越了其特定条件，它就不成其为真理，那么，对实践也就失去指导作用。因而，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从实践中不断发现新的真理，发展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一些个别原理和结论在今天已经不适用，我们就不能削足适履，使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仍然拘泥于旧框框。教条主义

和经验主义都不懂得真理发展的辩证过程，各从一端把某些认识绝对化、片面化。二者在实践中都是极为有害的。事实说明，只有不断发展真理，才能不断坚持真理，脱离发展而坚持必然会走向绝对主义。

真理总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要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还必须辩证地认识真理与错误的关系。真理与错误是对立的，二者有着原则的界限。前者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后者是歪曲的反映。真理与错误在认识领域中又相互依存，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如果人们忽视了真理所适用的特定范围与条件，而将真理任意乱用时，它就变为谬误。谬误向真理转化有几种情况，一是有些谬误在一定范围内是谬误，当超出这个范围进入新的范围时，就可能转化为真理。嫦娥奔月在古代是幻想、是谬误。在今天的条件下，人们确实登上月球，幻想变为现实，谬误成为真理。二是有些错误理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正确成份，这些成份可以补充真理。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反动的，但其中却隐含有一个道理：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的增长应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是妄言，但这一学说肯定了地球是球形，还提出“视差动”问题。错误学说里这些正确的微粒在一定条件下就进入了真理的行列。三是错误的东西为认识事物提供了借鉴，避免了弯路，缩短了获取真理的历程。另外，在同错误的比较中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真理，也有利于真理为更多的人所掌握。我国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沉痛教训使人们对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原理的认识普遍有所提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四是在真理与谬误斗争时，有些错误东西往往会提出一些问题，发人思索，这都可以促使真理进一步深化。错误向真理的转化是二者在斗争中实现的，是真理战胜错误的表现。

总之，真理与错误既对立又统一。这一道理要求人们在实践中，一方面必须正确地运用真理，防止真理转向错误。另一方面，不能掩饰错误，要坚决同错误作斗争。同时又不能简单地否定错误，而应辩证地分析错误，以理取胜，促使错误向真理转化。

上面谈了坚持和发展真理应有的科学态度与方法，此外，还必须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在坚持真理、发展真理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能动性和革命性不仅表现在把实践中获得的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而且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把理性认识运用于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毛泽东同志用《实践论》为题来概括和阐发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精神，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负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任务。这是他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这一原理的重要发挥。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学习《实践论》，就要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以便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

一、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唯一目的。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①人类之所以要认识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掌握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为了运用这些规律去自觉地改造世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认识世界是手段，改造世界才是目的。人们认识了大自然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规律，

*本专题阅读书目：《实践论》第二十五自然段。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页。

就运用它来种植农作物；掌握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就积极创造条件，促进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就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如此等等，都说明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

要改造世界，首先必须认识世界。客观世界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人们只有认识和掌握规律，尊重客观规律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既然是客观的，人们就不能创造或消灭它们，只能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利用它们为社会服务。

列宁指出：“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把这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①可见，人们如果不认识世界，也就无从改造世界，至少是不能顺利地改造世界；人们越是深刻地认识世界，就越能有效地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也就是必然和自由的辩证关系。必然是指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也就是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性；自由是指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也就是必然向自由转化的过程。人们对必然认识的越深刻、掌握程度越高，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就越有成效，自由的现实性也越大。同样，要获得更大的自由，也就越要更多地、更深刻地认识必然，掌握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例如，肺结核病曾经是威胁人们的生命的一种慢性消耗病，人们没有认识它的必然以前，自由很少。一八八二年法国细菌学家罗勃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92页。

特·柯霍，弄清了结核病的致病菌——结核杆菌，为杀灭它提供了可能。四十年代后期发明链霉素，五十年代初期发明了异烟肼（雷米封），六十年代中期发明了利福平等。对肺结核病的必然性认识越深刻，根治它的自由就越大。现在，杀灭这种病菌的方法越来越多，效率越来越高，控制这种病菌的自由也就越来越多。但是，对于癌症，医学家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认识它的必然，虽然，可以采用手术、放射线照射以及药物等治疗方法，但是还没有找到彻底根治的方法，在这种疾病面前还很少自由。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①要自由地改造世界，必须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不然，那种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

在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自由意志论，否认世界存在着规律，认为人的意志、活动是不受任何东西束缚的，可以绝对自由，为所欲为。这种观点似乎强调改造世界的能动性，实际上是主观的蛮干，因而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另一种观点是宿命论的观点，认为承认必然就不可能有自由，人们在客观必然性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当奴隶，听天由命，受命运支配。这种观点，似乎强调客观规律，实际上是懒汉、懦夫思想，它妨碍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前一种错误倾向，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有着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既要反对自由意志论，又要反对宿命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斗争中，从一个又一个的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53页。

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

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

为什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呢？原因是：第一，客观物质世界是极其复杂的，面对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才能全面地掌握客观规律，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第二，客观物质世界是千变万化、不断发展的。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必须跟着推移和发展。如果事物的运动已经向前推移和发展了，而人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本来是正确的认识也会变成错误的认识。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提法，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是正确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当这一改造基本完成、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后，如果再沿用这一提法，就成为错误的了。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②改造社会是这样，改造自然界也是这样。第三，认识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要靠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人们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得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宇宙之广，奥秘之多，不是人们的感觉器官都能触及到的。人们要认识客观世界错综复杂的联系和事物各自的特殊规律，就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

要借助科学长臂。因此，人类文化科学上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现为人们认识能力的改善和提高。例如，遥感技术的进步，人们可以利用人造卫星，在距地面一千公里左右的轨道上，就可以拍到覆盖面积达34,000平方公里的照片，甚至可以把半个地球全拍在一张照片上。客观世界是无限的，实践也是无限的，人们必须永远自强不息，不断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投入规模更大、程度更高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去。

改造主观世界包括哪些内容呢？包括改造阶级意识，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改造人们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不论从改造主观世界的角度，还是从改造认识能力的角度看，改造阶级意识都是重要的。因为人的主观世界，或是认识能力，都程度不同地受阶级意识的支配或影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的观点已经说明，实践是社会实践，认识是人的认识，而社会的人的意识从实质上讲，除了无阶级的社会之外，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有人说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以后，人的意识也就没有阶级性了，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剥削阶级意识这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是不会随着剥削阶级基本消灭而一下消失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的改变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这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剥削阶级的、旧意识的改变是一个过程。对此，我们还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同阶级对立的社会有所不同。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他们的阶级意识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了，正处在不断克服和消灭的过程中，但这种阶级意识还在起作用，还有一定影响，有时在有些人那里还有严重影响。所以，强调阶级意识的改造是重要的。

改造阶级意识不能忽视，但是，它不是改造主观世界的唯一内容。在认识客观世界中，也不是任何情况下阶级意识都起决定作用。例如，在认识自然现象时同认识社会现象时就有不同；在不同的人那里，表现的也不一样。这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改造主观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改造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般说来，对世界的根本观点怎样，观察、研究、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也就怎样。我们的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法论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想任何问题，做任何工作，方法是不可少的。恩格斯曾经批评过轻视方法论的科学家。他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①可见，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人们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就要改造思想方法。唯物辩证法是最科学的科学的方法，要改造思想方法，就要以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来作指导。实际上，我们认识客观事物，不论正确和错误的认识都是以一定的方法论为指导的，不是用唯物辩证法作指导，就是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作指导。但是，事实证明，如果忽视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就不能分析事物复杂的发展过程，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不会了解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未来。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才能有正确的方法论，因为正确的方法论应当是客观物质世界本身规律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

反映。正确的思想方法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工具，而为了达到正确的认识，就应该使人们的思想遵循着现实事物所固有的发展变化的道路去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以，认识规律、思维规律，不能脱离自然界和社会的一般规律。而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的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则又是世界观的问题。所以说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也就没有正确的方法论。由此可见，改造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就是要依据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来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①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证明，这些不同形式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都是正确认识事物的障碍，必须加以改造。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人们的认识能力，使人们的主观和客观相一致，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扩大人们的眼界，又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能力。客观世界被不断改造，人们的认识也就不断地深化；主观世界的不断改造，人们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客观世界的改造也就步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的认识能力的改造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对于改造主观世界或改造世界观作了片面的、狭隘的以至错误的理解。有的人一讲改造主观世界或改造世界观，就同改造资产阶级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等同起来，而对于改造人的认识能力、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改造思想方法的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抹煞。在十年内乱的时期里,甚至把改造主观世界或改造世界观,归结为“破私立公”、“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所谓“公”又被归结为“忠”。于是,改造世界观就变成了灌输封建愚忠观念,搞个人崇拜的手段。这种所谓改造世界观,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背道而驰,越改造,就离马克思主义越远,离客观规律越远。

改造主观世界,强调改造认识能力、改造思想方法,当然不是否定改造思想意识的重要性,也不是要否定思想意识对认识能力的影响,但是,改造认识能力,改造思想意识,二者毕竟有区别。从广义上说,改造主观世界不只是改造认识能力,也包括改造思想意识;从狭义,即从认识论意义上说,改造主观世界,就是改造认识能力。二者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各自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的解决办法,既不能混淆,也不能取代。在现实生活中,区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比如,有的同志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们改造思想意识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却犯了错误,究其根源,是认识能力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因此,要在改造主观世界,改造思想方法和认识能力上找原因、解决问题。如果把改造主观世界仅仅归结为改造思想意识,给这些同志扣上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帽子,不但不能治病救人,反而误伤了这些同志,打击了他们。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屡见不鲜的沉痛教训。当然,也确实有些人由于极端个人主义作祟,被糖衣炮弹打中,而犯了错误,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样的人自然远不是认识能力问题,而是思想意识的问题。对此,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进行反对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把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进行

到底。但这毕竟是少数人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工作中犯错误，更多的是属于认识能力、思想方法的问题。因此，强调改造认识能力，使思想跟上历史发展新时期的新变化，就更具有普遍的意义。

三、改造主观世界的途径

改造主观世界，首先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进行，因为我们所说的改造主观世界，就是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而人的认识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规定着认识的内容，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的标准，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以，改造主观世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这是改造主观世界的根本途径。

其次，改造主观世界，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它为我们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也为我们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指明了方向。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和革命实践相结合，运用到实践中去，能够加速我们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既不能脱离实践、也不能在实践中自发形成，不能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代替主观世界的改造。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看到许多老工人、老农民长期参加生产斗争，但由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的实践经验不能上升为理论，因而也就不能形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之，有的人懂得较

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不重视理论和实践结合，死背本本，照抄照搬，结果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由此可见，只有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变革客观世界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促进主观世界的改造。

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无论对党的事业对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思想方法是否对头，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革命事业和各项工作的成败。毛泽东同志指出：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①今天，我国人民正肩负着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重任，我们应该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使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水平有一个根本的提高。这样，才能为实现历史新时期的总任务，做出自己的贡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2页。

事物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 法的根本法则*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是阐述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篇重要著作。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三个规律和一系列重要范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列宁称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或“核心”。^①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挥了列宁的思想，进一步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并且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对这个根本法则系统地作了说明和发挥。《矛盾论》就是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的规律阐述辩证法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重大贡献。

为什么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的法则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 本专题阅读书目：《矛盾论》结论。一、两种宇宙观。七、结论。

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279页，第310—311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

一、矛盾法则揭示出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发展和变化，绝对静止和固定不变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为什么会发展变化？对立统一规律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指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它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事物内部，它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既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形成对立面的统一；事物外部，它又和周围的事物发生复杂的联系。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事物内部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①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能够围绕太阳运行，是因为地球和太阳之间存在着吸引与排斥两种力的矛盾运动。自然界的生物能够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是因为在变化着的外界条件下，生物体内部存在着变异与遗传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能够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因为社会内部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人们的认识能够由浅入深不断深化，是因为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存在着实践与认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等一系列的矛盾运动。由此可见，事物的矛盾法则，从事物内部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真正源泉和动力，揭开了事物发展的秘密。

矛盾法则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是事物发展的实在内容，是最本质的东西。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统一，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35页。

又斗争，象一条红线贯穿于唯物辩证法的其它规律和范畴之中，是这些规律和范畴发生作用的基础。唯物辩证法的其它规律和范畴所揭示的事物发展的不同特征，实际上是矛盾法则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侧面的具体表现和展开。离开矛盾法则，就无法理解和说明其它规律和范畴，它是理解整个辩证法的钥匙。

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交替出现的相对静止与显著变动两种状态，即量变与质变两种状态。事物的发展总是要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状态，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引起的，离开矛盾法则就无法理解和说明。任何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总有一方是占居主导地位。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当矛盾双方的斗争还没有达到改变其主次地位的时候，事物就不会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这时就处于量变状态，即相对静止状态。当矛盾双方的斗争达到一定程度，使双方的主次地位发生改变的时候，事物就进入质变状态，即显著变动状态，这时，旧事物发展成为新事物。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将会重新经历量变阶段与质变阶段。比如，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旧物种在外界条件影响下，开始获得新的性状和机能，这只是个别的变异，通过个别变异的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突破了物种的遗传性，旧物种就发生质的变化，成为一种新物种。可见，生物进化要经历量变、质变两种状态，根本原因是物种内部变异与遗传的矛盾。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量变、质变状态只不过是生物体内变异与遗传矛盾运动的表现和展开。中国封建社会曾经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的量变阶段，鸦片战争以后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完全实现了这一社会形态的质变。这是因为人民群众虽然同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殊死斗争，但始终没有改变其地位，直至人民群众夺取了政

权，成为社会内部矛盾的主导力量，社会性质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波浪式上升的道路和形式，表明事物发展总趋势是前进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为什么事物发展不是采取直线式，而是曲折前进的呢？离开矛盾法则同样无法理解和说明。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与否定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肯定，是保持事物存在的因素，否定，则是促使旧事物发展和转化的因素。当事物内部肯定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事物处于肯定阶段。当否定因素经过同肯定因素的斗争，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时候，事物就走向了反面，进入否定阶段，即否定了旧事物，出现了新事物。新事物内部同样包含着肯定与否定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当新的否定因素战胜肯定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事物又走向自己的反面，进入新的否定阶段，即否定之否定阶段。事物总是这样经过否定因素与肯定因素的斗争，不断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前进的，这就必然呈现出一种曲折前进的形式。自然界雨水的形成就呈现出“液态——气态——液态”波浪式的发展过程。社会历史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也经历了“统一——分离——统一”的曲折形式。事物的曲折发展只能用矛盾法则来说明。以雨水的形成来看，水分子之间存在着斥力与引力的矛盾斗争。地面上的水随着温度增高，当其分子间斥力大于引力到一定程度时，它就由液态被蒸发为气态；而随着空气中气温的降低，当蒸汽分子间的引力大于斥力到一定限度时，它又从气态凝聚成液态，落向地面，变为雨。可见，雨水形成的波浪形式主要由水内部的矛盾发展决定的。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从事物发展的一定环节上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某些本质特征，它们也都是矛盾法则的具体表现和展

开。如本质和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矛盾关系。内容与形式，反映了事物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关系。因此，只有把握矛盾法则，才能理解和说明这些基本范畴。

总之，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懂得了矛盾法则，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抛弃了矛盾法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唯物辩证法。

承认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唯物辩证法的其它规律和范畴都是矛盾法则的具体表现和展开，这丝毫不带有任何贬低其他规律和范畴作用的意思，更不能用矛盾法则取代其它规律和范畴。核心不等于全部，根本法则也不能包括全部法则。事物发展的内容是生动的、多方面的，唯物辩证法也是丰富多采的。只有紧紧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同时认识这一根本法则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和展开，才能全面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二、是否承认矛盾是唯物辩证法 与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

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立和分歧的焦点是承认还是否定事物的内部矛盾性。从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的实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出矛盾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中所占有的核心地位，认识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

毛泽东同志指出：形而上学的特征“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①唯物辩证法的特征则与之相反，那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就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形而上学所以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唯物辩证法所以能够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认识上的根本原因，在于形而上学看不到事物内部的矛盾，唯物辩证法则承认事物的矛盾。

形而上学不是从事物的内部矛盾寻找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是单纯从事物的外部去寻找事物发展的原因。形而上学把事物的发展统统归结为由于外力的推动引起的一种机械运动，因此事物的发展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只有数量的增减，场所的变更，没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形而上学这种“外因论”，不能解释事物千差万别的多样性。如果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是由于另一个事物的推动引起的，那么整个宇宙开始是怎么运动起来的呢？形而上学无论如何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只好求助于神的帮助，说什么那是由于神的“第一次推动”引起的。可见形而上学发展观，最终必然陷入唯心论。

唯物辩证法主要从事物的内部寻找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①自然界动植物的生长，主要由于动植物内部具有新陈代谢的作用，能够通过同化与异化的矛盾，吸收营养，排泄废物。社会的发展，主要不在于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在于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一个人思想修养的锻炼，认识能力的提高，主要不在于工作的性质、地点，而在于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设，主要不是依靠外国的援助，而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努力，着眼点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

唯物辩证法肯定事物的内部矛盾性，即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不否认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矛盾论》在深刻揭露形而上学“外因论”的同时，科学地阐明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②这就是说，事物发展既需要内因，又需要有外因，内因、外因缺一不可。但是，两者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性质是不同的。内因起着“根据”的作用，外因起着“条件”的作用。所谓“根据”，是指事物内部矛盾决定事物向一定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所谓“条件”，是指事物外部矛盾对事物发展的影响，具备了这个外部“条件”，可以促进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如果一事物没有发展为它事物的内部“根据”，即使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一事物也不可能发展为他事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看到母鸡变雄鸡、雄鸡变母鸡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有内部“根据”的。能有这种奇特的变化，其原因在于鸡体内性腺组织中皮部与髓部的矛盾斗争。当鸡体温度等条件具备时，髓部发育生长，皮部被压制，停止发育，母鸡则变为雄鸡。当皮部发育生长，髓部停止发育时，则雄鸡可变为母鸡。但任何条件也不可能使鸡直接变为石头，因为鸡体内不具备这种内在“根据”。再如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好坏，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很大作用，像阿拉伯一些产油国家，凭借丰富的石油自然资源，近年来经济发展很快，但这并没有使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使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因为这些国家目前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根据”。社会制度的变革，只有通过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才能实现。所以说，内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一位原因，是根本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原因，是次要的原因。

肯定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不排斥外因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够对事物的发展起主要的决定作用。比如，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于弱小民族的入侵，使这些弱小民族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可以超越一些历史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对于生物的发展，外界条件起很大作用。把蛹放在温暖的地方，其所变的蝶就产生出温带地区的花纹；若放在冷的地方，则生出另一种花纹。在遗传工程中，人们用人工的方法把不同生物的优良的遗传特性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生物体，这已经正在引起生物发展的巨大变革。如育种专家估计，用遗传工程办法产生生物新组合性状的速度比生物的自然进化要快一亿到十亿倍。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说明外因对于事物发展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所谓外因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就是事物发展的一定环节上、一定范围内、一定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因而并没有改变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作用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事物发展中内因的最终的决定作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入侵，是通过被侵略民族的弱小实现的。被侵略民族的弱小是受侵略的内部“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能使少数民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通过培育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实现的，少数民族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

是使其进入社会主义的最终决定因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革命面貌的影响，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斗争发生作用的，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仍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通过人工方法使生物体发生突变，也是利用生物本身的遗传规律，创造条件通过改变生物体内遗传物质的重新组合实现的，生物体内遗传特性及其遗传物质的重新组合仍是生物体发生突变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事物的内部矛盾归根到底是事物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着批判“外因论”、推崇内因的旗号，割裂内因同外因的辩证关系，片面强调内因的作用，完全否定外因的作用。他们竭力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把“自力更生为主”歪曲成“闭关自守”，把“争取外援为辅”，诬蔑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同样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现在，党中央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资促进我国四化建设，辩证地坚持了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原理。忽视外因条件的作用，甚至完全否认外因的作用，决不是唯物辩证法。

三、矛盾分析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还突出地表现为矛盾分析的方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作为世界观，最根本的观点就是矛盾的观点。作为方法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客观世界充

满着矛盾，每一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复杂的事物内部包含着更多的矛盾。所谓认识世界，就是分析矛盾。所谓改造世界，就是解决矛盾。“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①

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革命导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就是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个典范。《资本论》首先从分析商品开始，揭露了商品生产内部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以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进而又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同雇佣劳动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从而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列宁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进一步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出现的新的矛盾，从而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得出了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民主革命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领导力量、同盟军，以及革命所采取的道路和形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伟大著作，为我们解决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党的中心任务，要求全党必须端正思想路线，研究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研究新情况，就是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就是解决新矛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新的矛盾需要我们研究和解决。比如，如何认识 and 解决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 系、经济建设同党的建设的关 系、坚持自力更生原则同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关 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 系、经济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 系，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矛盾，需要我们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解决。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明确矛盾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以后，需要进一步认识矛盾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这就是《矛盾论》阐述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研究工作，是同革命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急需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空谈马列主义普遍原则，拒绝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主张用马列主义原则去套中国革命的实际。针对“左”倾教条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着重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对于我们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在方法论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什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矛盾的普遍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①

* 本专题阅读书目 《矛盾论》二、矛盾的普遍性。三、矛盾的特殊性。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295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

矛盾普遍性的第一方面的含义，是说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整个宇宙处处有矛盾，不存在无矛盾的“真空地带”。恩格斯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①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也就没有事物，没有世界。从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从简单事物到复杂事物都是如此。宇宙间各种天体中存在着排斥与吸引的矛盾，这矛盾又表现为接近与分离，收缩与膨胀、吸收与发射、电离与复合等具体形式。原子中存在着电子与原子核的矛盾；在原子核各层次中又有中子与质子、中子与反中子、质子与反质子、电子与正电子以及波动性与微粒性等矛盾。目前自然科学发展已经证明，中子、质子、电子等这些所谓的基本粒子并不基本，在它们内部仍然存在矛盾。机械运动是最简单的运动，其中同样有矛盾，如：反作用力与摩擦力、离心力与向心力、弹性与塑性、强度与韧性等。复杂的生命现象也是一种矛盾运动。任何生物体都具有新陈代谢的作用，旧细胞在不断死亡，新细胞在不断产生。科学证明，人体内的红血球大约每秒钟要更替一千万个，如一个活七十岁的人，一生中全部红血球竟要更替二百次以上。所以，生物体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如果生物体这种新陈代谢作用停止了，生命也就停止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一种矛盾，就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来讲，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就一个人的有限生命来讲，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是在这种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指出战争中的攻与守、胜与败、进与退，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也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矛盾。

矛盾普遍性的第二方面的含义，是说事物发展中自始至终都有矛盾，即时时有矛盾。苏联在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叫德波林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的学派，否认事物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矛盾。他们认为事物发展的开始阶段只有差异没有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有差异并无矛盾。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差异中就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实际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只不过矛盾还没有激化，没有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而已。日常生活中，同志之间闹了意见，我们说两人有矛盾了，好象矛盾是在“闹意见”之后产生的，“闹意见”之前并无矛盾。其实“闹意见”之前，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不一致就是矛盾。两人闹了意见只是说明矛盾发展了，突出了。社会上人与人关系如此，就是每一科学的发明创造过程也不例外。德国科学家埃尔利希和他的同事们一九〇七年制造出抗梅毒药——砷凡纳明。他们从一种含砷的毒药“阿尔什尔”的化学结构开始，先后实验了不知多少次都失败了。正是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了成功的因素，最后才获得成功。这说明成功与失败的矛盾一开始就存在于他们的试验活动中，并贯穿到最终。事实表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只存在着矛盾发展的差别性，而不存在矛盾有无的问题。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事物矛盾的特殊本质。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不尽相同，都是由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本质决定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普遍存在的每一个矛盾又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在认识矛盾普遍性的同时，还必须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具体认识事物的本质，解决矛盾。

如何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概括了以下几种情形：首先，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一定的形式运动着。比如：机械运动、物理运动、

化学运动，生命运动、社会运动就是几种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它们都是由自己特殊的矛盾决定的。科学的发展不断揭示出各种物质运动中新的特殊矛盾。人们都知道，太阳光、电灯光等普通光与激光有着本质的差别，激光可以穿透金刚石等非常坚硬的材料，普通光对此则无能为力。放射普通光束的探照灯充其量照射几公里的距离，而激光探照灯，则可照射到月球上。二者的威力如此悬殊，原因在于普通光与激光各有其内部的特殊矛盾。如前者是由电子自发运动放射出的光，后者是电子受外界入射光刺激而运动时发出的光等，这些特殊矛盾决定了二者的亮度、定向性、单色性的差别以及作用的不同。复杂的社会运动形式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决定的。认识不同事物的本质，首先要区分不同运动形式的矛盾的特殊性。

其次，每一种物质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带有特殊性。一切物质运动形式，都是由不同的运动过程构成的，表现为一系列的运动过程。如社会运动形式，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几种基本社会形态构成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过程，这种特殊的发展过程都是由它所包含着的根本矛盾决定的。只知道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矛盾运动，还不能具体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具体特点。

再次，每一发展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矛盾，带有特殊性。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又是由不同阶段构成的，一个过程总是包含着许多不同阶段。这是因为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是由事物的根本的矛盾决定的，事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根本矛盾虽未解决，过程还没有结束，但由于根本矛盾采取了逐步激化的形式，或者被根本矛盾规定和影响的其它矛盾发生了变化，事物发展就会显示出阶

段来。如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过程，它可以区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阶段。中国民主革命是一个过程，它可以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共产主义也可以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当然，过程和阶段的区分是相对的。社会主义对于整个共产主义来说是一个阶段，对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来说又是一个过程。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是一个阶段，而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它又是一个过程。如何区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的。

最后，事物发展的每一过程和阶段矛盾的各个方面，也带有特殊性。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和每一阶段的特殊性，是和矛盾双方各自的特点分不开的。只有分析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才能认识整个事物的特殊性。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日双方一强一弱等许多特点，从而得出了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的科学结论，指导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怎样具体分析事物的特殊性，还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作出概括和说明。毛泽东同志如此详细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各种情形，是对矛盾学说的重大贡献，对于我们的实践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二、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 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矛盾的普遍性指的是时时、处处、事事都有矛盾，同类事物存在同类矛盾，古今中外，概无例外。所以它是矛盾的共性，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是指每一事物的矛盾都有各自的特点。“张冠”不能“李戴”。所以，它是指事物的个性。每一事物的特殊矛盾又是在一定条件下暂时存在的，原来的条件变了，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它又是矛盾的相对性。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即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之间，是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反过来，特殊性之中包含着普遍性，个性之中包含着共性，相对之中包含着绝对。这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离开普遍性的特殊性，也没有离开特殊性的普遍性。在一个事物内部既有矛盾的特殊性，又有矛盾的普遍性。既有矛盾的个性、相对性，又有矛盾的共性、绝对性。举个例子来说，房子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房子分泥房、草房、瓦房、平房、楼房。楼房又分二层楼、三层楼、四层楼等，五一广场的百货大楼同迎泽街的八角大楼也有许多不同的特点。抽象的房子是不存在的。房子的普遍性存在于哪里呢？存在于每一种具体的房子之中。每一种房子不管怎么特殊，但它们都是房子，都具有房子的一般特征，所以，每一种特殊的房子之中又包含着房子的普遍性。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够转化的。毛泽

东同志说：“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①这就是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也是相对的。比如，阶级矛盾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矛盾，在阶级社会范围内，它又是普遍存在的矛盾。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在整个社会生产的历史过程中，是一种特殊的矛盾，在商品生产的范围内，它又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矛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其它国家相比较，无疑有中国式的特点，对于国内各个省、地区、部门，显然又有共同的普遍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②为什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呢？

首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是矛盾问题最基础、最本质的东西，它贯穿于矛盾运动的各个方面。只有认识这种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和掌握矛盾法则。事物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任何矛盾既具有反映这一事物不同于其它事物的特殊性，又包含着同其它事物相联系的普遍性。如果只承认普遍性，不承认特殊性，那就会把千差万别的事物看成绝对同一的东西；如果只承认矛盾的特殊性，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那就看不到事物之间的联系。两种情况都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同时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还体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现在矛盾问题的其它各个方面。比如任何事物内部都有矛盾，复杂的事物内部还有更多的矛盾，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各个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必须有主次之分。不能平均看待，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任何矛盾都有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这是普遍性，但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也有主次之分，这又是矛盾双方不同的特殊性。任何矛盾双方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这是一种普遍性。但是每一个具体矛盾双方同一与斗争的内容、形式、表现却又有很大的不同，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我国目前存在的阶级斗争，无论从斗争的范围、规模，还是斗争的内容、方式，同革命战争年代是有很大差别的。把这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当作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给革命将会带来极大的损失。任何矛盾都不能调和，必须经过斗争才能解决，这是普遍性。但是矛盾的性质不同，斗争的方式也不同。其中特别要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社会领域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又是矛盾特殊性。解决敌我矛盾，采取专政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却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多么的不同。总之，离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整个矛盾问题将无法理解，更谈不上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矛盾。

其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是正确的思想路线、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依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决定了人们认识事物必须遵循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认识具体的特殊的事物是认识的出发点，只有先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性，才能概括出各种事物中共同存在的普遍性的东西，然后用这种普遍性的东西作指导，再去认识特殊事物，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普遍性的东西。只有了解市场上

各种价格波动的大量实际情况，才能逐步认识价值决定价格的普遍规律。只有经过详细研究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大量材料，才能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正是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则是党提出的这一正确思想路线的理论依据。毛泽东同志不仅运用这一原理解决了我们党的根本思想路线，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比如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抓典型，“解剖麻雀”的方法等等。每一个肩负着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在工作中如果只有一般号召，不做具体指导，那么他的一般号召就必然要落空，不能把工作做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号召只解决工作中的一般原则，不能直接解决具体问题。要解决具体问题，有了一般号召，还必须研究具体问题的特殊情况，进行具体指导。所以，一般号召必须和具体指导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在领导方法上的运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抓典型，“解剖麻雀”的方法，也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麻雀”是个具体事物，具有特殊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了解“麻雀”的内部结构，并不需要对所有的“麻雀”都进行解剖；只要对若干“麻雀”进行解剖分析，就可以了解“麻雀”的共同本质。

再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是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思想方法上，都是反对唯物辩证法，坚持形而上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割裂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

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教条主义用矛盾的普遍性否定矛盾的特殊性，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当作僵死的教条，死板的公式，反对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经验主义用矛盾的特殊性否定矛盾的普遍性，他们过分夸大局部经验的作用，把只在一定范围内适用的特殊经验当作普遍适用的原理，反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这一创造性的科学论断，正是他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同教条主义斗争过程中作出的理论概括。

建国以后，在我们党内一度出现过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期，他们制造了所谓“顶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句句照办”等一系列荒谬理论。他们把普遍对特殊的指导变成普遍对特殊的硬套，把在普遍原理指导下的具体分析变成“对号入座”“贴标签”。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人们的思想从“左”的错误影响下解放出来，克服了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状态。但是有人借口解放思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对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思想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有人借口解放思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同样是对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割裂。我们党同上述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进一步有力地说明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确实是矛盾问题的精髓。

三、既要敢于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又要 注意着重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时时、处处存在着矛盾，没有无矛盾的地方，也没有无矛盾的时候。因此，对待矛盾的态度，必须是面对现实，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决不能否认矛盾，害怕矛盾，回避矛盾。

理论上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是一回事，实践中能不能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则又是一回事。一个时期，有些人竟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一致和谐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①

“许多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②他还批判了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的观点，指出：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这就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彻底坚持了矛盾普遍性的原理。

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就是要坚持科学态度。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领袖神化，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在人们的思想上形成了一种错误看法，好像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是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27页。

^②同上书，第336页。

不能加以分析的。这就是说，矛盾普遍性原理是不适用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运用矛盾分析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它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又恰如其分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既肯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又指出毛泽东思想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决议》在如何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彻底坚持了矛盾普遍性的原则。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些同志爱吹不爱批。喜欢讲成绩，不喜欢讲缺点。讲起成绩滔滔不绝，讲起缺点轻描淡写。在这些同志看来，在他们个人身上，在他们那个工作部门，仿佛就根本不存在成绩与错误、优点与缺点的矛盾。特别是还有些同志害怕矛盾，遇到矛盾“绕道走”、“躲着走”，对客观存在着的矛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熟视无睹。凡此种种，都是在实际工作中不自觉地否定矛盾客观存在的表现。由此可见，在理论上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同时，在实践中敢于坚持，才能保持理论的彻底性。

在实践中坚持矛盾普遍性原理，还必须注意着重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如果不着重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空话，甚至要歪曲矛盾的本来面貌，走向邪路。

为什么要注意着重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呢？首先，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都是由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只承认事物内部包含着矛盾并不等于就认识

了事物。我国的黄河比其它河流泥沙含量大，每立方米最大含量达五百九十公斤。治理黄河必须注意泥沙这个特殊矛盾。但是五、六十年代，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设计三门峡水库时，忽视解决泥沙问题，不考虑我国技术人员意见，生搬硬套一般治河方法——“阶梯开发”，即修筑一系列拦河坝，致使水库建成后，出现严重淤积，水库变为泥库。一九六四年周总理亲自同有关科技人员一起研究如何排沙问题，经过具体分析，认为：黄河带下泥沙，发生在汛期四个月，在这四个月里又集中在下暴雨的几天，这几天来的泥沙约占全年的一半。为了防止淤积，应当抓住时机“放”，放走的泥沙含有丰富的氮、磷、钾肥，可以放淤肥田。过了暴雨期，上游带来的泥沙少了，就可关闸蓄水。根据这种设想，在三门峡坝的底部凿了泄洪排泥隧洞，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二年经过两次改建，基本上解决了三门峡水库淤积的特殊矛盾。我国正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究竟有哪些特殊的矛盾需要解决？路子应该怎么走？我们摸索了几十年，现在才总算初步找到了这个路子，也就是说才算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矛盾的特殊性。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区别事物，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其次，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解决矛盾的基础。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我们经常讲要“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正是反映了这个道理。

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分析问题要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不是分析客观存在着的矛盾，而是主观臆想的矛盾，凭“想当然”办事。所谓片面性，就

是用片面代替全面，只看到矛盾的一个方面，看不到矛盾的另一方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表面性，就是用现象代替本质，对事物不做深入的研究，走马观花，粗枝大叶，轻率地随便作出结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此，一要客观地看问题，不要主观地看问题；二是全面地看问题，不要片面地看问题；三要本质地看问题，不要表面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

总结建国以来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忽视了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析和认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马列主义原理对于我国经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它是普遍原则，不能代替对我国国情特殊性的认识。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犯了“左”的错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认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使经济建设脱离了我国国情。在生产关系上，我们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追求“一大二公”，急于搞“过渡”。使生产关系超越现有的生产力，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我们思想上急于求成，片面强调高速度、高指标，使经济建设的规模超越了国力的许可，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六中全会《决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赵紫阳总理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和新方针，这都是分析矛盾特殊性的必然结果。

要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还必须正确处理执行上级指示、学习外地经验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关系，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不能搞“一刀切”、“一风刮”。上级的指示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执行上级指示，需要同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

情况相结合。如果只是照搬、照转“上级指示”，那就是用普遍性来代替特殊性。外地经验既有外地的特殊性，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学习外地经验，也要坚持从当时当地实际出发。如果一味照搬外地经验，搞什么“不掺假”、“不走样”，那实际上就是把特殊性的东西绝对化，然后用这种绝对化的东西，去代替对本单位特殊性的研究，这样，也不能正确地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

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是矛盾特殊性的两种情形。这两种情形说明，各个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在一个复杂的事物内部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个矛盾内部区分主要的矛盾方面和次要的矛盾方面，这是我们党决定经济、政治、军事的战略和策略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由于这个问题对于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专门列出一节作了系统的论述。

一、什么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一个比较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不是存在着一种矛盾，而是存在着两种或更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其中必然有一种矛盾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是非主要矛盾，或者叫做次要矛盾。比如，我国现阶段存在着许多矛盾。有敌我矛盾，还有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有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工人与农民的矛盾、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矛盾。经济领域，有积累与消费的矛盾，

^{*} 本专题阅读书目：《矛盾论》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301页。

生产与建设的矛盾。哪些是主要矛盾呢？主要矛盾就是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矛盾，确切地说，就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他矛盾都是次要矛盾。为什么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制约着其它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将推动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其他次要矛盾的解决。

既然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规定和影响其它矛盾，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以及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就必须抓住主要矛盾，集中精力去解决主要矛盾，以此推动其它次要矛盾的解决，促进事物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定要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抓主要问题，抓关键问题。俗话说“擒贼先擒王”、“牵牛要牵牛鼻子”就是这个道理。

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复杂关系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当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就暂时下降为次要矛盾。当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而是用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国内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当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就会公开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这是分析主次矛盾的一个光辉典范。

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看不到自己的朋友，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

小资产阶级也当作敌人来打，这种“打倒一切”的思想，壮大了敌人，孤立了自己。在方法上就是不懂得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与此相反，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一切力量孤立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主张的所谓“六路分兵”、“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平均主义，提出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主要作战方向，不能有两个主要作战方向。这都是对主要矛盾理论的具体运用。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一方面，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次要矛盾，解决了主要矛盾，就为解决次要矛盾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次要矛盾对主要矛盾也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东西，次要矛盾对主要矛盾也具有反作用。次要矛盾的解决，也有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制约。因此，在我们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的同时，也必须顾及次要矛盾的解决。比如，目前我国主要矛盾是解决生产力的问题，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我们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搞好四化建设。但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还必须解决精神文明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阶级斗争等次要矛盾。如果这些次要矛盾不去解决，党的作风不能有一个根本好转，听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蔓延，势必要影响经济建设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既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一条腿走路”、“唱独角戏”、“单打一”。必须学会“弹钢琴”的方法，十个指头都动作。就是要围绕中心，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例如水利建设要解决灌溉、发电、通航、养鱼等一系列问题，某一具体工程则着重解决一个主要矛盾，同时又不能忽视其他矛盾。一九五八年，在海河河口修建水闸，这对于解决天津市工农

业用水和生活用水起了很大作用，缺点是忽视了渔业生产。河螃蟹是在海水中产卵孵化，然后沿着河流上来，在河道及稻田成长，因河闸没有修渔梯，幼蟹上不来断了种。同时由于咸水上不来，使著名的天津银鱼失去了咸淡混水的生存环境，也绝了迹。可见，只有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又顾及次要矛盾，才能兴利除害，不然，会兴一利而废一利，除一害而生一害。

矛盾的不平衡性，不仅表现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而且还表现在主要的矛盾方面和次要的矛盾方面的区分上。主要的矛盾方面，就是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方面。非主要的矛盾方面，或者叫次要的矛盾方面，就是在矛盾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服从地位的方面。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处于支配地位，是主要的矛盾方面；无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处于被支配地位，是次要的矛盾方面。在我国现阶段，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是主要的矛盾方面；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处于被支配地位，是次要的矛盾方面。音乐和噪声对人体都有“利与害”两个矛盾方面。音乐有益于人的身心，现代医学心理学证明，音乐刺激内耳基底膜，通过听神经细胞传到大脑听区引起听觉，这一生理过程产生了健康的心理活动，使人情绪良好、精神愉快，而健康的心理又反作用于生理过程，使血液中增加一种有利于健康的物质，良好的情绪有调节内分泌适度平衡等作用，这是有利的一面。而对于不喜欢音乐的人或当你正在学习工作时，音乐则会成为一种有害东西，但从总体来说，音乐对人体有利一面占主导地位，是矛盾主要方面，因此音乐为人们所喜爱，为社会所提倡。与音乐相反，噪音是由不同频率和强度的声音不规则地组合而成的，它对人体有害的一面占主导地位。它破坏大脑神

经细胞，引起失眠、疲劳、头晕头痛、记忆减退；还可以引起消化系统疾病，如在八十分贝的噪声作用下，肠蠕动要减少百分之三十七，随之而来的是胀气和蠕动的不舒服感觉。当噪声停止时，蠕动由于过量的补偿其节奏大大加快，幅度增大，结果引起消化不良。噪音也有有利的一面，如医生可以通过人体内的噪音诊断疾病等。然而总的来看，噪音的危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有利的一面是很次要的。许多国家把它列为一大环境污染的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主要的矛盾方面支配着次要的矛盾方面，所以“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就是说，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旧中国，三大敌人占统治地位，是主要的矛盾方面，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在革命队伍中处于次要地位，这个革命就叫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以后，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处于次要地位，这个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使用价值要服从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价值要服从于使用价值。两者虽然都是商品生产，由于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商品内部的主次地位不同，生产的性质就有根本区别。

要认识事物的性质，不仅要矛盾双方进行全面分析，而且还必须分清双方的主次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分清主流和支流，从而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针和方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蒋介石。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石，使革命遭到极大损失。在革命事业中，分清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哪一方面是次要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的功过是非，指出成绩是主要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错误占次要地位，这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注意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事物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次要的矛盾方面对事物发展的作用。两方面都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是相辅相成的。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抓好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时也可能首先抓好矛盾的次要方面。为了更多地发展工业，首先要发展农业；为了更多地发展重工业，首先要发展轻工业；抓薄弱环节；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二、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转化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次要矛盾就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解放初期，我国因生产比较落后，解决旱涝灾害是水利建设的主要矛盾，同时还存在着动力问题等次要矛盾。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动力和交通运输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薄弱环节时，水利、发电和发展航运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防洪灌溉将会降为次要矛盾。民主革命时期，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当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大众同三大敌人的矛盾基本解决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一个企业，一度时期供产

销脱节、“无米下锅”的问题，可能是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当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之后，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不好，企业亏损的问题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当这个矛盾解决之后，干部和职工的技术文化水平、业务知识，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能变成最突出的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只有解决这个矛盾，才能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有一种情况，主要矛盾虽然没有解决，但是其它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了，也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矛盾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人民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就暂时降为次要矛盾。在一个企业，完成生产任务是主要矛盾。但是，在一定条件下，领导班子的不团结问题可能突然激化了，不解决这个问题，生产将会失去指挥，根本谈不上完成生产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首先解决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主要矛盾了。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转化，是我们党确定工作重心转移的客观依据。及时认识主要矛盾的转化，确立新的中心工作，制定新的任务、方针、政策，提出新的战斗口号，才能推动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如果认识不到主要矛盾的转化，就可能犯“左”的或者右的错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北洋军阀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原来革命势力内部分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这时，人民群众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有些人看不到这种主要矛盾的转化，思想上缺乏惊惕，当“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之后，由于缺乏思想准备，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破坏。抗日战争爆发

后，毛泽东同志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有些人看不到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反对统一战线的主张，犯了“左”的错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策划内战，主要矛盾又由民族矛盾转化为国内阶级矛盾。有些人又认识不了主要矛盾的变化，看不到战争的危險，抱着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寄希望于国民党反动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同样犯了错误。

建国以后，我们在认识和处理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错误的教训。毛泽东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根据这一正确理论，我们党先后开展“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并且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使我国顺利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党的“八大”及时分析了当时国内的形势，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但是，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八大”路线，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仍然是主要矛盾，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我们党的错误，进行反革命活动，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分析，重新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确的表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区分社会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是关系到革命与建设成败的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主要的矛盾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主要的矛盾方面可以转化为次要的矛盾方面，原来处于次要的矛盾方面也可以转化为主要的方面。矛盾双方主次关系的转化，主要是由于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力量消长的变化引起的。当矛盾双方主次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先进企业可能转化为后进企业。原来的后进企业，也可能转化成先进企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化？就是因为在这些企业里，先进因素与落后因素、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促进生产发展的因素与阻碍生产发展的因素，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就一个人来说，失足青年可以转化为劳动模范，多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也可能转化为走私贩私的犯罪分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化？就是因为在这些人身上的，进步的思想与落后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经过相互斗争，力量上此长彼消，在主次地位上发生了变化。有些人理论知识较多、但缺乏实践经验，经过参加实际斗争和锻炼，可以由“理论家”转化为“实践家”。有些人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缺乏理论知识，经过努力学习，也可以由“实践家”转化为“理论家”。党中央提出要我们的党风来一个根本好转，这就是要使党的优良作风同各种歪风邪气发生此长彼消的根本变化。在经济领域，这种转化是很明显的。在旧中国，工业十分落后，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所以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我们建立了四十多万个工业企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工

业产值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从而使工业生产在工农业生产的矛盾中，由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航天器在实际飞行中存在地球引力与惯性离心力的矛盾，当飞行器的速度在“第二宇宙速度”（11.2公里/秒）范围内时，地球吸引力是矛盾主要方面，离心力是次要方面，当其速度超过第二宇宙速度时，惯性离心力则变为主要矛盾方面，地球吸引力则降为次要矛盾方面。引水灌溉，在适量的限度内，利是矛盾主要方面，害是次要方面。但灌溉过量，土壤中空气不流通，作物生长会受影响，同时，土壤中的水量过多使地下水通过毛细管现象上升，将土壤里溶解的盐类带到地表，造成土壤碱化。在这些条件下，水害则上升为主要矛盾方面，水利成为从属的方面。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矛盾方面转化的过程中，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任何事物内部都有新与旧两种因素，新的方面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旧的方面由大变小，由强变弱。随着新旧两种因素的转化，旧事物也就转化为新事物，因此，主要的矛盾方面与次要的矛盾方面的转化，是一种普遍现象。

有些人不承认矛盾主次方面转化的普遍性，认为矛盾主次方面转化的原理，对一部分矛盾是适用的，对另一部分矛盾是不适用的。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似乎任何情况下都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践决定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永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会发生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不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由于看不到矛盾转化的多样性，从而否定矛盾转化的普遍性。生产力、经济基础、实践，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理论对

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实践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革命运动不能深入发展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确立，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当政治、文化、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文化、上层建筑的革新就是主要的决定的方面了。此外，象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等矛盾，也有点类似上述情况。在一般情况下，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当一个人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缺少为人民服务的真才实学的时候，解决专的问题不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吗？在一般情况下，政治是方向，政治决定业务，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当一个人虽然具有了较明确的政治方向，而缺乏技术与业务知识的时候，解决技术业务问题，不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吗？总之，不同的矛盾，转化的特点不一样，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生搬硬套。

三、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

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告诉我们，事物发展是不平衡的，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抓好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以促进事物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折衷主义的特点就是不分矛盾的主次关系，把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平列在一起，东抽一点，西抽一点，这一方面，那一方面，把许多现象罗列在一起，貌似辩证法的全面性，实际上掩盖了事

物的本质，这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坚持辩证法的重点论，就要反对折衷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是以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为基础的。重点论与两点论是统一的。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两点是以某一点为重点的两点。因为不同的矛盾、不同的矛盾方面，虽然在事物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但都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注意抓主要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的时候，也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和次要的矛盾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既要重视主要矛盾，又要顾及次要矛盾；既要重视主要的矛盾方面，又要顾及次要的矛盾方面，这就是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比如在当前，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也要拿出一定的力量，抓好精神文明的建设、党的建设、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等方面的工作。如果把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绝对化，使重点论离开两点论，重点论就会走向反面，变成形而上学一点论。

我们过去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就是把重点论搞成了一点论。只讲红的重要性，不讲专的重要；只讲政治的重要，不讲业务的重要；只讲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不讲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只讲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讲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斗争；只讲“以粮为纲”，不讲多种经营；只讲政治挂帅，不讲物质利益；只讲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讲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只讲积累，不讲消费；只讲建设，不讲生产，这种把辩证法的重点论变成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在林彪、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横行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制造了一个所谓“宁要——不要”的公式，实质上就是宁要一点，不要两点，把重点与两点绝对对立起来，仿佛坚持重点，就不能

坚持两点。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对于人们的思维方法的影响是很深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宁要——不要”的公式已为人们所抛弃，但是认识上的片面性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仍然严重存在。我们强调要搞活经济，有人就否定计划经济；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有人就想取消统一领导；我们强调多种经营，有人就忽视“以粮为纲”；我们肯定物质利益原则，有人就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坚持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有人就不顾及全局利益。可见，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是思想理论战线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反对形而上学一点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所谓主要倾向，就是指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所谓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就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还尚未充分暴露出来的次要矛盾和次要的矛盾方面。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次关系是可以转化的。当我们集中精力解决某种主要的倾向的时候，如果不及时间意解决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倾向，那么次要的倾向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主要倾向，这对于事物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必须同时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国革命经验的时候曾经指出，当我们主要反对右的倾向的时候，党内又容易出现“左”的倾向；当我们主要反对“左”的倾向的时候，党内又容易产生右的倾向。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就是要用重点论与两点论统一的原理认识事物，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防止事物向不利的方面转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着重解决了思想僵化的倾向，同时也及时注意解决自由化倾向，从而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各方面相互关系的两种属性，是矛盾法则的基本内容。它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矛盾的各方面既统一又斗争推动的，只有研究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才能深刻认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促进事物的转化，推动事物的发展。

一、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呢？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①他还具体地指出了矛盾的同一性有两层含义。他说：“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②

矛盾同一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之下相互依存，组成一个统一体。事物矛盾着的两

* 本专题阅读书目：《矛盾论》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308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302页。

个方面本来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是极不同一的，为什么又能相互依存，共居于统一体中呢？“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①也就是说矛盾双方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苏联霸权主义者侵略阿富汗，苏与阿构成了侵略与被侵略的两个方面，没有苏的入侵，阿是一个独立国，由于苏的入侵，阿就成为被侵略者。苏与阿，侵略与被侵略就成为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矛盾的双方。一切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都是如此，作用与反作用、化合与分解、同化与异化、生与死、祸与福、领导与群众、民主与集中、困难与顺利、真理与谬误等等，都是互相对立，互相依赖，一方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彼此规定着对方的内容、特点，每一方都是在与对方不可分割的联结中而存在。

矛盾同一性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事物矛盾着的两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各向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实现这种转化的原因，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同一性是事物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内在根据，为转化提供了“由此达彼的桥梁，”使转化具有可能性。生产可以转化为消费，消费也可能转化为生产，原因在于二者都是相互制约的社会经济活动，相互之间具有同一性。生产不能转化为石头，就因为二者之间没有转化的根据，即没有同一性。所以，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是同一性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②比如，宇航员坐在航天器上在太空飞行，刚开始会出现超重现象，受到超过自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

②《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2页。

身重量几倍的重力，身体好象被钉在座椅上，血液都集中下半身。当航天器进入轨道后，超重转化为其反面即失重，这时宇航员不再感觉身上沉得慌，倒觉得全身轻飘飘。在日常生活中，矛盾双方转化的现象，同样比比皆是。如生转死，死转生；劳转逸，逸转劳；开会转休息，休息转开会；困难转顺利，顺利转困难；成功转失败，失败转成功……无数现象说明，任何矛盾的两个方面，最终都要转化到自己的对立面去。

矛盾双方怎样才能相互转化呢？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①兵器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武器、古代冷兵器、火药和火器、近代和现代常规武器、导弹和核武器几个阶段。这种由落后转化到先进是以生产、科学技术以及战争的发展为条件的。一个企业可以由亏转盈，但必须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找到亏损的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国家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转为现在的安定团结，是通过全党全国人民在政治、思想、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实现的。没有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好形势。承认不承认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性，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区别于唯心主义诡辩论的标志之一。一切诡辩论者都抹煞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四人帮”歪曲“精神变物质”的命题，否认精神转变为物质的根本条件即实践，鼓吹“精神代替物质”。不通过实践，精神只能是精神，不会成为物质。所以讲转化，而不讲条件，决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只能是唯心主义的诡辩论。

矛盾双方的转化，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但是，在人类社会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60页。

里，矛盾转化的条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人去创造。我们对创造条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创造条件不是凭主观臆想的蛮干，而是要根据客观现实所提供的可能性，进行行之有效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事物矛盾双方的转化创造出现实的条件，否则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上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其原因就是超越了客观现实所提供的可能去创造条件，结果吃了很大亏。

矛盾的同一性是客观的，又是具体的。同一性是具体的，就是说各种特殊矛盾具有特殊的同一性，也就是矛盾的每一方在特定条件下，“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具体联结、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问题。事物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同一性，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提出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等等就是一些具体的同一的表现。正确地认识各种具体的同一是正确把握一般的同一的前提。有的人就是因不理解同一的多种具体形式，而用某一形式硬套一切事物，将同一性简单化、庸俗化。当套不上时又反过来否定同一的普遍性。如物质与意识能否相互依存呢？有人持怀疑与否定态度。认为只能说没有物质就没有意识，但不能说没有意识就没有物质，因为早在意识产生之前物质世界就存在了，因此物质与意识不是相互依存的。这种看法就是缺少对这一矛盾双方同一性的具体分析。物质与意识的同一性应在认识论范围去考察，物质是被反映者，意识是反映者。没有被反映者，也无所谓反映者；同样没有反映者，物质世界虽然存在，但它本身则失去被反映的关系，即不成为被反映者。正是在反映与被反映关系上讲，物质与意识是相互依存的，并不是说没有意识就没有物质世界的实体。如果按照一些人简单化

理解，物质与意识这一宇宙间最基本的矛盾都不具备同一性。那么同一性原理还有什么普遍意义呢？由此可见具体地理解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是很重要的。

矛盾双方的斗争性是矛盾双方关系的另一种属性。矛盾双方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一种性质。事物矛盾的双方虽然有着同一性，但二者毕竟是相反的两极，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不同一”性。吃饭与建设是一对矛盾，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吃饭占用的消费基金多了，用于经济建设的积累基金必然减少；反之用于经济建设的多了，吃饭所用的就会减少，这种你多我必少，你少我则多的现象，就是吃饭与建设这一矛盾双方斗争的表现。

“斗争性”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哲学概念。它存在于自然、社会的一切矛盾中，包括一切形式的矛盾双方的斗争。自然界里的化合与分解，阴电与阳电，同化与异化之间的互相作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武装冲突、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都包括在斗争性的范围内，都是矛盾双方斗争性的不同表现。有些人认为，只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战争、冲突才叫斗争，别的矛盾双方的对立不叫斗争。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阶级斗争、战争等仅是矛盾双方“斗争性”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全部表现。因为阶级斗争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与作为哲学概念的“斗争”不能等同。后者与前者相比，内容更为广泛、丰富，形式更多样。因此，需要正确区分二者，不能以个别代替一般。

矛盾的斗争性具有不可调和的特点。有矛盾就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总是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或者二者同归于尽，而不可能出现矛盾双方永远和平共处的情况。这就是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社会生活中，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是不可调和

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原则问题上，也是不可调和的。毛泽东同志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本身就包含着同错误思想的斗争。因此，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要坚持原则，坚持恰当的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应该“和稀泥”、无原则迁就，要促使矛盾向正确的方面转化，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二、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事物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那么，二者的关系如何呢？

1，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

在任何一个事物的矛盾中，同一性和斗争性都是同时存在、相互依存的。同一是斗争中的同一，斗争是在同一中的斗争。离开斗争性的同一性与离开同一性的斗争性都是不存在的。这就叫做“在统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而斗争性即寓于统一性之中。”^①

同一性离不开斗争性，它以差别、对立为前提。离开斗争性的所谓同一性，只能是抽象的绝对同一，这样的同一性在现实的具体事物中是不存在的。抗日战争期间，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着投降与反投降、妥协与反妥协，倒退与反倒退斗争，正是这些斗争才赢得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平衡是一种同一性，而不平衡则是斗争性的表现。平衡是离不开不平衡的，在国民经济的平衡中存在着各地区的不平衡，并且正是在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地区有高有低的不平衡中实现了全国的平衡。形而上学把事物的同一看成僵化的同一，看不到同一中的斗争，否认同一对斗争的依赖性，认为一切都是永久不变的。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

正如同性不能脱离斗争性一样，斗争性也不能脱离同一性。矛盾的斗争是在统一体内进行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当然谈不上什么斗争。真理和谬误能展开斗争，原因在于二者都存在于人们认识活动的统一体中。人们开展批评，只有在一定关系中，如同志关系、朋友关系等范围内方能进行，若两个人毫无关系，那就谈不上什么批评了。这些都说明现实中的斗争性是离不开同一性的，斗争是同一中的斗争，而离开同一的斗争也是不现实的。只看到矛盾双方的斗争，无视其同一性，脱离同一讲斗争，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2，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二者是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所以是相对的。任何矛盾的双方，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又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没有一定的具体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而矛盾同一性所依存的条件不是凝固的，是不断变化的。同一性要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条件的变化由互相依存走向互相转化。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他们共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统一体中。但是这种统一体不是永久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终将要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这个统一体就要破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地位就要转化，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就要被社会主义社

会所代替。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因而也是相对的。

斗争性是无条件的，贯穿始终的，所以是绝对的。任何矛盾的斗争性都无条件地存在于同一性中。没有斗争，矛盾的双方不能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也不能互相转化。还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例，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两个阶级互相依存的统一体中，而且存在于两个阶级互相转化的过程中。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论是处于相互依存的资本主义统一体的时候，还是处于这一统一体破裂，由新的统一体所代替的过程中，两个阶级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特别是在矛盾双方互相转化，使统一破裂的过程中，斗争则更加尖锐、激烈。所以说，斗争性是无条件的，贯穿始终的，因而它是绝对的。

根据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具体矛盾时，首先不能把一具体事物看成是僵死的铁板一块，而应看到其统一体内的矛盾及其差别和对立，即从同一中把握对立。另外，在分析不同矛盾方面对立时，不能将矛盾双方看成是绝对不相容的东西，把二者割裂开来，孤立起来，而应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即从对立中把握同一。俗话说说的“同中有异”、“求同存异”就是这个道理。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是“同中有异，求同存异”的一个典范。在统一战线中“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右倾或“左”倾错误，就是割裂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的表现。实际工作中，违背对立统一关系的现象是经常出现的。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脱离同一性而谈斗争性；一种是脱离斗争性而谈同一性。例如，对待物质和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和政治，物质利益和思想

工作，民主和集中，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等等关系，有时候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只看到斗争性看不到同一性，有时会把两者混同起来，只看到同一性看不到斗争性，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论脱离同一讲斗争，还是离开斗争讲同一，在思想方法上都是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中都必然导致工作失误。

三、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 推动事物的发展

任何事物的矛盾，既有同一性的一面，又有斗争性的一面，都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对立统一。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①

“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②因此，在处理事物矛盾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同一性的作用，也要重视斗争性的作用，忽视任何一方的作用都是片面的。

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它是事物发展的基础或条件。事物的发展是通过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使事物经过由量变到质变完成的。而这个过程总是在矛盾统一体中实现的，没有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的同一性，事物的统一体就不会存在，更谈不上事物内部矛盾力量的变化以及事物自身的发展了。例如，在农、轻、重之间比例关系协调情况下，它们才能各自迅速发展，从而带来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所以强调生态平衡就因为生态平衡也是一种同一性，它保持了生态系统中各种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35页。

生物、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物质交换和能量转化的彼此协调，促进生物本身的发展，从而能够造福于人类。现代控制科学技术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调整控制对象内各种关系，使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系统得以稳定或达到某种特定状态。如工程技术中，动力系统要求频率、电压等的恒定，化学工业要求温度、压力、反应物质浓度的稳定等等。正是这些稳定条件保证了生产、工作的正常秩序。另外，事物矛盾双方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二者自身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共同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同一性的桥梁，各从对方吸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促进矛盾力量的变化和事物的发展。无产阶级直接利用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科学文化成果就是一例，在其它的矛盾中，同一性的这种作用也是普遍存在的。

事物矛盾的发展过程，是矛盾双方力量变化的过程，而矛盾力量变化的动力在于矛盾双方的斗争性。矛盾的斗争就是矛盾的一方对另一方的限制、排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矛盾双方竞相争高，此消彼长，造成双方力量变化。存在于矛盾全过程的斗争性的不断进行，推动矛盾双方力量不断变化以至双方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使事物由量变阶段进入质变阶段。当矛盾双方力量彻底突破旧事物的限度时，则完成了事物的根本质变。抗日战争中，为了打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进攻，我方一面尽可能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参加抗战，另外，在同敌人的多次战斗中消灭了大量日本侵略军，缴获了大量武器，使我方力量逐渐壮大，敌方力量逐渐削弱，双方力量对比先后经历敌强我弱、基本平衡、我强敌弱的三个阶段，最后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没有我方的努力奋斗，抗日力量不会壮大，敌方力量也不会消减，同时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历史的前进。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其本身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就自动化科学技术来看,在各种自动控制过程中存在着控制手段即控制器和被控制对象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同一性表现为二者关系的协调性,斗争性则相反。自动控制技术出现初期,因生产过程、武器装备等被控对象还比较简单,与之相适应的自动控制手段主要是单机的自动调节器,它可以解决单一过程的控制问题,如控制锅炉的水位,蒸气机的温度、水轮机的转速、火炮自动瞄准射击等。这种半自动化带来了生产、军事等大飞跃。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空间技术的发展迫切要求解决高速飞行器的控制问题。这种新的控制对象本身是十分复杂的系统,而且影响它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又往往随时间急剧变化,对此原有的单输入、单输出的自动调节器则无能为力。二者关系的不协调的结果出现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新的控制手段。生产等过程的半自动被全盘自动化取而代之;单机自动化让位于综合自动化。七十年代后,新的不协调又逐渐暴露出来,它促使自动控制手段从电子计算机向人工智能过度,自动控制也趋向大系统的最优控制。可见,自动化技术就是在自动控制手段与被控对象的协调与不协调即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结合中发展过来的。

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共同起着作用。但并非二者作用时时处处完全是均衡的。实际上,因矛盾性质、矛盾发展的阶段以及其它条件的不同,两者作用总有一方占主导地位,另一方占次要地位。掌握这一点对于我们处理好实际工作中的具体矛盾关系极大。根据不同矛盾和矛盾发展不同阶段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来恰当地选择解决矛盾的主要手段和次要手段就可能使矛盾顺利地解决,如果不了解矛盾本身的客观要求,盲目地采取解决手段,或把一种手段绝对化,则必然会把事情办坏。例如事物量

变阶段，一般是同一性占主导地位，斗争性处于次要地位，我们应该主要发挥同一性作用，否则，会犯“左”的错误。当事物发生质变时，则要以斗争手段为主，不然，会犯右的错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同国民党的矛盾就应以求同一为主要任务，斗争服务于团结。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团结破裂，我们就应以斗争为主要手段。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以平衡为基本条件的，我们只能以促进平衡为主要目的，不能搞一马遥遥领先，万马望尘莫及的蠢事。“四人帮”一伙鼓吹“斗争就是政策”，不顾事物矛盾本身性质和矛盾发展的阶段如何，把斗争做为唯一法宝，将同一性说成保守性，结果斗得全国一团糟。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不能主观地认为斗争性和同一性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事物矛盾进行具体分析，根据矛盾本身客观要求来决定。同时，不论以那种手段为主时，都不要把次要手段置之脑后。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矛盾的斗争性问题中，包括矛盾斗争形式问题。矛盾斗争的形式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和它所处的条件。矛盾的性质是千差万别的，但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抗性的**，另一类是**非对抗性的**。在一般情况下，解决对抗性矛盾采取对抗形式，解决非对抗性矛盾采取非对抗形式。但在不同的条件下，矛盾的性质可以互相转化，斗争形式也随着可以转化。

一、什么是**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对抗性矛盾最终是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即对抗的形式才能解决。在自然界，例如雪崩、海啸、地震、火山爆发、星体相撞、原子核裂变释放能量，以及动物间大食小、强吞弱等都是具有激烈的外部冲突形式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矛盾。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根本利益相冲突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一般是对抗性的。如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矛盾、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等，都属对抗性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最终解决。战争则是阶级斗争最剧烈的形式，也是社会生活中对抗性矛盾斗争的最高表现。在社会主义时期，

*本专题阅读书目：《矛盾论》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10页。

剥削阶级虽然消灭了，但由于还存在着反革命分子、敌对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各种犯罪分子，这些人的利益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仍然是敌对的，他们与人民的矛盾还是对抗性的，对此，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用对抗的手段，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去解决。

对抗性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始终以对抗的斗争形式出现，一般在矛盾发展的最高阶段才采取对抗的形式。发展过程较长的对抗性矛盾，在矛盾彻底解决之前，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非对抗形式存在，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出现对抗性形式，但这种对抗比起最终解决矛盾时的对抗程度也是有差别的。所以不能把对抗性矛盾与对抗的斗争形式时时处处等同起来。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矛盾的最终解决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对抗的形式。但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漫长的斗争历史上，则既有对抗的形式，又有非对抗的形式，二者此起彼伏，交互出现，而且有时非对抗形式是主要的，有时对抗的形式又是主要的。

除了对抗性矛盾外，还有另一种性质根本不同的非对抗性矛盾，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非对抗的斗争形式。在公共汽车上，有些青年人不主动给老年人让座位还心安理得，对这种不文明行为，乘客可能投之以谴责的目光，也可能直言批评，但却不能叫警察把他抓起来，原因在于道德与非道德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在社会生活中，根本利益一致的人们之间的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例如我们国家工人与农民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过去由于长时期农业生产落后，农副业产品价格偏低等原因，农民收入与工人收入相比差距过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解决工农矛盾，国家采取了缩小剪刀差、工业支援农业等措施，尤其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从而使农民生活水平明显好转，工农差别逐步缩小，农业生产恢复了生机。这一系列措施就是解决矛盾的非对抗形式。无论在那个领域，一般来说，凡不经过剧烈的外部冲突的斗争形式来解决的矛盾都属非对抗性矛盾。如生物发展过程中遗传与变异的矛盾，生物体内细胞的生与死的矛盾，思想领域中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一般也都属于非对抗性矛盾。

二、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相互转化

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不能混淆起来。但是它们之间又有一定联系，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转化。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越发展，社会财富越多，而劳动人民消费水平相对地越来越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才能由过去的对抗性质转变为非对抗性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劳动人民，消费水平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提高的。即便一时出现不协调现象，通过自觉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可以使矛盾得到合理解决。再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本来是敌对阶级，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时期内矛盾的性质也可以转化。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以及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正确的政策等因素的存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解决，主要的不是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而是通过和平赎买的形式，使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接受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

阶级的矛盾，在我国特定条件下，由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解放战争中，我军俘虏的战犯经过长期改造教育后，其大多数已由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转化为人民的一员，有些还为人民和国家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例如，一个人犯了错误，经过教育仍然执迷不悟，不能悔过自新，继续沿着错误道路走下去，那就有可能滑向与人民为敌的泥坑。从犯错误到犯罪，矛盾性质就发生质变，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党内同志间不同观点的争论甚至路线斗争，一般都属于非对抗性的。如张国焘在长征途中闹分裂，另立中央犯了严重错误，为了挽救他，党一直将其错误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但由于张本人拒不认错，以至最后发展到叛党投敌的地步，这样，由党内的非对抗矛盾完全转化为敌我性质的对抗性矛盾了。

同一切矛盾的转化一样，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相互转化关键也在于条件。条件有内外之别，一般情况下，内部条件在转化中起主要作用，张国焘的叛逃就是一例。但外部条件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对那些边缘性的矛盾的发展方向，外部条件往往起着催化剂作用。战场上，因我军实行缴枪不杀、宽待俘虏等政策，处于绝望中的敌人可能投诚，成为我军的补充力量。而一个失足青年当处于徬徨苦闷之际，若得不到社会及时的关心与正确引导，则可能在迷雾中走得更远。在这两种情形中，外部条件的作用显然是很重要的。

三、掌握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 矛盾原理的实际意义

区分事物矛盾的对抗性质与非对抗性质，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从哲学上懂得这一道理，才能以适当的方法正确处理社会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社会中的矛盾基本可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一般情况下，“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①，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同质的矛盾决定不同的斗争形式，因此我们必须用对抗的手段去解决敌我矛盾，用非对抗的手段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把武装斗争当作一大法宝，把革命战争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这取决于我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矛盾性质本身。如果对敌人发慈悲心，将非武装形式作为解决敌我矛盾的主要手段那只能断送革命。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矛盾同样不能轻视，一般情况下还必须以对抗手段来解决，当然现在的对抗形式有所变化，在国内来讲它已经不是战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近几年来，经济领域大量出现的严重犯罪活动，以触目惊心的事实向我们表明，对于反社会主义的各种敌对分子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不然，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很难付诸实现。

与敌我矛盾不同，人民内部矛盾则要用非对抗方法来解决。这一条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重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人民根本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28页。

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而与之相适应的解决矛盾的方式只能是非对抗的，即说服教育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但是多年来，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加之我党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偏差，把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统统归结为“路线斗争”，把“路线斗争”归结为敌我斗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颠倒是非，混淆了敌我，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人民利益蒙受极大损失。从沉重的教训中可以看到，“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①不同性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具体事物的矛盾是复杂的，在解决一个大的矛盾过程中，往往不是只用一种斗争方式，而是以一种方式为主，同时还辅助以另一种斗争方式，如解放战争前夕，我党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也举行过重庆谈判，后来又对北平实行和平解决，都是以对抗性形式为主同时辅助以非对抗形式来解决矛盾的情况。以非对抗形式为主再结合以对抗的形式的情形也是存在的。如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平的手段是主要的，另外根据一定时期实际的需要又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应当指出的是，解决一个具体矛盾，究竟采用一种还是两种斗争形式，不能机械地硬套公式，要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当用对抗形式去配合非对抗形式时，更须谨慎从事。

根据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做好革命的转化工作也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重要内容。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转化的方向如何，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以实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无产阶级则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向有利于革命方面转化，防止向不利于革命方面转化。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党的正确政策是可能将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扩大革命力量，缩小敌对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党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如根据不同时期革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有些虽然是很短暂的，但这些转化工作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对于犯错误同志我们党历来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主张尽可能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甚至对那些已走到敌我矛盾边缘的人还是尽量挽救，宁拉勿推，做到仁至义尽。尤其对那些处于落后的同志，不能看成是不可雕的朽木，要看到其积极因素，应努力创造条件促进其向先进方面转化。

自然界对抗与非对抗矛盾的相互转化就其本身而言，不存在什么好坏利弊之分，但是与人类联系起来情况则大大不同。所以，根据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别与转化的原理，可以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例如人们把热核反应的巨大能量，用外部冲突的猛烈形式在瞬间释放出来，这就产生了核武器。反之，将热核反应的能量慢慢释放出来则可服务于生产和生活。核电站的建立就是如此。另外，人们还利用生物界对抗的斗争形式为人类服务，如生物治虫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自觉利用自然界对抗与非对抗形式的前景是无量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战争 战略中的运用和发挥

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 注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四篇军事著作，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典范。而根据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原理，着眼于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并依照这些特点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则是这种运用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从中领会他如何着眼于分析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对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

* 本专题阅读书目：《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章第一节，战争的规律是发展的。第五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158，170—176页。《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六、注意研究军事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510页，第519页。《论持久战》战争和政治。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448页。

性的原理，研究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革命战争既包含战争的一般规律，又包含自身的特殊规律

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发现、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并依据这些规律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夺取战争的胜利。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发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呢？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战争规律问题上提出，只要学得了历届政府和军事学校出版的军事条令，特别是学得了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 and 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就可算是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照着去做就可以夺取战争的胜利。而党内的某些经验主义者则认为，只要懂得了北伐战争的经验，学得了北伐战争中长驱直入、攻打大城市的办法，也算是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照着去做同样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特别是在后来有关总结这一时期军事路线历史经验的许多重要著作中，逐条批驳了这些论点，并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指出，依照战争的情形、性质以及和它以外事物的关联的不同，有关战争的规律并不是一种，而是有多种。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所要研究的战争规律可以区别为这样三种不同的战争规律：一是一般战争的规律。这是指古今中外一切战争都必须遵循的普遍起作用的规律。任何战争都是政治的继续，所有战争都遵循“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等，都是一般战争规律。二是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指存在和起作用于革命阶级进行的战争中的规律。动

员和依靠人民进行战争，由弱到强逐步取得战争的胜利等，就都是革命战争的规律。三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指存在并起作用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革命战争中的规律。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特别强调指出，我们进行的是中国革命战争，它既然是战争和革命战争，其中当然也包含一般战争规律和革命战争规律，它要受这些规律的影响和支配。但是，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①，我们只有对以上三种既相联系而又相区别的战争规律都加以透彻的研究，才可算懂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才能胜利地指导战争。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对三种战争规律的科学的区分，是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即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互相联结的原理在战争规律问题上的具体运用。这一原理告诉人们：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互相联结的。每一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不仅包含了它自身的个性，而且包含了与它相联系的事物的共性。一切事物内部都是这种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认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既要研究一般战争和革命战争的规律，又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他坚持了这一原理，看到了中国革命战争这个事物和一般战争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它个性的一面。毛泽东同志把这一原理直接用于区分不同的战争规律，这就把事物发展规律的构成情况揭示得更加具体明确了。他还进一步向人们指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事物也象战争一样，其内部规律都可区分为普遍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规律和特殊规律这两个方面。水稻具有植物生长的一般规律，同时又有它自身的特殊规律。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包含着暴力革命的普遍规律，同时又有它特殊的规律。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内部规律都是这种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

由此不难看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在战争规律问题上的意见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客观事物内部包含着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两个方面。他们否认中国革命战争还有它的特殊规律，因而陷入了用一般战争规律代替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的形而上学的泥坑。

在认识事物规律之前，首先确认它的内部包含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这两个方面，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毛泽东同志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提倡和使用的这一思想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果只看到事物内部有和它相联系的事物共有的普遍规律，不去深入研究特殊规律，那么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就一定是不完全的。相反，如果只看到事物有它的特殊规律，忽视对普遍规律的研究，那么对事物规律的认识也一定是不完全的。我们要获得对事物发展规律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同时从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两个方面去加以考察和研究。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正确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就要象毛泽东同志区分战争规律那样，看到其中既有各种不同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又有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还有它特殊的表现形式。我们只有首先对经济规律做出这种科学的区分，并同时去加以考察和研究，才能做到既不违背人类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又不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正确而又自觉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二、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要着眼其特点， 着眼其发展，注重研究它的特殊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既包含战争和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又包含自身的特殊规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重点应研究哪一种规律呢？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有关著作中明确提出，重点应研究后者，而不是前者。他指出：“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①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②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着眼其特点，就是要强调注重从中国革命战争与其它战争的区别上把握其特殊规律。例如中国革命战争与俄国革命战争有共同点，有联系；也有不同点，有区别。但我们应着眼其不同点和区别，并以这种不同点和区别作为制定战略战术原则的主要依据。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着眼其发展，则是强调要从中国革命战争各个发展阶段的区别上把握其特殊规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北伐战争虽然同是中国革命战争，但它们是这一战争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二者有共同点，有联系，也有不同点，有区别。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就应着眼于这种不同点和区别，并以这种不同点和区别作为制定战略战术的主要依据。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战争中照抄照搬别国、别地和别时的经验，才能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正确地指导战争。

研究中国革命战争为什么要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注重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研究它的特殊规律呢？毛泽东同志从这样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论证。

首先，从一般战争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的相互关系上讲，二者既有相联系的一面，又有相区别的一面。从联系上说，一般战争规律是对各个不同战争的特殊规律的抽象和概括，它存在于各个具体的特殊规律之中，它对具体的个别的战争包括中国革命战争都有一般指导意义。从区别上说，一般战争规律又不能完全包括各个具体战争的特殊规律。一般战争规律是抽象的，我们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是具体的，它远远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革命战争与别国的战争与北伐战争比较，有四个主要特点：（1）中国革命战争发生在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2）中国革命战争遇到的敌人异常强大；（3）战争中作战的红军力量弱小；（4）中国革命战争有共产党的领导，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有农民的援助。所有这些特点，都是一般战争规律不能回答的，都是一般军事教科书上找不到的。而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及许多战略战术的制定，正是依据了这些特点。其中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上是由防御转入进攻，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等许多重要的战略战术原则。

这就说明，一般战争的规律，不是制定战略战术的出发点，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才是制定战略战术原则的出发点。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就谈不上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

战争。

其次，从土地革命时期军事上胜利或失败的历史经验上看，无论是红军还是敌军，能否做到从每次战役或战斗的特点出发，都是关系战役或战斗胜败的关键所在。敌军前四次“围剿”所以失败，在于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它作战不同的战略战术，采取了老一套的作战方法。而红军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同样在于忽视了对这次反“围剿”特点的深入研究。当敌人改变了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因而使红军遭受到重大损失。

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同志得出结论：如果不注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不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就是一点儿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也没有，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这里提出的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要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注重研究其特殊规律的原则，既是重要的军事思想，也是重要的哲学思想。是他后来写的《矛盾论》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科学原理，第一次较为明确的表述。这一认识事物规律的重要方法，贯穿于毛泽东同志全部军事活动和全部政治活动中，可以说是他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之一。军事上，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方法，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制定了区别于别国情况和北伐战争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在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根据这一方法，着重分析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制定了适合于抗日战争情况的战略战术原则。当进入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同样运用这一方法，着眼于考察解放战争时期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进攻阶段的新特点，规定了适合解放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政治上，毛泽东同志仍然是根据这一方法，制定了不同于别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和

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历史已经表明，中国革命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引下，注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结果。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尤其要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方法，充分认识这一方法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要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的思想，对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自觉地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第一，它告诉我们，在研究事物规律的时候，要以研究它的特殊规律为主；第二，它向人们指明，研究事物的特殊规律，既要从这一事物与其它事物的比较中把握这一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又要注意从这一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上把握它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横的和从纵的两个方面，或从静的和动的两个方面对事物进行考察，这样才能切实把握住事物的特殊规律。在全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能不能坚持做到着重研究事物的特殊规律，仍然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关系，如何认识和处理外国经验与我国国情的关系，怎样认识和处理上级指示和本地实际情况的关系等，都和这个问题有关。学习毛泽东同志研究战争要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的思想方法，来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就是要坚持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以研究我国的国情为主。学习外国经验，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执行上级的指示，不搞照抄照搬，要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对各项工作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三、研究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要从时间、地域和性质三个环节入手

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要以研究它的特殊规律为重点。怎样才能把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与其它战争的一般规律区别开来呢？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分析，对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很有启示。他指出：“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①

从时间、地域和性质这三个环节入手去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如何研究认识战争的特殊规律问题所规定的一条重要原则，其中同样包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既没有时间、空间以外的东西，也没有脱离事物的时间、空间。以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去区别各种事物，正是认识事物特殊性的方法之一。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时间、地域的不同来区别不同的战争规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在认识战争规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它向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人们指明，只要时间不同，战争所在的民族和地区不同，这种战争就必然有其特殊规律，就不能把它和其它战争等同看待。毛泽东同志概括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首先就是从时间和地域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从时间上说，中国革命战争发生在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以后，这就决定了它的战争规律决不会与北伐战争的战争规律完全相同。从地域上说，中国革命战争发生在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就使得中国革命战争有广大农民参加，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战争有回旋的余地等。它的规律决不会与别国，特别是苏联国内战争的规律相同。这样也就把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与其他战争规律明显地区别开来。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从战争性质上把握战争的特殊规律的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事物的规律性决定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内容及其依赖的客观条件。时间和空间是战争依赖的客观条件。而战争的不同性质则是决定不同战争特殊规律的内在原因。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的性质不同，它们的规律也就不同。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的性质不同，它们的规律也就不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第四个特点：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就是从战争性质上把中国革命战争同其它一切战争区别开来，从而找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历史证明：在研究战争时能否从时间、地域和性质这三个环节入手去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战争胜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为什么主张照搬苏联内战的经验，为什么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推行盲动主义，后期又推行逃跑主义，就在于他们不懂得从时间、地域和性质上去把握各个时期不同的战争指

导规律。毛泽东同志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就在于他把这一认识方法贯穿到了他的全部军事活动之中。因此，是否能坚持从时间、地域和性质上去认识事物的特殊规律，对我们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学意义。

毛泽东同志强调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要从时间、地域和性质这三个环节入手的思想，是我们打开研究事物特殊性大门的一把钥匙。无论从事哪项工作，都经常会遇到是因循守旧，还是勇于走新路的问题，经常会遇到是照搬别地经验还是坚持因地制宜的问题。那些因循守旧照搬别地经验的人，所以在工作中毫无创见，碌碌无为，就在于他们不懂得时间地域变了，因而从事的工作的规律也就变了。我们现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方法，就是要善于经常从时间、地域和性质这三个环节入手，或者说从时间、地点、条件入手，这样才能自觉地去认识各种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搞好各项工作。

把握战略全局

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

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是毛泽东同志军事著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有关著作中提出的把握战略全局，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的战争指导原则，不仅是重要的军事思想，而且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学习毛泽东同志这方面的有关论述，对于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学会认识和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一、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战争全局和局部的问题上曾犯过抹煞二者区别、割裂二者联系的形而上学错误。他们在战争指导上毫不考虑对战争全局是否有利，而是不加区别地搞“四面出击”，认为不管什么情况的战役或战斗的胜利都能带来全局或战略的胜利。结果使红军

*本专题阅读书目：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章第三节，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162页。

遭受到了重大损失。为了深刻记取这一历史教训，引起全党对战争全局即战略问题的重视，毛泽东同志曾在他的不少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指明了在战争中应如何处理这种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时，首先指出了全局和局部问题在战争中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①他还指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②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不论战争规模多大都有战争全局和局部之分，强调战争全局存在的必然性，从根本上找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战略全局，一味搞“四面出击”的认识论根源，揭示了他们否认战争全局和局部有区别这一错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实质。

毛泽东同志所以认为凡战争都有战争的全局和局部，主要是依据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着，它总是同周围其它事物相互联系着，相互影响着，相互依附着，相互作用着。只有在一定的联系之中才有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这种普遍联系构成物质世界的统一整体。战争当然也是这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战争中涉及的各个方面，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和进行的，如敌方和我方、前方和后方、主攻和助攻、作战和休整、集中和分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散、进攻和防御、消耗和补充、本军和友军、干部和兵员、上级和下级、红区和白区、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就都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着的。同时战争中各个作战阶段也处在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状态。大踏步后退是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反攻是退却的继续等，就是这种相互联系的表现。显然，战争中这种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就构成了战争的总体或全局。战争中各方面和各阶段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性也就决定了战争全局存在的必然性。毛泽东同志把凡属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叫做战争的全局，就是用军事语言对这种相互联系做出的概括。

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光辉历史，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有战争就会有战争的全局”这一科学论断的正确性。毛泽东同志所以被称为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于他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始终重视区分和处理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他不仅高瞻远瞩地把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看作是一个全局，科学地预见到了它们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联系和区别，制定了指导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战略原则；而且在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每一阶段上又把各个时期的战争进一步从全局和局部这两个方面去进行考察，分别制定了适合每一阶段上战争情况的战略指导原则和战役战术的指导原则。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把整个反“围剿”的斗争看作是战略全局，正确地照顾到了反“围剿”斗争中各方面、各阶段的联系，使红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科学地从全局上分析了整个抗日战争的情况，提出了抗日战争将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的战略思想，指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指引中国人民逐步取得了抗日

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把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做为战争的全局，正确地制定了战略进攻的指导方针和原则，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只要有战争就必然有战争全局。

毛泽东同志关于有战争就有战争全局的科学论断，既然包含着事物普遍联系的哲学思想，它就必然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抽掉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的军事意义，它还可以使我们从中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领域，任何战线也都有一个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凡属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相互联系的就都是带有全局性的。如果工业、农业、商业是局部，照顾这几方面联系的整个国民经济就是全局。如果一个省是局部，照顾各省之间联系的国家就是全局。如果各车间和科室是局部，照顾它们之间联系的全厂就是全局。总之，事物的全局和局部是不可分割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确认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毛泽东同志从事物构成方面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新贡献。

承认不承认事物有全局和局部这两个方面，看到看不到任何工作都有个全局和局部的问题，这是认识全局性规律和局部性规律的前提。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从思想方法上说，主要问题之一是部分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全局与局部是有相对性的论述缺乏深刻的理解。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全局和局部是相对的。如果全国战场是全局，某一战区就是局部。如果就这一战区和它所属某一军团或战役战斗来说，这一战区就又成了全局，这一战区中的某一军团或战役战斗又成了局部。因此，全局和局部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些同志并不否认任何工作都有个全局与局部的问题，但他们对全局和局部的理解往往是片面和孤立的。有些在高一级领导机关工作的同志，往往只把自己管辖的

地区看作是全局，而把下属的单位看作是局部，否认这些下属单位自己仍然还有一个全局的问题。因而就发生了不顾下属单位的全盘规划，不尊重他们的自主权的错误。今天一个指示，明天一个命令，搞得下属单位无所适从，忙于应付，不能有计划、有安排、有步骤地工作。有些在下一级工作的同志又往往只把自己的地区和单位看作是全局，否认全省、全国是更大的全局，相对于全省全国来说自己只是局部，因而就发生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倾向。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全局和局部关系的思想，就是要辩证地既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行业看作是国家的局部，做到自觉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和领导，又要把自己这一地区或行业看做是下属地区或单位的全局，做到全盘规划和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

二、把握战略全局是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

战争规律有全局性战争规律和局部性战争规律之分，研究哪一方面的规律是更为重要的呢？毛泽东同志提出研究全局性的战争规律是更为重要的。他指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①“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②

为什么研究战争的全局是更为重要的？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页。

析，主要是由于在战争这个统一体中，全局和局部这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着的两方面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全局是战争中的整体，而局部则是构成整体的部分。任何战争指导者进行战争的目的都是要获得战争整体上的胜利，这就决定了在一切战争中全局都高於局部，统率局部，支配局部；而局部则隶属全局，服从全局。作为战争的各级指挥者来说，只有懂得全局性的东西，了解整个战争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联系和区别，才能进一步懂得各个局部在战争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做到在服从总的战略计划的前提下，自觉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做到有利於全局的事不惜作出牺牲地去努力完成，不利于全局的事就坚决不去做。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忽视战争全局即战略问题的重要性，看不到在全局上还是敌强我弱这个基本事实，否认红军在战略上是处于防御阶段，反而提出一省或数省的这种局部性胜利就是全局性的胜利，反对关照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强行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进行所谓“最后的决战”，因而造成了鄂豫皖边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相反，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同样由于他们没有全局观念，没有战略头脑，又误认为这一局部性的失败，就是全局或战略的失败，转而又采取了消极的逃跑主义，畏敌如虎，处处设防，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击的进攻，不敢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又丧失了整个根据地，迫使红军进行了长征。“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进一步证明了全局高於局部的道理，表明了认识和掌握全局性战争规律的必要性。

由于全局要照顾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由于全局性

的东西眼睛看不见，有其抽象性，这就使得把握全局比了解局部有更多的困难。一些同志往往根据这一情况认为全局性的东西不可认识，难以掌握。所以怎样才能把握全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坚持战争全局规律可以被认识的前提下，对怎样认识和把握全局规律提出了这样两条重要的方法。一条是要把握全局，首先要深刻地了解各个局部。他指出：“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①另一条是要把握全局，必须用心思去想。他认为，全局性的东西只能用心思去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毛泽东同志这里提出的认识把握战争全局规律的两条重要方法，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的通俗表述。人们的认识过程总是先从认识个别或特殊开始，然后上升到一般或普遍。先了解局部而后才能把握全局，正是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人们在认识了个别事物以后，还必须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分析，抽象和概括，才能形成对事物本质的全面认识。毛泽东同志说的用心去想才能把握全局，就是这种研究分析抽象概括的过程。我们在一切实际工作中要做到认识把握全局性的东西，就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一方法去做。一方面要注意深入基层，解剖麻雀，先深刻地了解各个局部；同时要在深入了解局部的基础上，进行反复的研究分析，找出各局部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注意研究全局性指导规律的思想方法，对我们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经济。虽然各个地区各个行业都有一个全局与局部的问题，但全国的计划经济是最大的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重要的全局。相对它来说，各地区、各行业、各单位都只是局部。根据毛泽东同志全局高於局部，统率局部，局部服从全局的思想，各地区、行业 and 单位都必须使自己的经济活动自觉纳入或符合国家的计划。任何摆脱或削弱国家计划的倾向都是缺乏全局观念，没有战略眼光的错误倾向。在这个问题上，我党总结出的国家统一计划为主、自由计划为辅以及要兼顾国家，地方和企业三者的利益等一系列方针，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我们必须继续坚持。

三、在把握战略全局的同时， 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

把握战略全局是十分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说战争局部可以弃而不管。有时战争中的局部出现了问题，往往会招致整个战争全局的失败。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既把握战略全局，又照顾到局部，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呢？毛泽东同志在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把这二者统一起来的关键称之为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什么是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呢？毛泽东同志说：“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①而有时某一二个战役失败或胜利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或者前功尽弃，或者开展了新局面。这些局部就都是有决定作用的东西。所谓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就是要求战争指挥者在把握全局的同时，必须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他指挥的全局来说最有影响、最有作用、最能牵动全局的问题和动作上，这样就能把把握全局和照顾局部有机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关于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的思想，是建立在对全局和局部辩证关系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在把握全局的同时，所以要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在于局部虽然隶属、服从全局，但不是被动地隶属、服从全局，而是能动地影响和反作用于全局。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局部对全局的这种影响或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各个局部性战役或战斗胜利的不断积累，在这种量变的过程中会逐步发展为全局性的战略上的质变。例如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革命战争分为两大战略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全局上是防御的，但在每个局部性战役或战斗上又是进攻的。随着这些战役或战斗胜利的不断增加，到一定时候敌我力量对比就会由敌强我弱变为我强敌弱，全局上就会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进攻阶段。这一思想就是从这方面反映了局部对全局的反作用。二是指构成全局的局部中，由于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那些处于关键地位的局部的发展变化，会造成整个全局的发展变化。即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战争指挥者还必须注意到局部对全局这种反作用。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这样做的。土地革命时期，第一次反“围剿”时，他对“围剿”之敌没有平均用力，四面出击，而是抓住了攻打张辉瓒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从而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二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同志又集中兵力，拿下了攻打王金钰这个局部，带动了全局的胜利。第三次反“围剿”时，他指挥红军向莲塘、良村、董陂中间突破，使敌军的整个“围剿”失败。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同样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组织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造成了国民党反动派

的全军溃败。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对取得战争胜利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怎样确定哪些局部是有决定意义的，哪些局部不是有决定意义的呢？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①例如作战时突击方向或突击点往往是有决定意义的局部，而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就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的兵力情况去规定。又如白区工作中是否走漏消息对整个白区工作影响极大，防止泄密则是白区工作这个全局中有决定意义的局部，而这在红区则不是有决定意义的局部。毛泽东同志关于怎样确定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的科学方法，就是要求人们必须在全面分析了各种情况的基础上来确定什么是有决定意义的局部。

能不能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坚持在把握全局的同时，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对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来说特别重要。有些同志的全盘工作规划尽管有时制定得十分周详或全面，但由于对某些关键环节和最重要的问题重视不够，而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甚至“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往往会造成整个计划的落空。为了确保全盘规划的实现，我们必须学会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抓住主要环节，全力加以解决，这样才能取得工作上的进展。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页。

战争的主观指导 必须符合客观的实在情况*

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的实在情况，这是毛泽东同志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原则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军事问题上的具体运用。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对这一原则所作的详尽论述，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认识论原理，标志着他在后来写的《实践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已经初步形成。我们学习他这方面的有关论述，有助于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

一、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相 符合是多打胜仗的关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进行殊死斗争的时期。在这期间，红军既有取得战争胜利的成功经验，也有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指导造成的失败的教训。怎样才能战争中实行正确的战争

* 本专题阅读书目：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章第四节，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2——167页。

指导，把中国革命战争引向胜利呢？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一时期军事上经验教训的时候，没有拘泥于总结战役或战斗的具体经验，而是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还是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这个哲学上的根本问题出发，深刻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分析战术上的胜败为例子，明确提出，人在战争中为什么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不适合当时当地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假如攻击点选择在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位，突击而成功，这就叫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军事上要求多打胜仗，少打败仗，其关键就在于使主观和客观二者很好地相符合。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把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是否相符合视为战争胜败的关键，不仅从根本上找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失败的认识根源，为我党如何在战争中实行正确的战争指导指明了方向，而且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就是能动的反映论的深刻哲理。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强调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的实在情况，就在于他坚持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来源于物质，意识是客观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正象他分析的那样，任何规律都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战争中也是这样。指挥战争固然离不开头脑的作用，但头脑在认识战争规律方面只能起到一个加工厂的作用。它自己不会自动产生对战争的各种认识。只有当客观的一切情况，特别是敌我双方的情况，通过感觉器官作用于大脑，大脑与这些情况发生了联系的时候，才能产生对战争的认识，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和军事计划。毛泽东同志对于战争主观指导和客观

实在情况相互关系的这一分析，再次告诉我们，人的正确认识既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仅仅从书本上就可以获得的，它只能是对客观外界的正确反映。离开了对客观外界情况的调查了解，就谈不上有正确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不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强调战争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相符合的必要性，而且在许多著作中还阐明了战争中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可能性。毛泽东同志认为，认识战争这个事物比认识其它事物有更多的困难：其一，是因为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瞬息万变；其二，是由于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密，甚至故意制造某些假象来迷惑对方。有些人就因此而否定战争的可知性，似乎人在战争中很难做到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相符合。毛泽东同志在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多次批驳了这种在战争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不可知论。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都指出过，战争虽然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也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虽然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主观和客观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少有的，然而经过努力却可以做到大体上符合。指挥员的决策做到大体上适合客观情况，这就是胜利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从战争的流动性中把握相对的固定性，从不确实性中把握相对的确实性，从偶然性中把握必然性，所有这些论断都生动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可知论的基本思想。几十年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表明，毛泽东同志正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的认识路线，勇于和善于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各种规律，才产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并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主观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论述，说明他早在四十多年前就为我党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科学论断，我们就是要牢固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是要克服那种在事物规律面前束手无策的懒汉懦夫世界观，勇于面向实际，发现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在实现四化的征途中虽然还有许多尚未被我们认识的规律，但就今天的条件来说，认识这些规律要比认识战争规律容易得多。只要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尚未被认识的东西就一定会被我们认识，逐步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符合。

二、侦察——判断——计划，再回到战争中检验修订计划，是达到战争指导和客观情况相符合的两个过程

怎样才能达到战争的主观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呢？毛泽东同志依据列宁关于人们的认识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又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一基本原理，结合总结战争的经验，把达到这种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过程明确地概括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侦察——判断——制定军事计划；第二个过程是在战争中实行军事计划，看第一个过程的认识、计划是否符合实际情况，重新检查修订军事计划。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第一个过程是军事家在做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而第二个过程则是在军事计划建立以后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只有经过这两个过程才能达到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的大体符合。

以上这两个过程又是如何各自进行的，它们在整个认识战争中又分别起什么作用呢？毛泽东同志也作了详尽的阐述。他提出，认识战争中的第一个过程是认识战争的基础，是达到战争指导符合客观情况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就是粗心大意的军事家，就是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的空想计划。人们进行第一个认识过程，又必须经过侦察、判断和制定军事计划这三个阶段。所谓侦察，就是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手段，获得对敌方各个方面情况的可靠的材料。所谓判断，就是将侦察得来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这方面的情况加上去，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得出对敌我双方各种情况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所谓制定军事计划，就是从得出的这些判断出发，进行详尽地分析和研究，预见战略、战役或战斗的发展趋向，采取相应的行动部署。战争认识中第二个过程的作用与第一个过程不同。它是第一个认识过程的继续，主要是在战争实践中检验、补充、完善或修改第一个过程中的认识，即看军事计划是否与客观情况相符合。这一过程的主要任务，就是依据战争中遇到的不同情况对军事计划做不同的处置。完全相符合的可以不调整，部分不符的要调整，完全或基本不符的必须按照新的情况，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制定新的军事计划。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第二个认识过程对于实现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相符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第二个过程既不可能知道第一个过程的认识是否与客观相符，也不能完善补充第一个过程的认识。战争中部分地改变军事计划的事差不多每一次作战都是有的，全都改变军事计划的事也是间或有的。如果忽视第二个过程，在情况变化时不愿改变原有的军事计划，只是一味蛮干，那就不可能达到主客观的符合。

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战争的客观情况要经过两个认识过程的科学论述尽管着眼点是军事问题，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认识论思想。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关论述就是后来《实践论》中提出的认识事物的两个飞跃思想的最初表述。其中侦察——判断——制定军事计划这一认识过程，就是指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军事计划制定后在实行中检验、补充、修改计划的过程，就是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的“飞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一思想，从军事角度再次向人们指明，要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必须经过调查情况、分析研究、制定计划和再回到实践中检查、补充、修改计划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没有前一个阶段，制定计划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后一个阶段，就不能验证前一阶段的认识是否正确，人的认识就会终止。我们只有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①的认识规律，才能真正逐步达到主观认识与客观情况相符合。

三、战争实践是学习和认识战争的主要方法

在怎样实现战争的主观指导与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还十分重视战争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他提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②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使用”、“干”，就是指的战争实践。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毛泽东同志强调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认识战争的主要方法，是以马列主义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为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在战争问题上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告诉人们，客观事物不是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的，由于实践是人们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只有它才能把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联系起来，沟通起来，因而人们的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会产生，才会发展，才能得到检验和证明。战争实践是实践的一种形式，它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

• 从毛泽东同志军事著作中的许多论述看，在战争的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相符合的两个认识过程中，每一阶段、每个环节都不能离开战争实践。就侦察这一环节来说。只有亲自打仗才能获得对战争双方特别是敌方的各种材料，即获得对战争的感性认识。因为侦察本身就是战争实践的一种形式，有战争才谈得上侦察，也只有在打仗中才能使侦察到的材料更真实可信，不参加打仗就无法获得各种必要的情况和材料。就判断和制定军事计划这两个环节来说，只有亲自参加战争实践才会学会分析研究各种侦察到的情况和材料，找出其中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因为战争中各方面的本质和规律寓于大量的战争现象背后，不身临其境，参加战争实践，就难以发现和捕捉住它。最后，就战争认识中的第二个过程来说，只有亲自参加战争实践，才能验证自己原来的认识是否与客观情况相符合，进一步补充修改和完善原来的认识。

由此可见，人们要想达到战争的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相符合，一点儿也离不开实践的作用，战争实践是实现这种符合的基础。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战争经验对取得战争胜利的作用。他认为，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的，他

摸熟了自己部队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部队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它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来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有成功的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相反，如果没有这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规律是困难的。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经验多，正是指的战争的实践经验。

体现着“实践第一”观点的从战争学习战争的这一科学方法，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认识战争，而是我们认识一切事物都必须遵循的方法。学习领会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就是要牢固地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反复实践，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努力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求得对各种事物的更正确更全面的认识。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 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光辉范例 *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曾科学地把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划分为两大战略阶段。第一阶段是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由敌强我弱转变为敌弱我强以后的战略进攻阶段。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把第一战略阶段的战略方针明确地规定为积极防御的方针。历史已经表明：由于贯彻了他提出的这一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曾有效地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地取得了胜利。

从一般意义上说，战争中的一方处于防御地位，采取防御手段，都表明这一方是被动的，消极的，是在战争中处于守势。为什么又把第一阶段的战略方针规定为积极防御或叫攻势防御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灵活地运用到了战争实践，正确地处理了战争中进攻和防御、进和退的相互关系。他提出的积极防御的方针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思想。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积极防御思想，将会使我们更好地学会在实际工作中

* 本专题阅读书目：《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四章，“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第五章，战略防御，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221页。

运用辩证法，把各方面的工作搞得更好。

一、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 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我们在战略上应当是防御的，是处于守势，但在战役、战斗上我们应该是进攻的，应处于攻势。其二是说这种防御不是永久性的防御，而是为了战略进攻进行的防御，当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时，就应将这种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或战略进攻。毛泽东同志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战略阶段上只有坚持这样的方针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然而，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并未被当时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等人所理解和接受。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革命战争要不要在全局和总体上实行防御，实行战略防御到底会不会招致战争的失败。王明等人坚持认为，进行中国革命战争就应该是进攻的，而不应该是防御的。应攻打大城市，应四面出击，短促突击。防御就意味着右倾，意味着失败。因此，中国革命战争要不要在全局上实行战略防御，也就成了毛泽东同志在阐发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时，首先加以论述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针对王明等人只要进攻不要防御的错误指导方针，明确提出：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但并不完全。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才是全部的真理。我们进行的

战争应该是防御和进攻交替使用，这才是完全正确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出中国革命战争是进攻的，同时也有防御和后退，主张交替使用进攻和防御两种作战形式呢？一方面是由于看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阶段上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坚持了矛盾同一性的原理，看到了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争形式的相互依存，它们各自以对方为存在的条件。正象毛泽东同志分析的，进攻和防御是构成作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存在于战争这个统一体中。从一般战争规律上说，防御是为进攻创造条件，进攻则是防御的继续和发展。世界上的战争指挥，除了象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为给他们的非正义战争鼓劲打气，一味鼓吹进攻而反对防御以外，任何军事家都是同时使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作战手段的。既无只攻不防的军事家，也无只防不攻的指挥者。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战争，虽然全局上敌人是进攻的，但其中也有防御。国民党的一次“围剿”被红军打破，就是由进攻转入防御，它通过这种防御为下一次“围剿”进攻做准备。红军在一次“围剿”粉碎以前是防御的，但在这种防御中也有进攻，粉碎“围剿”就是进攻。这种进攻保证了战略上更好的防御。所以进攻和防御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没有进攻就没有防御，没有防御也就谈不上进攻。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进攻和防御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得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阶段必须在战略上是防御的这一科学论断的。他认为，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无论是战略上的防御，还是战役、战斗上的防御和退却，它们都是战略进攻和战役战斗反攻的依存条件。其一，实行这种防御有麻痹政治异己分子的作用，可以动员一部分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壮大革命队伍。其二，实行这种防御可以避敌所锐，保存兵力，待机破敌。其

三，实行这种防御可以使敌人背上许多敌占区的包袱，分散其兵力，并造成他们忘乎所以。这样也就为战略和战役的进攻创造了条件。因此中国革命战争同样离不开防御。没有这种防御也就没有进攻。

中国革命战争失败和胜利的曲折历程，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依据矛盾同一性得出的中国革命战争既有进攻又有防御的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正如他指出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游击战所以失败，一九二八年海陆丰区域红军所以遭到重大损失，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红军反对第四次“围剿”所以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究其原因都在于领导者不顾敌强我弱，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因而把行动引向了错误的方向。他们只想进攻，不想防御，实际上否定了进攻。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由弱到强，转危为安，也正在于他交替使用了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作战形式，巧妙地做到了防御时适时进攻，进攻时不忘防御。他不仅坚持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进攻上有攻有防，而且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也是有攻有守。土地革命时期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抗日战争中的防御阶段和反攻阶段的划分等，就都是这种交替使用攻防两种手段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坚持中国革命战争既要进攻又要防御思想的哲学意义在于看问题办事情必须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必须要看到事物内部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而不能孤立地只看到一个方面。特别是在实现四化的征途上，我们随时都还会遇到进和退，建设和休整，生产和消费等各方面的矛盾。这就需要我们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全面地看到这些矛盾的两个方面而不能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从一九七七年开始进行的经济调整，就是对

前些年只顾进不顾综合平衡的纠正，就是为了更快地前进而采取的的必要措施。没有这种调整和必要的退，就没有更有效的速度和进步。我们相信，这次调整一定会为加快四化进程创造出更有利的条件。

二、坚持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 战斗上的进攻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同志在提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过程中，不仅依据矛盾同一性的原理，阐发了进攻和防御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批评了那种只攻不防的军事盲动主义，而且还依据矛盾同一性的原理，论述了进攻和防御互相渗透的辩证关系，提出了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的战略战术思想，批评了那种攻即攻、防即防的形而上学错误。毛泽东同志认为，攻和防不是互相割裂互不关联的两个方面，而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我们主张在战略上防御，决不是说在这种防御中可以不要进攻，必须等到战略进攻到来时才施用进攻。“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①只有注意到二者间的这种互相渗透，做到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才能真正取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这里提出的攻中有防、防中有攻的光辉思想，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之所以是积极的关键所在，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中的精髓和核心。

怎样才能达到进攻和防御的互相结合，做到攻中有防、防中有攻呢？毛泽东同志通过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把这种攻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6——207页。

有防、防中有攻的作战方法具体化为三种形式：

（1）把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结合起来。这里所说的战略上的防御，就是指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绝不应在整体和全局上主动地向敌人进攻，这样做只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使我军陷入被动。这里所说的战役和战斗上的进攻则是指在局部性的战役或战斗上，我们不应单纯的防御，而应该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这是因为，虽然在整体和全局上我们处于劣势，但在局部的战役、战斗中我们却可以通过集中兵力和利用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集中力量攻击敌人之薄弱的一部，在作战中处于优势。这样的作战方法就达到了进攻和防御的互相渗透，做到了在防御中有进攻，在进攻中达到更好的防御。正如毛主席所说：只有“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①

（2）把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结合起来。进攻和防御在时间状态上又分别表现为速决战和持久战。敌强我弱，决定了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在战略上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然而在战役或战斗上又必须打速决战。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战对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解决红军弹药没有来源的困难。二是可以尽快解决战斗、适应连续作战的情况，便于抽出时间转移或休整。三是可以防止敌军支援部队对所歼之敌的支援。这样就能使红军在局部上造成对敌人的优势，从时间上保证了能向敌人实行进攻，达到了攻中有防，防中有攻。

（3）把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结合起来。进攻和防御在战场上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包围和反包围的状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8页。

态。包围者一般就是在外线作战的进攻者，被包围者就是在内线作战的防御者。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要在战争中达到攻中有防、防中有攻，在战场上就要把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结合起来。由于敌我双方整个来说是敌众我寡，我军不可能在整体上完成对敌军的包围。敌军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将是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存在的状态。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战术上的分进合击。……这就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我军在局部战场上如能做到了外线作战，也就是在防御中又做到了进攻。

坚持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把矛盾双方互相渗透的原理巧妙地运用到了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他积极防御的伟大战略思想。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正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一发展阶段上都坚持了这一思想，才能使我军在战略上防御的同时，不断取得了各个局部性战役或战斗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最终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引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与此相反，王明、张国焘等机会主义者不懂得进攻和防御的这种互相渗透，坚持进攻时不要防御的单纯进攻和防御时不敢进攻的消极防御，使得红军遭到了重大损失，被迫进行了长征。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说明了坚持唯物辩证法十分重要。

毛泽东同志攻中有防、防中有攻的光辉思想虽然说的是军事问题，但由于它包含着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其意义远不限于军事。它对其他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政治上我们坚持这一思想，就是要把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有机统一

起来。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待困难也要一分为二，既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也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否则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一九七九年以来的国民经济调整，虽然在全局上是调整，但这种调整，不是消极的调整，而是积极的调整，在调整中做到有下有上，有慢有快，保持一定的速度。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经济调整的目的。

三、由防御转化为进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

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哲学特色，是他十分注意把握防御和进攻相互转化的条件。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在战略上或战术上实行防御决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是为了进攻实行的防御，为了反攻进行的退却。战略或战役胜利的最后取得只有在防御转化为进攻之后才能实现。而要实现这种转化就必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就不能实现这种转化。中国革命战争由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转化为第二阶段的战略进攻需要哪些条件呢？毛泽东同志从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提出，要实现中国革命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化，必须具备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即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军的力量，敌我双方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说：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

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①战略防御阶段的某次战役、战斗由退却转化为反攻又需要哪些条件呢？毛泽东同志以反“围剿”斗争为例，把这种转化的条件概括为六个方面：（1）有了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有了有利作战的阵地；（3）红军的主力已经全部集中；（4）发现了敌人的薄弱部分；（5）已使敌人疲劳沮丧；（6）使敌人发生过失。他认为在退却时必须取得了以上条件中的两个以上，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在这些条件不具备时由防御转入进攻必然是盲动主义。而在这些条件具备后不及时将防御转化为进攻则必然是保守主义。总之，条件在这里是十分重要的。离开了条件就做不到防中有攻，也做不到由防变攻。

毛泽东同志关于防御转化为进攻需要造成许多条件的科学论述，具体而生动地表现了条件在实现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中的作用。它从军事角度再次告诉我们，矛盾双方的转化必须依一定的条件才能转化。认识事物转化的条件性，是促成事物内部矛盾双方转化的重要一环。我们学习这一论断，就是要学会在一切工作中认真研究坏事能在什么条件下就能转化为好事，困难在什么条件下就能转化为顺利，被动在什么条件下就能转化为主动，努力在创造转化条件上下功夫。

事物矛盾双方的转化无不需要一定的条件，那么怎样才能获得这些条件呢？毛泽东同志在阐发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时也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防御转化为进攻的条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客观已经存在的有利条件，如气候，有利的作战阵地等。对这样的条件要充分加以利用。二是客观上暂时还没有造成的有利条件。这样的条件的获得则要靠人们的努力，在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4页

客观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去积极创造。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反“剿围”准备（包括政治动员、征集新兵和财粮等）、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等行动部署，就是这种创造条件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些创造条件的行动，才获得了由防御转化为反攻的上述六个条件。

毛泽东同志对防御转化为进攻条件的这两种情况的分析，虽然着眼于战争中的攻与防，实际上却具有一般的哲学意义，它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矛盾转化的基本原理。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要造成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同志往往不能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有的是不懂得利用现有条件，靠山不吃山，靠水不用水，不能因地制宜地发挥本地自然条件的优势。有的则不懂得有些条件虽然暂时不具备，但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创造出来。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工作终究不会打开局面，总是处于困难和被动状态。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述，正是医治这一病症的良方。

根据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及时实行战略转移*

战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战争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战略也应该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变化。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灵活地观察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精辟地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思想。这在当时，对于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揭露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采取的怀疑和反对态度，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当前我们学习这一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经济建设，深刻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略方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灵活机动地实行 战略转变是战争情况发展的要求

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讲到第二次国内革命

*本专题阅读书目：

《战争和战略问题》四，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4—516页。

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我党军事战略转变的问题时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体上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后期，主要是正规战争（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仍是游击性的）。抗日战争中，从军事任务来说，也大体上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是游击战争；后期，在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是正规战争。这样，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战争的过程中，有四个战略时期、三次战略的转变。

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时期和阶段的划分，以及适时地实行战略转变，都是毛泽东同志坚持辩证唯物论观点，运用分析矛盾的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这一大事物进行深刻分析的结果。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研究战争，必须研究战争这一运动形式的矛盾特殊性及其本质，进而采取解决这一矛盾的正确战略方针，才能指导战争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是怎样对这两个战争过程的战略问题进行分析的呢？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党的任务是在极端严重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红军作战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这一时期革命战争这一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矛盾所规定的本质特点是：战争发生在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而且是经历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大国。这个特点说明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这个特点不但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策略，而且也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强

大，不仅拥有一支数量庞大、装备优良的反革命军队，而且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但是，它代表反动势力，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红军虽然弱小，数量少，装备差，给养缺乏，根据地小而且不巩固，但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农民的援助。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些特殊矛盾所规定的本质特征，把这一时期作为战争运动形式的一个大过程来考察，他分析了这个大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方面，把战争大体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在前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面对强大的敌人，要保存自己的力量，建立和发展革命的武装和红色根据地，就必须采取以游击战争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

到后期，一九三一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力量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正规红军已增到十多万人，赤卫队发展到十多万人，枪增到十五万多枝，红色区域已拥有几百个县、几千万人口，并在各个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红色政权。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战略方针就应该实行及时的转变，把游击兵团发展为正规兵团，把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尽管这种正规战争只是中国型的，不能和外国军队甚至国民党军队一概而论，但它已远远不是原来的游击战了。这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之间，由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的第一个战略转变。

到抗日战争时期，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同志又把抗日战争作为一个新的矛盾运动过程来考察。这时，敌人是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友军则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党的任务是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过程中的新的矛盾运动的本质特点是：第一，日

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它有较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政治组织力。而中国则没有现代化的国防装备，又由于蒋介石压制群众抗日等等，表现了我们力量的暂时弱小。第二，日本侵华战争是反动的、野蛮的。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特别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久经考验的红军，有巩固的解放区。第三，日本是小国，人力、军力、财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由于第二条的原因，日本没有广泛的国际援助，而中国却能够得到广大的国际援助。从第一个因素来看，是敌强我弱，于我不利。但其余的因素都对我们有利，特别是抗日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是我们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根据。但是，在战争前期，敌人的优势不可能一下子压下去，而我们的优势不能一下子发挥到克敌制胜的地步，在敌人处于进攻地位的时候，我们只能处于防守的地位。根据这样一些特点，在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样，就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这是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二个战略转变。

到抗日战争的后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敌我力量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日本由进攻变为退却，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毛泽东同志预见到，那时候我们又必须在战略上及时地实行第三个转变，把抗日游击战争转为抗日正规战争。毛泽东同志的预见完全为实践所证实。到一九四五年春，人民抗日武装主力已发展到九十多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多万人，解放区面积达到九十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九千多万，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寇占领区的战略包围。在国际力量的支持下，抗日军民及时举

行战略反攻，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制定和转变的过程，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他在《矛盾论》中阐明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二、辩证地认识战略转变 中的某些反复现象

国内游击战争转变为国内正规战争；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又转变为抗日正规战争。乍看起来，好象只是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在来回反复，只是形式上的不断重复，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战略上的这种反复现象呢？

第一，战略转变是作战形式在战争发展中地位的转变，它反映了敌我力量，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战争是敌我双方各种力量的综合比赛。双方都要选择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作战形式，作为自己的战略方针。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敌人控制着战争局势，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我们不能硬拼，不能速决，而只能以灵活分散的小部队，在敌后用袭击、伏击、破坏、扰敌等手段，对敌进行战斗。这种方法在战争的前期占据着战争的主导地位，而阵地战和运动战只是起辅助作用。游击战和正规战相比，当然只是较低级的形式。说它是低级的，是指不能靠这种形式最后解决战争，解决战争最后要靠大规模的正规战。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向正规战发展创造条件。随着我们力量的壮大，敌人力量的衰弱，我们

采用游击战的形式就自然逐步减少，而采用正规战的形式就逐步增多了。当这种形式增多到一定程度，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时，它就上升到主导地位。这就说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形势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时就必须不失时机地实行战略上的转变了。

第二，战略上的转变并不是对原来战略的一概排斥，而是对原来战略的变革和继承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新生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旧事物的基础上脱胎出来的。它保留旧事物的积极因素作为自己成长的基础，没有旧事物就不会有新事物。战略上的转变也是这样。游击战代替正规战占据主导地位时，并不是否定正规战的一切东西，它否定的只是不适用游击战争的组织和指挥方法。比如，由于游击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具有分散行动的特点，就不容许采取正规战那样的高度集中的指挥方法。如果把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硬搬到了游击战争中来，必然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灵活性，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但是，正规战争的许多积极的东西还会保留下来。比如，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不仅是正规战也是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又如，游击战正因为其“分散”，在一个游击区里面存在有许多游击队，其中既有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又有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人民武装。这就需要实行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相结合的方法，否则就会犯绝对分散主义的错误。在这里，正规战集中指挥的许多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反过来说，正规战代替游击战占据主导地位时也一样，它并不是否定游击战的一切东西，它否定的只是那些不适用于正规战的组织和指挥方法，否定的只是少数人中存在的游击主义和地方主义等不良倾向。但游击战的许多积极的东西还会

继承下来。例如正规军及武器装备就是来源于原来的游击队，游击队在政治、组织、纪律等方面的许多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也被正规军继承下来，并又不断得到发展。

第三，战略转变中所出现的某种形式上的回复，是战争螺旋式上升的表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的战略，由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这种转变，在现象上好像表现为一种倒退的转变，仿佛又回复到国内战争时期的游击战争。这种现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抗日游击战争在形式上确有许多地方很象是国内战争时的游击战争。例如，对许多游击战术的重新采用。但是，这只是形式上的回复。实际上，它在质的方面和过去有了显著的差别。从敌人来看，它已不是原来的国民党，而是更加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从战场来看，它已不是原来的根据地，而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敌后；特别是从游击军来看，它已不是放下镰刀斧头的工农游击队，而是正规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去执行游击任务。这种游击战比国内游击战争的规模要大得多，人民群众的发动比过去要广得多，战斗的经验比过去丰富得多。这种游击战争，既吸取了过去游击战争时期的宝贵经验，又吸取了过去正规战争时期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再加上新的发明创造，就变成了一种新型的、更高级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

正规战变成了游击战，正规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去执行游击任务，这看起来是个倒退。但这个暂时的倒退是必须的。现在的倒退是为了将来的不后退，为了将来的大反攻。因为，只有这个暂时的倒退，才有可能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军队，开辟和扩大根据地；才有可能牵制敌人，骚扰敌人，消耗敌人，瓦解敌人，配合正面力量消灭敌人。一句话，只有这个暂时的倒

退，才能变敌人的优势为劣势，变我们的劣势为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倒退，实际上是一种曲折前进的方式。

在抗日战争长期的奋斗中，游击军和游击战经过数量上的增加，质量上的提高，必然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这就又会出现一个战略转变。但这种抗日的正规战也不是过去正规战的重复，而是另一种在新的质、新的量上的正规战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①

三、在战略转变中，既要反对右的倾向，又要反对“左”的倾向

在三个战略转变中，两个战略转变是当时经历过的，第三个战略转变是预见到将来会发生的。在已经经历过的两个战略转变中，都曾发生过一些右的和“左”的倾向，给适时地实行战略转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虽然经过艰苦的工作最后得到了纠正。但是，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可见在战略转移中，反对右和“左”的倾向是非常重要的。

战略上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当客观情况已经从一个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主观指导上也必须随着推移转变。如果跟不上客观情况的发展，就要犯右的错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当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转变时，有些干部由于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曾经产生过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意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

倾向。他们不习惯于打运动战，有的则不愿意和别的游击队集中，不愿意离开本乡本土去外线作战。经过了艰苦的教育工作，这种倾向才得到了纠正。

在实行战略转变中，还会发生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同志的思想超过了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幻想当作真理，本来是将来才可能实现的理想，放到现时来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中期，红军虽在不断壮大，但犯“左”倾错误的同志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急地拉出队伍和敌人硬拼。李立三路线时，曾规定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以后的王明“左”倾路线主张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把当时红军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游击主义”来反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全线突击”等口号，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付出了重大牺牲，最后不得不退出革命根据地，实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接受了血的教训，历时三年之久，才得到了纠正。

军事战略转变中，发生过的两种倾向，很值得作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建国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实行战略性转移的时候，也往往遇到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实际工作中也往往会发生认识跟不上实际，或是认识超越实际的情况。

我国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我们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由于我们指导上的失误，没有及时地领导全国人民实现这

个转变。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肯定这个主要矛盾变化之后不久，又重新提出了阶级斗争是我国当时的主要矛盾。结果，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我们的战略重点，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致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及时地提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实践告诉我们，经常地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在情况发展，需要进行战略转移时，及时地提出战略转移的任务，并能及时地批判和纠正在战略转移问题上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发展或倒退，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

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 把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来考察*

把游击战争放到战争的战略地位上来加以考察，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中，根据中日双方作战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分析方法，得出的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游击战争，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只是战术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它在两军对垒摆开战场的情况下，对战争胜负不起决定作用，更不能决定战争的最后胜利。就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也是正规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却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对抗日战争胜利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是怎样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分析这个问题的呢？

* 本专题阅读书目：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3—406页。

《战争和战略问题》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6—518页。

《论持久战》战争的目的。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9—451页。

一、全面地分析抗日战争的各种矛盾， 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战争是一个各种矛盾互相交错的运动过程，情形非常复杂。这些矛盾不但有主有次，而且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各有其特点。只有通过全面分析战争中的各种矛盾，并从中找出它的主要矛盾，详尽地考察矛盾双方的特点，才能提出解决主要矛盾的具体办法。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问题的提出，就是这种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方法的具体运用。

早在一九三一年，日本进攻东北时，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通过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错综复杂情况的分析，就及时地看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地位。我们的任务不再是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是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种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①为此，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了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党内党外都还有人怀疑、轻视，甚至否认游击战争。在国民党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散布说“游击战争已失掉了在历史上的作用”，“现在几乎无采用游击战争的机会。”他们妄图迫使我军同日本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98页。

侵略军正面作战，借助于敌人之手来消灭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以实现其在十年反革命内战中没有达到的目的。在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提出要把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于国民党，并提出要“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们过低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因而拚命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就是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也对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思想上不理解，甚至认为是一种“倒退”。

为了回答战争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联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经验，着重分析了中日矛盾双方的特点，把抗日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进行考察。他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象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①

“小而强”和“大而弱”是抗战初期中日双方各自的基本特点，也就是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当时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在东方都是第一等的，在世界上也是列强之一，这是它的长处和优势。但是它国小人少，先天不足，又是致命的弱点。而中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方面都不及日本，但是我国地大人多，得天独厚，战争的潜力很大。

“小而强”和“大而弱”的矛盾，必然带来战争的广大性、长期性和残酷性。因为敌强我弱，日本在战争一开始就可以占领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4页。

我们的大片国土，并且在较长时期内霸占着，而我则不能迅速驱逐日寇出中国。又因为敌小我大，日本不可能一举灭亡中国，也不可能把大片领土永远霸占下去，而我则可以利用它兵力不足造成的广大空隙生存、发展，坚持长期战争。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①

战争的广大性、长期性、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广大性规定了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近距离的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长期性规定了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它必须有一般游击战争所没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一整套东西；残酷性规定了抗日游击战争不仅要配合正规战作战，而且要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还要把自己也转化为正规战，等等。所有这些“异乎寻常的事情”远远超出了战术问题的范围，而是属于战略范围的问题了。所以，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就是说，从战争的全局看，游击战争在决战问题上虽然不起决定作用，但在抗日战争中敌“小而强”我“大而弱”的特殊条件下，它是转变战争全局的重要环节，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辩证地分析游击战争的特殊性， 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

在抗日战争中，必须重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但决不是可以说把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一套战略方针，照搬到抗日游击战争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6页。

来。因为抗日游击战争与一般正规战争相比，固然有许多普遍性的、共性的东西，但决定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因素主要是它的特殊性的、个性的东西。因此，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辩证地分析了游击战争的特殊性，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的一整套具体方针和原则，生动地说明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一，游击战可以化被动为主动，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

战场上的主动和被动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主动权，就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就会被迫处于“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被动局面，就有被消灭和打败的危险。只有从被动的局面中、被动的逆境中争取主动，才有自由权，才能转败为胜。

在抗日战争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在总体上、战略上，敌人是处于进攻的、速决的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而我则处于防御的、持久的外线作战的被动地位，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但是，在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战斗上我们则可以采取进攻的、包围的、速决的方法争取主动地位。因此，我们党规定了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不论正规战还是游击战都必须执行下列战略方针：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一条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方针。游击战较正规战更能从自己的特长出发，更能灵活机动地贯彻这一战略方针。

“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

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①毛泽东同志具体地分析指出了游击战区别于正规战的如下几个特点：

(1)一般是用奇袭的形式，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高；(2)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其进攻性更大一些；(3)对速决的要求很高，切忌拖延怠慢；(4)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中规模一般比较小。正因为游击战具有这些特点和长处，它在执行上述战略方针时就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化整为零”，分散发动群众，“化零为整”，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灵活机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争取主动地位；就可以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抓住敌人的弱点，把敌人的弱点作为战胜敌人的资本，建立自己的主动权；甚至有时可以把自己的弱点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比如，正因为自己弱小，才便于在敌人的后方神出鬼没，捉摸不定，随机应变地活动，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战不可能得到的。游击战能够这样灵活机动地执行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正是它具有全局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游击战可以化小胜为大胜，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

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要配合正规战的战略原则，其意义就在于要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转变敌强我弱形势，有效地战胜敌人。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将我们大片的国土变成了它的后方，如果我们没有广大而持久的游击战相配合，敌人就可以安然坐占，毫无后顾之忧，我正面部队作战必然会造成很大伤亡，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只有实行游击战和正规战相配合的战略原则，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2页。

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了游击战对正规战的三种配合：一是战略配合。主要是在敌人的后方起来削弱敌人，破坏敌人，钳制敌人，给全国正规军和人民群众以精神上的鼓舞。这种配合作用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它在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战略防御的作用；它在战略相持阶段，配合正规军起妨碍敌人保守占领地的作用；它在战略反攻阶段，配合正规军，起打击敌人收复失地的作用。二是战役配合。主要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合理配置自己的力量，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军民的目的。三是战斗配合。主要是消灭小股敌人、充当向导、侦察敌情等。这三种配合作用，集中起来就是要从战争的各方面，各阶段配合正规战，打击、歼灭和控制整个抗日战场上的敌人。只有把游击战和正规战在各方面、各阶段打击、歼灭、控制敌人的胜利集中起来，化小胜为大胜，才能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最后战胜敌人。毛泽东同志指出：“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①

第三，游击战可以由点到面地发展，扩大根据地，壮大我军力量。

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密切联系的。游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因此，必须建立和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9页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内部矛盾都有其新旧两方面的矛盾，矛盾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消灭的东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过程，就是这种矛盾的辩证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在整个敌占区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的地方：一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府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二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敌占区；三是处于双方争夺的游击区。但是，这三种情况的地方不是绝对不变的。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特别是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这三种情况的地方就将会沿着下列途径发展：敌人从“面”被分割为“线”，又被孤立为“点”，最后被我取而代之；而我则由许多“点”联成“线”，发展为“面”，日益壮大起来。这就是由敌占区到游击区，再由游击区到根据地的辩证发展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缩小敌军占领地，扩大我军根据地，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①

同时，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在包围和反包围问题上也起着重大的战略作用。抗日战争由于日本是一个小国入侵一个大国，而我们这个大国又实行了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样就出现了游击战在广大敌后“遍地开花”、“麻雀满天飞”的局面，形成了敌我之间多层的包围和反包围的形势，这可称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从整个抗日战争来看，敌人是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于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我是处在了敌人的战略包围之中，这是敌对我的第一种包围；但是由于我们数量上的优

^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2页

势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进攻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路分进之敌的每一路都处于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是我对于敌人的第一种反包围。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来看，我们每一个孤立的根据地都是处在敌人四面或三面包围中，这是敌人对我们的第二种包围；但是我们把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包围起来，这又是我们对敌人的第二种反包围。毛泽东同志当时还预见到，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层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这里，我对敌人的三种反包围都是和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紧密联系着的。没有根据地，我对敌人的三种反包围都无从谈起。因此，必须把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

第四，游击战可以由分散到集中，积蓄力量，造成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是正规战，而不是游击战。因此，游击战不能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必须逐步地把自己转变为正规战。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关于游击战由分散到集中，向正规战发展的战略原则，体现了事物由量变到质变、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辩证法。

游击战向正规战发展，是由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带来的，不这样便不能适应长期而残酷的战争，更不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从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作战形式来看：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游击战上升为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辅助；第三阶段，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游击战。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将决定战争的最

后命运，但是这种运动战的相当重要的一部份是由第二阶段的游击战提高起来的。事实上，在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队受到了必要的锻炼，就会逐渐变成正规部队，作战形式也逐渐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了运动战。而且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是由正规军派出强大的支队去发展的，随着战争的持久，这种成分将不断增加。

当然，游击战要向运动战发展，并不是要废除游击战，而是要在游击战的广泛发展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能够执行运动战的主力，环绕这个主力的仍然应有广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这种广大的游击部队，造成这个主力的丰富的羽翼，又是这个主力继续扩大的不断的源泉。

这样看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就不仅是要辅助正规战，而要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说：

“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①

第五，党的领导和红军的存在，是游击战争具有战略地位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同志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②很显然，如果没有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就不能保证坚持游击战向正规战发展，就不能保证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也就不能保证把局部性的东西变为全局性的东西，把游击战争从一般的战术问题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上来。古代的游击战争大都是失败的游击战争，就是因为它们没有这样一条最根本的决定性因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4页。

素。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国，才有胜利的游击战争。

三、具体地分析战争双方矛盾转化的条件， 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实现的可能性

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原则能不能够实现呢？毛泽东同志在分析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其战略原则的过程中，详尽地考察了各种矛盾相互转化的条件，论证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实现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在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每一项战略任务，制定每一项战略原则的时候，都既指出了它们的必要性，又指出了实现这些任务、原则的可能性和基本条件。比如：游击战要化被动为主动，灵活机动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作战方针，主要的条件就是要灵活地使用兵力，抓住敌人的三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欺他异民族、欺他指挥笨拙，来建立自己的主动权；游击战要由“点”到“面”地发展，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游击战要从分散到集中，向正规战发展，必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等等。通过这些全面的、详尽的分析证明，这个战略方针完全会有实现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①但是，条件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它是要由人来利用的，要由人来创造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7页。

的。有了一定的条件事物才能转化。所以，创造条件的过程，都是矛盾转化的过程，一旦条件具备了，矛盾的转化也就实现了。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游击区向根据地转化时指出，这“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①它要人们付出艰辛的劳动和艰苦的努力。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领导全国军民，在极端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顽固派两面夹攻之下，经过整整八年艰苦努力，流血牺牲的奋斗，终于使我们的各种条件逐步具备起来，使抗日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变成了光辉的现实。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1页。

持久战及其结局的英明 预见来自对客观矛盾的科学分析*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以后，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同年八月，党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就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是，当时大多数人对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它的前途结局怎样并没有解决。主要有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亡国论观点，认为敌强我弱，“再战必亡”。另一种是速胜论观点，怀疑持久战的方针，存在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认为很快可以取得胜利。这些错误观点，严重地影响着抗日军民对抗战形势和战争前途的正确了解。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阐明我党的抗日战争方针，以便统一认识，团结全党，动员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夺取胜利，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分析了各方面的矛盾，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和趋势，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役、战术原则，这是把辩证

* 本专题阅读书目：《论持久战》问题的提起，问题的根据。驳亡国论。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为什么是持久战？为永久和平而战。结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7——430页，第442——444页，第480——482页。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指导战争的光辉范例。

一、从矛盾的总体上，客观地分析战争 双方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点，正确 把握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

在各种复杂的事物中，往往同时存在好几种矛盾，而要认识这些复杂事物的性质，就必须搞清楚构成事物的各种矛盾在事物矛盾的总体中各占何等地位？这些矛盾彼此又是如何联结的？在联结中又是如何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日双方的内在矛盾，把握中日战争特殊本质的时候，正是运用了这样的方法。

战争既有一般的本质，同时也有特殊的本质。战争的特殊本质不同于战争的一般本质。战争的一般本质是战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实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已经讲得很清楚：战争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①而战争的特殊本质，就是为战争双方的特殊矛盾所规定的战争的特殊性质，它包括战争的特殊的政治性质和特殊的军事性质。为了搞清楚中日战争的这些特殊性质，毛泽东同志首先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的各种特殊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在整个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帝国主义的日本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日战争矛盾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存在着四个互相矛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盾着的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

从敌强我弱来看，日本是一个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较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和日本相比，则是一个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较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是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一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抗战不能速胜。

从敌小我大来看，日本是一个小国。它的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到缺乏。战争是在它先天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的，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日本为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发动战争，但战争将走向它期求的反面，连它原有的东西也将消耗掉。中国则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多兵也多，广土众兵能支持长期战争，所以敌小我大是中日战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敌退步我进步来看，社会发展的行程说明了日本已不是什么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即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这就是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它在国民中特别是军队中所提倡的武士道精神，产生了它战争的特殊野蛮性，这就必然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①中国的进步首先表现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符合人心，顺乎世界历史潮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身又具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已不是鸦片战争、太平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6页。

天国、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它已经有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有了觉醒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本身，业已摆脱了早期的幼稚，有了领导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有了克服和纠正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经验，在政治上已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党。这个党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制定出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所有这一切进步性，都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根据。

从敌寡助我多助来看，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它无疑将得到中国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国际上，无疑得到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政府的支持。而日本正好相反，它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必然遭到国内外的广泛反对。此外，日本侵略中国，必然损害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英美等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华的利益，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而日本侵略中国虽然得到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但权衡得失，日本会遇到一个超过对它支持的国际力量的反对。这种反对的力量随着战争过程的推移将逐步增强。所以说，多助寡助也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充分认识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是研究战争问题的第一步，但却是关系到把握战争全局的最重要的一步。毛泽东同志说：“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

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①

当然，毛泽东同志并不单是认识和掌握战争双方的矛盾和特点就止步了。他在对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分析这些矛盾和特点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从矛盾的总体上和特点的总和中把握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

中日双方的各种矛盾和特点是相互联系的，即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比如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三个矛盾和特点，它们彼此就是直接关联的，并且以敌强我弱为主要方面，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为补充的和制约的因素，构成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由于敌强我弱是双方力量对比的基本方面，所以中日战争从军事性质上讲是一场弱者对强者、劣势对优势的战争。但我之弱为我之大、我之多助等优点所补充，敌之强为敌之小、敌之寡助等缺点所减杀，加上战争中我将努力扩大敌之缺点、发扬我之优点，所以使得双方力量的强弱对比只能具有相对的性质。再从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个矛盾和特点来看，敌退步产生敌寡助，我进步产生我多助，敌寡助我多助是敌退步我进步的派生物。敌退步我进步虽然和双方力量对比不发生直接关系，但却通过多助寡助发生间接关系。更为重要的敌退步我进步这个矛盾是引起中日战争爆发的政治原因，它规定了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要求独立、坚持进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坚持侵略、坚持反动的帝国主义日本之间的战争，实质上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战争。

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和战争的特殊本质，是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总根据，战争中的一切规律性的东西都是由此而来，指导战争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都是由此而决定。因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

此，对战争指导者来说，把握了战争双方的基本特点和战争的特殊本质，就获得了指导夺取战争胜利的主动权。

二、从矛盾的各个方面，全面地比较 中日双方的特点和条件，英明地 预见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

研究和把握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是确定指导抗日战争正确方针的根据。那么，这个战争的过程将会是怎么样的呢？战争是迅速解决的还是持久的？战争的结局又将如何呢？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必须在分析双方内在矛盾的基础上，把矛盾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全面比较。毛泽东同志正是抓住了矛盾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及其发展变化，对中日双方的特点和条件进行全面分析比较，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

1. 从相互联系中进行比较，预见了战争的持久性。

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特点，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任何一个特点都不能离开其它特点独立发生作用。如果片面地、孤立地根据某一个特点对战争的过程和结局作出结论，那就必然发生错误。比如，只从敌强我弱一个方面看问题，把它夸大为全部问题的根据，忽视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势必得出亡国论的结论。相反，若单从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等个别方面看问题，就又会得出速胜论的结论。然而事实并非如“亡国论”和“速胜论”者所讲的那样。强弱虽是力量对比中的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它要受到大小、退步进步、多助寡助等因素的制约，

更要受到我方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活动的影响。同样，在一定时期内，由于敌我强弱悬殊较大，我虽有其它三个方面的优点，但这些优点在短时期内还不能抵销或超过强弱这一因素，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综合了中日双方全部的战争因素，从这些战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分析了战争发展趋向，预见了战争过程的特点。他指出，由于敌我双方各种战争因素的相互制约，由于我们的主观努力，敌我之间的强和弱，优势和劣势的对比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双方各限于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在短时间内，不能超过这种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而达到全胜或全败。日本难以灭亡中国，中国也不能速胜日本，战争将呈现持久性的局面。

2. 从发展变化中进行比较，预见了战争的胜利结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运动和变化中，每一种事物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它的最初状态。战争是属于一种变化剧烈的快速运动，它尤其具有这个特点。因此，我们在比较战争双方力量时，不仅要对它们现存的条件和特点做静态的比较，而且要对这些条件 and 特点的发展变化情况作动态的考察。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①他还指出：由于我们的努力和运用正确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策略，“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②战争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这些论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9页。

点是正确的。

中日战争的开始阶段，日本以几十个师团的强大兵力进攻中国，其势凶凶，不可一世，强弱对比的特点十分突出。但在战争继续向前推进时，敌人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优点也受到了限制，而我们的优点则得到发扬，弱点则有所克服。这首先表现在敌人遭到中国各地军民的坚决抵抗，兵员伤亡增多，进攻能力开始减弱。特别是由于我地方大，敌兵力少，敌只能占领点和线，而我却能控制广大的面，这又为我们在敌后开展普遍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而这种游击战争反过来又大大牵制了敌人的兵力，使敌人的战略进攻在进行一段之后不得不停下来，力量对比开始由强弱向平衡方面转化。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进一步暴露，退步性更加严重地表现出来，战争力量将开始迅速下降，这包括兵源日益枯竭，物资逐渐耗尽，财政越来越困难，国际援助不断减少，士气开始普遍低落。而我方的情况则完全相反，由于抗日政治动员的加强和抗日的政治、经济政策的落实，参军参战的人日益增多；由于后方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国际援助的不断增加，战争物资必然越来越多地得到补充；随着整个形势的好转，士气将普遍提高。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敌我双方的强和弱，优势和劣势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战争向前推移的过程中必然不断发生变化和发展。中国方面将一步步上升，直到取得优势地位；日本方面将一步步下降，直到变成劣势地位，最后把日本赶出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当然，这个变化不会在一个早上就出现，这种胜利也不会在一个早上就到来，它需要一个持久的发展过程才能实现。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全面比较中日双方特点和条件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三、从时代特征上考察和分析中日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指出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日双方矛盾时，反复强调指出：“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①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这样注重时代特征，特意把中日的矛盾提到一定历史范围去考察呢？这是因为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一切都依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战争尤其是如此。任何具体的战争都不能离开具体的时代而存在，离开了具体的时代，就无法分析战争的特殊本质，指出战争的前途。

那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具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它对中日双方又有哪些影响和作用呢？

我们知道，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进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开始走向崩溃，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日本帝国主义在它的历史行程上，正处于退步时期，正走下坡路。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阶级斗争视线，摆脱国内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大资产阶级走上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道路，和德意法西斯相配合疯狂地发动对外战争，尤其是它发动的反革命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灾难。这种侵华战争违背世界历史潮流，违背人民的意愿，因此必然遭到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以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反对，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页。

必然失道寡助。而中国则相反，它有着比自己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进步的因素，它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必然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就是说必然得道多助。所以中日战争发生在这样的时代，总的趋势对中国有利，对日本不利。日本虽强，但从时代条件考察，就会看到它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中国虽弱，但从时代特征去看，它代表新生的进步力量，有无限的发展前途。毛泽东同志从时代特征上去分析中日矛盾，本身就是一种高瞻远瞩，与当年亡国论者的悲鸣相反，他进一步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抗战必然胜利的前途。

四、主观性和片面性是亡国论 和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

由于毛泽东同志能够从实际出发，科学地分析中日双方的客观矛盾，所以他能够正确地把握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英明地预见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抗日战争胜利结局，并为我党实现持久战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一切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则完全相反，由于他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完全是主观的、片面的，所以关于战争的理论也是非常荒唐的，有害的。亡国论者只看重敌强我弱一个矛盾，而完全忽略了其它矛盾、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①速胜论也是一样，“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6页。

盾，而单单记起了其它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①毛泽东同志对速胜论的这些批评也是十分恰如其分的，速胜论的那些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其实不过是幻想和假道理，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四十多年前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早已被历史无情地否定了，人们也可能早已把它们遗忘了。但主观性和片面性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错误，却不那么容易从人们的头脑中清除出去，有时它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问题上，有两种错误倾向，就是这种表现之一。这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对四化建设悲观失望的情绪；一种是对四化建设企图速胜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有悲观情绪和速胜思想的同志，他们绝大多数还是好同志，他们希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他们和四十多年前的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在政治上不能相比，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错误则几乎是相同的，即都是主观性、片面性。有悲观失望情绪的同志看不到我们的有利条件，比如看不到我国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不到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坚持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方针，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四化的积极性和这种积极性将发挥出的巨大能动作用。而只看到人口多、底子薄、国家穷、技术差等不利因素，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前途缺乏胜利信心，产生悲观情绪。持速胜思想的同志则相反，他们看不到我国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6页。

人口多、底子薄、国家穷、技术差等不利因素，看不到实现四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是脱离中国客观现实的物质基础，过高地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或企图过多地依赖外国的力量，因此产生不切实际的速胜思想。悲观情绪和速胜思想都是没有根据的，它们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我们必须加以防止和排除。我们应当全面地分析比较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认真总结二十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树立长期建设的战略思想，实事求是，讲求实效，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努力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正确分析中日双方力量的消长， 把握持久战的发展趋势*

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又是属于中国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论证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运用事物矛盾特殊性的原理，从抗日战争中矛盾双方的特点和变化情况入手，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以及在战争发展各个阶段的变化过程，揭示了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规律，从而把握了持久战的发展趋势，得出了胜利属于中国的科学结论。

一、通过分析中日双方力量的消长，正确 推断出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

事物发展过程，就是事物矛盾运动的过程。要了解事物的发展过程，就要研究事物矛盾运动的状况。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状况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是由决定这一事物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根本矛盾的性质未发生质变以前，这个过程就不会完结。但是在一个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由于根本矛盾的逐渐变化发展，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大小矛盾也发生种种变化，有些激化，有些暂时或局部地解决，有些缓和，也有些在发生，因此过

* 本专题阅读书目：《论持久战》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犬牙交错的战争。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0—442页。

程就呈现出阶段性来。从抗日战争的长过程来看，日本不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不收复失地，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根本矛盾的性质不解决，抗日战争就不会结束。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抗日力量的各种因素，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力量等在不断增长，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而侵略力量陷入抗日民族力量的包围之中，日本各方面的不利因素也在逐步增加，沦陷区在逐步缩小。在战争过程中，由于这些力量的消长变化，就会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来。中日战争的总的趋势，将是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则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则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毛泽东同志运用矛盾特殊性和事物发展阶段性原理，揭示了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全过程，指出抗日战争具体要经过战略的三个发展阶段。

1. 敌人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在战争开始时，由于敌强我弱，敌人必然处于进攻地位，我方只能处于防御地位。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论持久战》发表的一九三八年五月，敌人由芦沟桥事变开始，攻占了北平、天津，控制了整个华北的主要地区，占领了上海、南京、徐州，并准备向武汉、广州进攻。但随着战争的持续，敌小我大这个特点将越来越突出。由于敌人兵力缺乏，物资供应困难，占领的地域越扩大，对敌越不利。加之我方坚决抵抗，敌人会遭到伤亡，这又减少了敌人的进攻能力。综合这些因素可以看到，敌人的进攻不能无止境地继续进行下去，必然在一定时候要停止下来。从我方的情况来看，虽然遭受很大损失，但在许多有利因素方面得到了发展。如制定了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乘敌之虚，在敌后展开了普遍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牵制住大量敌

人，使敌人越来越难以抽出兵力实行战略进攻。在这一阶段，敌人虽然处于战略进攻，但敌人的不利因素在逐渐增加，我方虽处于战略防御，但有利因素得到发展。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开始向有利于中国方面发展。

2. 敌我战略相持阶段。在战争第一阶段末尾，由于敌方兵力不足和我方坚决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在一定限度上停止战略的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区的阶段。战争发展的结果，到一九三八年十月，迫使敌人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而把它的主要力量转向巩固已被占领的地区，进入了战争的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内，我方的力量迅速壮大，党员发展到八十万人，军队发展到五十万人，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这个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中国最困难和最痛苦的时期，然而它却是战争发生根本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①相反，日本的力量则由强变弱。

3. 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我方的力量经过第二阶段的准备和积蓄，以及第三阶段的继续增长，将得到更大的加强。再加上国际上日益增多的援助和日本国内反战力量的支持，我方力量的总和将超过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力量。因而使我们有可能举行总反攻，收复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胜利结束抗日战争。客观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从一九四四年起，我军已经开始了局部的战略反攻，接着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和配合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3页。

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以上三个阶段，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如果在第一阶段不能制止敌人的进攻，就不会有双方相持的阶段；同样，如果没有相持阶段的充分准备和积蓄力量，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战略反攻。它们的关系是：前一段是后一段的准备，后一段是前一段的发展趋势。三个阶段又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而每一个阶段都标志着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质的变化，最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也就结束了。

二、三个阶段中，敌我双方在 量和质上的变化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不仅正确地推断出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而且运用事物发展过程的质量互变规律、阐明了每个发展阶段敌我双方在量和质上的变化特点。

在第一阶段中，敌我双方都有向下和向上的两种不同的变化。从中国方面来说，向下的变化表现在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变得更为严重。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到第一阶段末尾，可能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的变化，即向上的变化，就是表现在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① 敌人方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5页。

面，也有向上向下两种变化。向下的表现在人员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财政的大量支出，国际舆论的指责等等。随着向下因素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必然引起质的变化。然而敌人也有向上的变化，主要是指它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这种向上的变化，既不会持续太久，也不会引起质变，是局部的和暂时的现象。

第二阶段是双方的上述变化将继续发展，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日本继续向下表现在军力、财力大量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在国际上更加孤立。而中国继续向上则表现在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内地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也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也将有所增加。第二阶段将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在此阶段，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还只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因为中国虽脱出劣势，日本虽脱出优势，但敌我双方还只能走到平衡地位。

第三阶段双方的变化将出现大的转折。我方经过第二阶段长期的艰苦斗争和准备，加上外部有利因素日益增多，向上发展的速度将会加快，并开始向胜利的方面转化。敌人则相反，国内外困难因素将日益增多，向下发展的速度也加快，并且开始向失败的方面转化。到这一阶段的末尾，双方力量的对比就要发生根本的质变，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总之，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就是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的量变和质变的交错变化过程，就是敌我力量消长和攻防形势转化的过程。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精辟地分析了这些过程，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抗日战争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上特点的认识。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对敌

我双方存在的两种向下和向上发展情况的分析，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过程的复杂性。尤其是他还指出，我方在向下和向上发展过程中，既有旧的质和量的变化，又有新的质和量的产生，而且向上发展主要表现在新的质上。这些分析对于我们研究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力量可能出现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抗战及抗战胜利后中国前途可能产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新的质，实际上是指党领导的一切抗日武装和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一切进步力量等等。这些新生力量虽然在当时数量还不多，力量还不强大，然而它代表着中国的希望，是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据。所谓旧的质，主要是指代表中国旧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掌握的军队。它们在战争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抗战胜利后又竭力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当然，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在战争中也遭到一定损失。但这种损失主要是在数量上的。随着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的新质必然日益发展，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旧质必然逐渐衰减，直到前者完全代替后者为止，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

三、认识事物矛盾双方的特殊性， 把握事物发展趋势的重要意义

严格地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和把握革命运动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对革命作出科学的预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发表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提出了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他深刻而透彻地分析

了中日双方矛盾的特殊性，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把握了中日双方向下和向上两种量和质上的发展趋势，对抗日战争结局作了科学预见。他在实践中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统一战线，反对分裂；坚持持久战，反对“速胜论”和“亡国论”。从而发展了有利因素，克服了不利因素，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学习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问题，认识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曾经有过不顾我国特殊国情，照搬外国经验，急于求成，盲目冒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结果欲速则不达的教训。这个教训，使我们懂得在四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遵照唯物辩证法，弄清我国的特殊性，分析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认识四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性。既不要照搬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更不能照抄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特点出发，发挥优势，克服劣势，扬长避短，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新路子。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既能高瞻远瞩，把握四化建设的发展趋势，又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实现奋斗的目标。

总之，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就是要端正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各项经济工作中的思想路线，克服盲目性，清除那种凭主观、靠热情、瞎指挥的“左”的思想影响，提高自觉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做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者和建设者。

重视发挥自觉能动性在 战争中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不仅非常重视研究和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及其客观条件，而且还十分重视发挥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中都对这个问题的精辟的阐述。毛泽东同志认为，自觉的能动性对于取得战争的胜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和按客观规律办事决不是对立的、排斥的，而是一致的、统一的。要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就必须认真研究和重视能动性问题。学习领会毛泽东同志在战争中如何运用自觉能动性的问题，对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有很重要的意义。

* 本专题阅读书目：

《论持久战》能动性在战争中。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4—446页，第451—476页。

一、战争中客观的有利因素所具备的胜利的可能性，是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

在中外战争史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战争中的各种条件对某一方极为有利，然而由于这一方在作战中指挥不当或犹豫不决、或缩手缩脚，它反而在战争中失败了。中国革命战争进行过程中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本来有几次战役和战斗的条件对红军是极为有利的，但由于领导者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进攻，反而丧失了整个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日双方各自都有其有利条件，特别是我方的有利条件更多一些，但是还是产生了亡国论的观点。

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些战争经验的同时，从哲学上做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以上这些情况的产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人不懂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①并指出，战争中当有利的客观因素具备了的时候，主观努力和主观作用就成为决定的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对战争中那种条件有利但又遭到了失败的主要原因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所做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为什么要强调主观能动性是战争中的一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446页。

决定因素呢？这主要是由于他在哲学上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反对了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本质区别就表现在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上。机械唯物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认为，人和动物一样，只能消极的被动的反映客观世界，却不能在意识的指导下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人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界，却不能能动地变革自然界。辩证唯物主义则与此相反。它认为，虽然意识决定于物质，但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反过来对物质的发展进程起巨大的作用。^①这是人不同于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人能够而且总是在意识的指导下从事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毛泽东同志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看到了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正如他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指出的，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由此不难看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仅依赖于战争中的有利条件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足够地注意到能动性在战争中作用。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自觉的能动性对战争的胜利起着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是能够根据客观情况，为指导战争制定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使战争进行得更加自觉。其二，是能够把这些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付诸实施，能把那些有利条件充分地加以利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以重视能动性问题的原因所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不仅依赖于战争中各种有利条件，更依赖于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同志曾亲自为中国革命战争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战略和战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革命人民也曾发扬了英勇奋战、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历史表明，没有这种主观能动性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胜利不仅依赖于客观条件，而且依赖于主观能动性的科学论断，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对各项工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全国安定团结，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这就为在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具备了这些条件，只是说有了实现我们战略目标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我们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充分发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为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积极工作，忘我劳动。没有这种积极性，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不可可能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同志还不能正确理解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性。甚至有人以批判“精神万能”为名，把毛泽东同志关于当有利的客观因素具备了的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因素这一论断当作唯心主义命题加以否定。结果把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和按客观规律办事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不到能

动性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有些同志看到我们国际国内有利条件的一面，就盲目乐观，似乎躺在有利条件上，四化建设就可以坐等得来；还有的同志看到我们困难和不利条件的一面，就丧失信心，革命精神不振，工作互相推诿，贻误我们的事业。这些同志不懂得，不利条件要靠我们发挥能动性去克服，有利条件也要靠我们发挥能动性去加以利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不可能等得来，而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干出来。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论述，就是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劳动，投入到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中去，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二、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 注意符合客观规律性

和任何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都会受到歪曲一样，辩证唯物主义主观能动性的原理也曾受到曲解和歪曲，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大量言论和行动来看，他们似乎十分重视“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曾强令红军四面出击，到处攻打大城市，反对在战略上进行防御，说什么红军在战争中可以做到以一当十。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抹煞敌强我弱这一基本事实，认为中国人民只要拼死抵抗就可以迅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果，他们提倡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同样给中国革命战争造成了重大损失。这又是为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哲学上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问

题。毛泽东同志认为，“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的那种“能动性”之所以没有带来战争的胜利，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能动性”不是自觉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不是建立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自觉能动性，而是建立在脱离客观规律基础上的“左”倾盲动主义。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能动性应当是什么样的能动性呢？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主观能动性只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能动性。他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企图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在客观物质条件之上，发挥我们的威力，就能打倒那些民族和阶级的敌人。并指出：“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毛泽东同志这些科学论述不仅从世界观上找到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盲动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主观能动性的含义以及和客观规律的关系讲得更加具体明确了。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主张主观能动性必须建立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呢？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能动性原理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是以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为前提的。如前所述，意识虽然可以反作用于物质，但意识要达到改造客观事物的目的，它必须正确地反映物质。没有反映了客观事物规律的意识决不会对改造客观物质起任何有益的作用。战争同样是这样，战争中的计划、战略战术等如果和客观情况不符合，只能招致在战争中的失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①如果不认识能动性的这一特点，就是离开了唯物主义，而滑向了唯心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强调主观能动性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性，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它告诉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随心所欲地去胡思乱想和乱撞乱碰，而必须在认识了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也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以及不顾我国国情，搞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等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我们必须坚决纠正这些错误作法。

三、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表现为战争指导上的主动性、计划性和灵活性

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这是战争中的一条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是怎样的呢？怎样才算是做到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呢？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许多军事著作中，对这种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明确地概括为主动性、计划性和灵活性。他认为，在战争中做到了主动性、计划性和灵活性就是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何谓主动性呢？毛泽东同志指出，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主动性在战争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的作用，就是通过人的努力，充分利用战争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条件，造成对敌方更多的不利条件，使自己立于优势地位。在这里，客观存在着的各种条件，通过这种主动性而发挥了它的作用，使这种客观条件中包含着的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力争主动的过程，就是在客观情况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人的主观努力的过程。

所谓计划性，就是根据战争中的各种客观情况制定相应的方针和行动部署。为什么说计划性就是主观能动性呢？因为制定计划的过程就是根据客观情况形成思想和认识过程，而实施计划的过程又是根据这些思想和认识去做或行动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体现着意识的能动作用。所以有无计划性是战争中是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标志。正如古人所说，“凡事预则立，不予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谈不上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就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灵活性，是指在战争中要随时根据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相应地改变修改计划和行动部署。由于客观条件是经常变化的，同时军事计划又不可能完全正确地反映客观，这就决定了在战争中必须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改和补充自己的计划和认识。只有不僵化地固执己见，而是灵活地适应各种情况，才能使自己的计划始终建立在符合或大体符合客观情况的基础上，这样也才能更好地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所以是灵活还是僵化同样关系到能否在战争中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毛泽东同志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做到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的重要思想，对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有重要启示。不少同志也想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但他们并不懂得怎样才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有的人认为单纯的干劲大就是发挥主

观能动性，有的则认为主观武断的蛮干就是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对照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所有这些对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理解都是不全面或不正确的。要真正做到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象毛泽东同志要求的那样，在深刻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性，并且做到主动性、计划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这才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真谛。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中，特别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人民战争，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他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①的著名论断，并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在战争中的具体运用。

一、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

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建设人民军队和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他的建军思想

* 本专题阅读书目：

《论持久战》抗日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8——449页、第476—480页。

《论联合政府》人民战争。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9——942页。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章第二节，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159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的核心。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军事思想的始终，渗透到他研究的每个战略、战役、战术问题之中。

人民战争，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而组织起来进行的战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坚决依靠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地位，认为依靠民众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离开民众则一事无成。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了全民武装的思想。他指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在农村中造就一个大的革命热潮，组织和发动成千成万的群众进行斗争。他在土地革命中，把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比作真正的铜墙铁壁。他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因为他深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②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面临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强调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③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才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来，从人民群众中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人民真心诚意拥护革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8页。

命战争，积极支持并参加战争，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为我们党取得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坚实的基础。

开展人民战争，必须有一支人民的军队。毛泽东同志把建立人民军队作为武装革命的首要问题提出来，强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①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作出的科学结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我们党才有了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这一建军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把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军队建设的唯一的宗旨；把提高政治思想教育放到重要地位，使指战员懂得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有极其严格的组织纪律，特别要搞好革命队伍内部和外部的团结。而且，这个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除执行打仗任务外，还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等等。正是在这一建军思想指引下，我军才一直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才具有持久不衰的战斗意志。才能不断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壮大。

开展人民战争，必须有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以弱我战胜强敌，提出了诸如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方针，实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方针，以及诱敌深入的方针等等，都是适应人民战争的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套战略、战术，完全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的，它最能发挥人民群众的长处，暴露敌人的短处，使人民群众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就拿诱敌深入的方针来说，为了歼灭敌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3页。

人，就必须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引诱敌人进入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这正是人民群众大显身手的好地方。因为诱敌深入，必使敌人长途跋涉，增加消耗，疲劳沮丧；敌人为了占领我们放弃的地方，必然会分兵把守，分散兵力，敌人远离巢穴，进入一个生疏之地，又必然是耳聋眼瞎。而广大人民群众正好利用敌人这些不利因素，发挥自己人多、地熟、情况明等长处，撒下天罗地网，巧妙地迷惑敌人，调动敌人。他们可以声东击西，造成敌人错觉；可以广泛袭击，弄得敌人草木皆兵，寸步难行；可以给敌人以突然袭击，使敌人丧失优势和主动，这样就能使敌人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我们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一口一口把敌人吃掉。

二、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进行人民战争是顺乎历史潮流，促进社会变革的必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的发展变化，主要是由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引起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在阶级社会里，劳动群众总是处于生产的第一线，他们和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构成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劳动群众为了他们本阶级的利益，总是要千方百计发展生产力，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必然要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

层建筑。当这种矛盾发展到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时候，就爆发了战争。

但是世界上的战争形形色色，有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民族对民族的战争，国家对国家的战争，政治集团对政治集团的战争。不管是何种战争，都是一定的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最高形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因此战争都必然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具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存在着霸权主义，存在着剥削阶级，就必然会有反动统治阶级掠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非正义战争，也就必然会有反动派内部相互厮杀的和反动派对别国侵略的非正义战争；同时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被侵略国家的反镇压、反掠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也就成为不可避免。革命人民的任务就在于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所指出的那样：“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①

进行人民战争，是建立在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时，总是特别强调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他认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只要使人民群众认识了战争的性质，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们就可以在战争中发挥出巨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克服一切困难，赢得战争的胜利。例如在武器问题上，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武器只有和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但是，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参加战争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对战争的态度。人民群众在正义的战争中，没有武器会创造武器，会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有了武器更是如虎添翼，会使武器的威力得到充分发挥。相反，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穷苦百姓，由于他们厌恶战争，反对战争，他们不愿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开枪，武器威力在他们手中就无法发挥。可是一旦回到解放军的队伍，提高了阶级觉悟，枪口对准自己的敌人，枪炮就会发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又如，在战略、战术上，正确的战略、战术是指导战争胜利的关键之一。但是，战略战术本身并不能去夺取胜利，它必须要人去制定，要人去执行。指导战争的人无疑要制定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战略、战术。对于反动军队来说，他们只有被迫机械地执行上面的指令，根本谈不上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战略、战术和军队是两张皮。而革命军队则不然，人民群众最理解自己的战略、战术，他们会自觉地把上级的指示和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战略、战术变得生动而具体，发挥有效地歼灭敌人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许多地方开展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击战、蘑菇战、以及利用青纱帐、铁路线、河流、湖泊等条件来打击敌人，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都是人民群众聪明才智的发挥。

再如，在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来源上，对于反动统治阶级来说，无非是抓兵、抢粮、摊税。革命战争则不然，只要人民群众懂得革命战争同他们的利害关系，就会自动地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①

三、政治动员是人民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高度评价了政治动员的意义。他说：“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②“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③

毛泽东同志所以强调政治动员的重要意义，是因为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着的伟大力量，并不会自发地发挥出来，而必须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去做启发、开导、说服的工作，去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发动、领导、组织工作。

我们知道，非正义战争，反革命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要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但是，许多人对它并没有认识。这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狭隘的经济利益使许多人认不清个人利益和阶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

级利益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用各种精神鸦片对群众长期进行毒害，使许多人政治上分不清是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动员，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①所以共产党必须进行艰苦的政治动员，使狭隘变成无私，使麻木变成苏醒。所有这些，离开政治动员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共产党必须进行艰苦的政治动员，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群众，教育群众，把党的政策贯注到群众之中，给人民指出解放的道路，启发群众觉悟，才能使群众从狭隘利益和麻木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自觉地参加革命战争。

政治上的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②在抗日战争中，就要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告诉人民。在解放战争中，就要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要让军队和人民真正懂得：要不消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就永远也不会有出头之日。只有这样，才能启发人民的觉悟，激发人民的斗志。在进行一般动员的基础上，还要把实现政治动员的步骤和政策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动员军队和人民扎扎实实地实行。不仅要采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形式，还必须联系战争实际，联系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8页。

士兵和群众的思想、生活实际，使群众易于接受、易于理解。

政治动员，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工作。当群众还未觉悟到的时候就仓促行动，容易形成命令主义；而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积极要求上前线时，如果我们还不去具体组织，还在等待，那又会形成尾巴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是脱离群众大多数的，都会影响发动群众的效果。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其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以及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等，对于我们今天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这些基本思想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革命实

践中的应用和发挥

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 阶段论相统一原理的光辉典范*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个关键时刻，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派别，有不同的议论和主张。国民党顽固派叫嚷“基马尔主义”、“一次革命论”、“一个主义”等谬论，妄图建立一个一党独裁的资产阶级专政。而在革命队伍内部，也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二次革命论”，主张由资

* 本专题阅读书目：《新民主主义论》一、中国向何处去。二、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三、中国的历史特点。四、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七、驳资产阶级专政。八、驳“左”倾空谈主义。九、驳顽固派。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633页、第640—649页。

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再来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二是“一次革命论”，主张“直接从国民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面对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彻底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指出中国革命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是社会主义，而在第一步没有完成以前，第二步是谈不到的。

一、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发展 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 革命的必然途径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①为什么中国革命两个阶段必须衔接，而不容许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呢？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要不停顿地由前一阶段发展到后一阶段的理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问题。

第一，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民主革命必然要向社会主义发展。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相互联系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紧密相联的。毛泽东同志依据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的理论，分析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646页。

世界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并把中国革命放在整个世界革命时代特点中考察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同时，中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使中国革命起了根本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民主革命是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民主革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要受世界革命的影响，它的发展前途要受世界革命发展总趋势的制约，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要向社会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两个革命之间必然要衔接起来。

第二，中国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它的前途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民主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来说，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不断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等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出现和成长，所

以，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因素，随着革命过程而不断发展，再加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环境的有利条件，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

第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必须衔接起来，中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中国民主革命必然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无产阶级要不断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所规定的。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鼓吹“基马尔主义”，妄图效法土耳其，搞一个所谓基马尔式的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谬论，指出土耳其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力量太薄弱，所以出现过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不会有土耳其那种便宜的事情。何况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国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是国内外环境所不容许的。在国际上，首先是帝国主义不容许；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在国内，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这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由此可见，在世界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新时代，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之后，再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的梦呓。

毛泽东同志依据世界革命的时代特点和中国革命的状况，把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实事求是地分

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必然向社会主义发展，阐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从而深刻地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 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不同阶段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不仅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要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指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它们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不能混淆起来。他说：“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无产阶级要胜利地实现自己的全部革命任务，必须把各个革命阶段的不同性质严格地加以区别。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特点出发，精辟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②为什么中国革命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呢？这是由中国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会性质规定着革命的性质。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民族民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主革命。它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了推翻强大的敌人，有时还要有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锋芒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建立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有，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①它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份。只有完成了这个第一阶段的革命任务，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把革命向前发展到第二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同志在区别了中国革命发展必然要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阶段的基础上，又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每一个革命过程，又有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况。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落后的经济。这种经济特点，是地方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时期内，还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影响，使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发生极大变动，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地位不固定的社会中间阶级和中间阶层，使革命可以争取自己的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对付敌人。这样，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中间阶级的争夺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10页。

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显著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①如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但是它的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这样，毛泽东同志不仅严格地区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而且在一个大阶段过程中又区分了小阶段。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只能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而且第一个阶段的时间是相当长的，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这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特点。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但是，国民党顽固派恶意的宣传家，却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鼓吹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妄图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叫嚣，揭露了他们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的目的是为投降日寇作思想和舆论准备。毛泽东同志说：“‘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②

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批评了革命内部的主观主义者，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势必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当前革命任务的努力，把将来的革命任务合并到现阶段来完成，那是空想，是很有害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

动过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二者既不能割裂开来，又不能混淆起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的正确性。

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对于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社会主义发展各个阶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有着严重的教训。五十年代末期刮共产风，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和界限，否定按劳分配规律。盲目崇拜生产资料公有制越大越公，硬把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安在社会主义生产力上面，结果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相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是，我们又没有及时地推进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阶段上去，却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以至酿成十年内乱，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可见，否认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否认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就会受到革命发展辩证法的惩罚。

三、正确处理共产主义思想与新 民主主义行动纲领的辩证关系

为了正确贯彻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正确地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处理好共产主义思想指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动纲领具体实践的关系。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革命过程的两个阶段，都是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此，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在将来把中国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① 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共产主义思想指导和新民主主义行动纲领实践的关系时，还尖锐地批驳了国民党顽固派鼓吹的“一个主义”的谬论，指出共产主义不能“收起”。国民党顽固派叫嚷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到后一阶段去了，三民主义是今日中国之必需，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议论，在所谓“一个主义”的标题下的狂妄叫嚣，不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就是毫无常识。顽固派否认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不懂得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更不会懂得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与民主革命行动纲领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对共产主义作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三民主义新旧之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指出三民主义随着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

的发展，很快就过时了。相反，共产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整个过程的，共产主义不能“收起”，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中国的救星。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党中央号召我们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决不能忽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虽然我们现在还处在低级的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指导，以共产主义精神进行工作，要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离开了这个就不可能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可是，有的同志不是这样看法。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提社会主义思想，不应当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不应当提倡共产主义道德；认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就是超越历史阶段，就会重复假大空的错误。甚至有的人把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宣传，说成是“苦行僧”、“清教徒式的说教”。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过去，虽然在思想教育宣传工作中曾经出现过假大空的做法。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宣传和教育的必要性。没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胜利，也不能向共产主义发展。我们不仅要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有反对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任务，而且更重要的还要看到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任务。同时，又要看到不能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教育去代替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方针政策。既要坚持不断革命论，又要坚持革命发展阶段论，把二者统一起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注意提倡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促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

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实际出发， 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贡献的一个方面。

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而在一九四〇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对这个革命理论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深刻地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并以此为依据，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制定了革命的纲领，从而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本专题阅读书目：《新民主主义论》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六、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十、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十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十二、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十三、四个时期。十四、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十五、民族的科学的的大众的文化。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640页、第649——669页。

下面，我们着重谈谈毛泽东同志是如何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

一、从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中国社会性质，阐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革命的主要形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正确地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对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确定当前社会的性质。并以此为根据，确定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提出指导革命的纲领和策略。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然而究竟用哪一种宇宙观来分析中国国情，这是个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唯心论、主观主义的狂妄态度，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是我们去研究。”^①他又说：“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②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它同各种唯心论、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势不两立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的。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经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国情，从历史到现状，而以现状为重点，将中国如何从一个封建社会逐渐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整个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把现象和本质搞得一清二楚，没有任何主观的随意性。这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社会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就是打倒这两个敌人，即对外进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行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进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民主革命；革除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相互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当时民族革命任务，主要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敌人内外勾结，而且异常强大，对中国人民的镇压又是异常残酷的，所以，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斗争的形式。毛泽东同志层层深入、如此透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革命的主要形式，正是以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

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即 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 各阶级的历史地位，阐明了中国 革命的领导者、主力军，以及统一 战线的策略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根本方法。只有了解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状况，了解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变化和动向，以及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在革命斗争中分清敌我友，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

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就得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详尽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力量最集中，经济地位低下，身受三重压迫，最有战斗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是中国近代最进步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就本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追随者很快地变成为领导者。“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成长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已经必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

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中国富农具有半封建性的剥削的一面，又有自己参加劳动又是农民的一面；是反帝斗争的一份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要把富农和地主区别对待，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中农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而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国贫农没有土地，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最大的动力和主力军。贫农和中农，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

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是革命的对象。二是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又有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一身兼二任，具有两面性。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不能由它领导去解决，因此，不能成为领导力量，只能作为同盟者。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善于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保持中立。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经济地位、对革命的态度、历史变化和相互关系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进行了具体而又深刻的分析，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动力和主力军，革命的同盟者，不仅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而且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

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制定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

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既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又坚持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坚持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是客观地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武器。人们依靠这种科学的认识，可以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个原理，依据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特点，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他说，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具体地表现在中国内部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上，必然有一个与它相适应的革命纲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关系的反映。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因此，新民主主义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它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又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形式的社会形态。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要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即“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关系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第625页。

的反映。毛泽东同志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管理，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但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实行节制资本的方针。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方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又具有资本主义因素，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性质的经济形态。

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之后，又运用一定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基本观点，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则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其形式是民族的，其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的。它是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既不是旧民主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过渡性质在文化上的反映。这种文化是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的。它要求尊重历史，不要割断历史，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剔去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引导人民和青年向前看。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考察和研究了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工农联盟是革命的动

力，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必须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民主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等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主要思想内容。《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著作，而且是一部生动的哲学教科书。

任何一个思想或原理的提出，都不是任意的，偶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国际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经过民主革命各阶段的实践，才逐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从而形成并逐步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今天，我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当然不是为了背诵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条文，而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所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实事求是地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中国革命各种基本问题的前提。搞民主革命是这样，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应当是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可能性。关于阶级分析方法，在我国现阶段，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些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例如，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的主要表现。有些人妄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内的重要表现。所有这些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思想武器。我们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的观点，又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处理好经济工作与思想工作的关系，关心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与加强思想教育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文化工作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文化工作仍然是我们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掌握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才能更好地贯彻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我们既要克服否定古代文化、排斥外国文化的“左”的思想影响，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反对盲目崇拜洋人、古人，把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拿来贻害人民和青年，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发挥社会主义文化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战斗作用。

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 革命实践,制定建设新中国的 宏伟蓝图*

《论联合政府》一文,是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当时,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中国正处在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关系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回顾了抗日战争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和国共两党之间统一和分裂的历史,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回答了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政治纲领。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过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纲领,并使之具体化为具体纲领。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今天,我们重新学习这篇著作,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分析形势,深刻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本专题阅读书目:《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1047页。

一、正确分析形势，认识中国 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时国际国内形势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但是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怎样才能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呢？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急待回答的重要问题，也是摆在全党面前亟须正确解决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动员和统一全国的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回答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的回答。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科学的回答是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得出来的。他指出，在国际上，一方面是法西斯势力面临着全面的崩溃。在西方战场上，苏联红军从一九四四年向德国法西斯发动总反攻以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不仅把德国侵略军全部赶出苏联国土，而且于同年四月包围了柏林。英、美联军也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了拖延两年之久的第二战场，配合打击希特勒。在东方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四四年发动的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在我军民的打击下，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以中国大陆作为它垂死挣扎的基地的企图完全破产。但是也必须看到国际形势的另一方面，

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失败虽已成定局，然而它们还没有被彻底打败。许多国家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历史可能会出现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国内形势如何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在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形势的一方面，形势的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而且有了强大的巩固的解放区，有了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抗日民主运动。毛泽东同志既指出了国际国内形势中对于人民反法西斯力量有利的一面，又指出了不利的一面，全面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

那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将如何呢？只是指出形势中的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还是不够的，还没有说明历史最终会如何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①“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②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一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呢？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分析形势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因而是生产者即人民群众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在分析形势时必须站在这样一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对于世界民主势力，有着不利和有利两个因素。但是，不利的方面是代表着没落的腐朽的势力，它们是走向衰落，走向死亡的势力，虽然它们暂时还显示出某种强大，但是，终归是要被消灭的。而有利的方面则是新生的力量，代表着民主与进步，是向上的成长的力量。两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

种因素相斗争，彼消此长。因此，世界历史的总趋势就是法西斯势力一定要失败，人民民主势力一定会胜利。从总体上从根本上看，当时形势的发展是有利于革命人民而不利于各国反动势力的。

根据对于形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是一定的；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是可能的；根本的途经就是走民主和团结的路，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就能消灭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也代表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正是在科学分析形势，指出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基础上，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路线。这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引着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回顾历史，分析矛盾，论证实现 中国之光明前途的客观依据。

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但并不等于说，这种总趋势会自动地一帆风顺地径直实现。我们“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①“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②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国历史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两种前途。一种可能和前途是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他们要继续维持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要将中国拖回到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第二种可能和前途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要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这是中国之光明前途。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①就是说，中国之光明前途是一定会实现的。那么，毛泽东同志得出这个结论的客观依据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通过分析矛盾，回顾抗日战争和国共两党统一和分裂的历史，科学地论证了实现中国之光明前途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在当时，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是中日民族矛盾。不过，这一主要矛盾已经发展到最后阶段，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矛盾将最后解决。中日矛盾将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中国人民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之间的阶级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在抗战问题上，表现为两条根本不同的抗战路线，“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②也是中国能否实现光明之前途的关键所在，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一条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3页。

战争的路线。如果实行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路线，就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实际上是帮助日本侵略者，最后只能是招致战争的挫折和失败，把中国引向黑暗。只有实行积极的人民抗战的路线，才能实现中国之光明的前途。

为什么这样说呢？

毛泽东同志首先回顾了抗战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走着曲折的道路。而这种曲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贯奉行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抗战路线，实行消极的抗日政策和积极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国内政策，结果导致日寇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丧。接着，毛泽东同志比较地分析了两个战场，即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不同情况，指出：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实行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路线，使得国统区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而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路线之下，解放区战场抗击着在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五和全部伪军，解放区不断扩大，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全国有十九个大的解放区，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建立了强大的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解放区一天天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主要力量。毛泽东同志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对于现状分析，告诉我们，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确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两条抗战路线谁胜谁负，关系着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一定会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它的客观依据就在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路线必然会失败，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战路线必然会胜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动员全民抗战。他们的这样一条消极抗战的路

线是必然要失败的。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战路线，是真正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路线，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着一切反对日寇侵略、主张民族独立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在这样一条抗战路线下，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必定会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因此，积极抗战的路线一定会胜利。中国人民一定会经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中国的光明的前途。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走团结和民主的道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我们要为实现这一基本要求而奋斗，就必须正确地制定我们的奋斗纲领，采取正确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步骤。而这些纲领、路线和政策必须既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具体阐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后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一般原理，在不同的国家中，由于情况不同，又会表现出各自的特点来。那么，在中国，这一原理将会如何表现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①又指出：在中国“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页。

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①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一般原理在我国情况下的具体运用。

毛泽东同志批驳了违背这一必然性的各种错误的意见。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制度。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这种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是已经没落的东西，在世界革命形势高涨、国内民主运动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这种制度必然要被消灭，这已经为蒋介石集团的十八年反动统治所证明。第二，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十分软弱，国际资本主义已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任何的独立性。同时也因为中国已经产生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国人民也不允许建立一个旧式的民主主义的政权。第三，中国在当时还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而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同时，社会主义建立的经济条件也不成熟，因此，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只能“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②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制度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样的制度下，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民主革命。它既能使中国摆脱封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5页。

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又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准备条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因此，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唯一可行的国家制度。

根据对中国社会发展必然性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再一次阐明了我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具体说来就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即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它由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组成；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所主张的一般纲领。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来说，这是最低纲领。但这是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向前推进一步，即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是不变的，但是在民主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纲领，使这个一般纲领在各个时期具体化才能最后地实现这个一般纲领。毛泽东同志详细地阐述了当时我们党的具体纲领。

制定党的纲领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①我们党主张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前，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它是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页。

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首先，这个政府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这个政权必须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必须取得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必须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其次，这个政府必须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其一党专政、丧失人心、威信扫地的时候，也承认要“结束训政”

“还政于民”。但他们所谓还政于民，并不是还政于各民主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而是要还政于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这实际上是依旧“还政”于国民党反动集团。我们主张还政于联合政府，而联合政府应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代表各民主阶级和阶层的共同利益，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彻底的革命性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工人阶级在联合政府中的政治领导，并不等于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等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第三，联合政府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它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因此它是各革命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的制定，关于联合政府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形式的规定，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规律和国家学说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光辉结晶。正是这一正确的纲领，指引着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并建立了巩固的民主统一战线，为完成民主革命打下了基础。

四、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是实现 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

要完成革命的任务，革命的政党不仅需要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有正确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主观世界的改造中，作风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作风问题，从根本上说来，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反映。它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它所解决的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做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一致。也就是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原则出发，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出发点，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哲学思想。前者是辩证唯物主义，后者是主观主义。因此，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从本本出发，从现成的公式、定义出发，脱离了具体实践；经验主义从局部经验出发，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二者的共同特征就是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使主观同客观相分裂。这样的作风是决不能引导革命到胜利的。当前，我们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打开新局面，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前

进。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党的作风上的体现。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这就告诉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应该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奋斗的出发点，目标和归宿。应该与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一起奋斗。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斗争就是毫无意义的；离开了人民群众，党就是没有力量的。总之，“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②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同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等错误进行的斗争中，在妥善处理党和群众的关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方法上的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从实践中来，又要回到实践中去，而实践是群众的实践。当我们把“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运用于领导工作时，就产生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这就是，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保证正确的领导，才能把各项工作搞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104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5页。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保证我们党的肌体健康，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锐利武器。我们党是在进行我们的前人从未进行过的事业，在斗争中，也会发生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阻碍着我们前进。为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我们对待自己思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根本态度，也是我们纠正这些错误的根本方法。我们既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不能听之任之，采取自由主义。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般情况下应以自我批评为主，各级领导干部更应以身作则。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党保持清洁的面貌和健全的肌体。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由于党风好坏决定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又决定党的命运。毛泽东同志把党风问题提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去加以论述和说明，把这些优良作风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我们党的新的工作作风。几十年来，我们党一贯重视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总结了建党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全党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使全党的党性大为增强，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从而使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保证我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取得了伟大胜利。

附录：

《实践论》、《矛盾论》 的历史背景

《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和八月。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战斗了十六个年头，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两个时期，正面临着肩负领导全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正确总结前两次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以利于领导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两次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内曾出现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教条主义者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只知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本中的只言片语，而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经验主义者则轻视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陷于极大的盲目性。他们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思想根源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主观主义。他们在指导革命时，有时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有时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又出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

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恶劣后果。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革命根据地大片丧失，白区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破坏，整个中国革命几乎被断送，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才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但由于当时还处在长征途中，没有来得及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清算。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领导全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经过长征到达延安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光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进一步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着重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使全党从思想上认识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并为后来开展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这两篇著作在全党产生了深刻影响和伟大指导作用。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专著，它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这两篇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我们党确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几十年来，《实践论》和《矛盾论》一直是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教材，是

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学习这两篇著作，对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克服经济建设中“左”的思想影响，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实践论》注释

（条目后注的页码均见《毛泽东选集》一九六六年改横排本后的四卷合订本）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第259页）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也叫旧唯物主义，一般指十七到十八世纪英、法、荷兰等国的唯物主义和十九世纪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坚持唯物主义路线，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但是它们不懂得辩证法，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观察事物，所以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十七、十八世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又突出表现为机械唯物主义，用机械力学的观点观察和说明自然现象。旧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它们的唯物观点仅仅限于对自然界的解释，在社会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在历史观上，它们由于不了解人的社会性，不能从社会关系中揭示出人的社会本质，不能把人看成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着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人，因而不能科学地说明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现象，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

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第259页题解）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是紧接着第二次“左”倾路线发生的。一九三〇年前后，王明等人相继从莫斯科回国，他们从“左”的方面反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取得了党的领导权。他们无论对中

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特点，或由此产生的中国革命性质、特点及其规律，都没有清楚的认识。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他们不是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他们背诵马列主义的条文，摘引马列主义的字句，机械地搬用外国革命的经验，或是抄录共产国际的决议，错误地夸大当时革命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份”的意义，片面夸大罢工斗争的意义，把革命中心放在城市，强调攻取中心城市和武装起义；他们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小资产阶级；他们反对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必要性，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转为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则搞宗派主义，对不同观点的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王明错误路线指导下，给党和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其恶果，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到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才纠正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第261页）

这段话引自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这段话中的“品格”一词，在《列宁全集》中改译为“优点”。意思是说（理论的）认识和实践，都有普遍性的优点。正确的理论都有指导行动的普遍意义，这是理论普遍性的优点。同时，实践也有这种优点，任何具体的实践，在任何共同的条件下，它产生的结果是相同的，这是实践具有的普遍性的优点。但是两者比较起来，实践是高于理论的。因为理论只有普遍性的优点，却没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一种理论即使是正确的，如果不回到实践中去，也无法证明它的正确。而实践则不然，由于它是具体的、直接的、物质的活动，它就能提供直接现实的成果。理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理论的正确与否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检验；理论不断发展也要靠实践来推动，所以实践是高于认识的。

认识的感性阶段（第262页）

在实践中外部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的认识。这种认识只反映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是低级阶段的认识，它有待于进一步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但是必须看到，感性认识是整个认识过程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它是理性认识的基础。

理性认识（第262页）

理性认识，属于认识的高级阶段。理性认识作为一种思维活动，指对感性的材料进行加工的过程，即形成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等活动。作为思维的结果指反映事物本质和内部联系的论理的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理性认识更为重要，因为它比感性认识对事物的反映更深刻、更本质、更全面。但它又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上产生的，离开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感觉（第262页）

感觉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表面形状、颜色、味道等某一个别属性的直接反映。感觉可分为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等。感觉是感性认识的最简单的一种形式，是整个认识过程的起点。

印象（第262页）

印象或称表象，是某一事物的外部特征在头脑里所留下的形象。人们可以通过回忆使这个形象再现出来。它是较高于感觉和知觉的一种感性认识的形式。

突变（飞跃）（第262页）

突变，也叫飞跃，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事物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质的变化。这种从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转化、发展，表现为飞跃。任何事物的质变都是通过飞跃实现的。如在认识过程中，从感性

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就是通过飞跃完成的。事物因性质不同，飞跃的形式也多种多样。

论理（逻辑）（第262页）

论理和逻辑这两个词意思是一样的。“逻辑”是按外文的读音译过来的。其含义较多：一是指思维的规律性；二是指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即“论理学”，也叫“逻辑学”；三是指客观规律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思维规律同客观事物的规律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这里几次使用“论理”这一概念，提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论理的认识”、“认识表现为论理的”，意思是说，当人们的认识处于感性阶段的时候，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同时这种认识只是感性直观的结果，还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因而它还谈不上符合思维规律，即符合逻辑规律，只有理性认识才达到逻辑思维阶段，也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在理性认识中，客观规律和思维规律得到统一。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论理”，既指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又指思维的规律性。它是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始终体现着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

概念（第262页）

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它是从感性认识所提供的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它反映的不是事物个别属性和具体表象，而是事物的一般属性和本质。概念是理性认识的形式之一。

判断（第262页）

判断是人们对事物的判明或断定。它判明或断定事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等等。一个判断所肯定或否定的内容与客观现实相符合，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与概念相比较，判断对事物本质的反映更充分、更明确。在逻辑形式上，它表现为概念之间的一定联系或关系。

因此，判断是比概念更高级的思维形式。

推理（第262页）

推理是从已知的判断合乎规律地得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通过推理，人们可以扩大认识的成果，从现有知识推出新的知识，从已知推出未知。推理不仅反映事物的内部联系，而且能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因而，它比概念、判断是更高一层的思维形式。

思维（第262页）

思维作为哲学概念有多种含义。一是指与感觉相对的理性认识；二是指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将感性材料进行加工的思考过程；三是相对于存在而言，如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思维和存在相对的提法。

《实践论》中运用“思维”这一概念指理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过程。例如，“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

科学的抽象（第263页）

这句话引自列宁《哲学笔记》。原文是“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人们在认识复杂的事物时，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运用思维舍弃它们个别的、偶然的、表面的、非本质的属性，抽取出一般的、本质的属性，达到理性的认识，这一过程或方法就叫抽象，也叫科学的抽象。如果脱离客观事物进行空洞的、形式主义的抽象，那就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这种抽象就是非科学的、不正确的、不郑重的、荒唐的抽象。

自在的阶级（第265页）

自在的阶级指政治上没有达到成熟的无产阶级。这时的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是表面的、片面的。它们没有觉悟到把资本家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和独立的政治力量，还不了解

自己的历史任务，因而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是分散的、自发的，斗争矛头只指向个别资本家，甚至采取破坏机器的办法，斗争的范围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

自为的阶级（第265页）

自为的阶级指政治上已经成熟的无产阶级。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无产阶级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剥削是工人贫困的根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工人阶级自觉地有组织地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为解放本阶级和全人类而奋斗，标志着工人阶级政治上已经成熟。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就由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的阶级。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笼统的排外主义（第265—266页）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是在清朝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帝国主义侵入的刺激下爆发的。主要锋芒是对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他们对外坚持平等、友好、反对侵略的外交政策。洪秀全曾主张“上古中国同番国，君民一体敬皇天”、“中外是兄弟之国，要共同生活如兄弟”。但当帝国主义扯下“中立”的虚伪面纱，和清王朝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太平军的英雄们坚决拿起武器，给侵略军以迎头痛击。

义和团运动是清末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瓜分中国，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愤怒。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他们憎恨洋人，反对侵略，与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正义感，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外部和各种矛盾以及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的实质，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对外国，“对洋人”，不作具体分析，所以是笼统的排外主义。

唯理论（第267页）

唯理论又叫理性主义，是旧哲学中认识论的一个派别。它片面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否认感性认识的作用，认为只有理性认识才是可靠的，感性认识是靠不住的。

唯理论又分唯物主义的唯理论和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理性认识是人头脑里天生就有的，不是来自感性经验。如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就断定感觉器官不可靠，因此，知识不是来自感性经验，一切真理性的观念如数学公理、逻辑规律等都是天赋的，一切真理性知识都是从天赋观念中推演出来的。这样得到的理性知识才是最可靠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虽然承认理性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但它片面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否定感性认识的作用。近代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把知识分为感性知识、理性知识和直观知识三类。认为第一类是混淆的、不正确的，后两类才是可靠的，要正确认识世界必须凭理性直观去完成。唯物主义唯理论在反对信仰高于知识的宗教观念的斗争中起过进步作用，但因割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联系，使理性认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在认识的总体上仍然是错误的。

经验论（第267页）

经验论也称经验主义，与唯理论相对。也是旧哲学中认识论的一个派别。经验论夸大感性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否认理性认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经验论也有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唯心主义经验论两种。唯物主义经验论如英国近代哲学家洛克（1632—1704）认为感性经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人类知识的来源，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只承认感性经验的可靠性，否认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认为理性认识只不过是纯粹的名词而已。这是片面的观点。唯心主义经验论，如英国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1684—1753），一方面否认理性认识，另一方面又认为经验是纯主观的东西，并把主观经验作为唯一的认识对象。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第268页）

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是指人类的认识具有不断变化发展的性质。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也必然随之而发展变化。另外，认识的主体都是处在一定时代、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人们的认识则必然要受到特定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历史条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人们的认识也会不断发展。认识的发展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二是指实践——认识——实践这一过程的不断往复。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批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主要指这两个哲学派别都不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辩证发展过程。唯理论不懂得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而来的，把理性认识看成孤立的东西。经验论不懂得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必要性，把感性认识凝固化。

机械唯物论（第272页）

机械唯物论或称机械唯物主义，是以机械的观点去解释和认识世界的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唯物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典型形式。以十七世纪英国的霍布斯、荷兰的斯宾诺莎，以及十八世纪法国的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为代表。这一哲学派别是在同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承认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它反对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机械唯物主义存在很大的缺陷，它把一切运动都归为机械运动，用纯粹力学的观点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把人也看成机器。在历史观上，机械唯物主义陷入了唯心主义。

知行统一观（第273页）

知行统一观，就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中论述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观点。这一提法是同中国哲学史上曾经争论过的知与行的关系问题结合起来讲的。

知与行是中国哲学史上两个哲学概念。知，指知识和道德观念；行指行为、行动。《实践论》中改造了知与行的旧概念，赋予新的内容，把知与认识、行与实践等同起来。在知与行统一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不同观点。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认为行统一于知，唯物主义认为知统一于行。前者显然是错误的。后者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它对行的内容的理解是片面的，又不懂得知对行的反作用，因而这种知行统一观也有很大缺陷。辩证唯物主义既承认知从行中产生，知统一于行、又承认知对行有很大的反作用；还认为知与行的统一不是抽象的僵死的统一，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知随着行的发展而发展。这就是《实践论》中所说的知行统一观，即科学的知行统一观。

《矛盾论》注释

“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第274页）

这句话引自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这句话的中心思想说明，客观事物的本质自身是矛盾的，或者说，矛盾构成事物的本质。而研究事物即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是辩证法的根本任务。列宁这一思想是在研究辩证法发展史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特别是在总结、改造黑格尔的有关论述后而得出的经典性结论。《哲学笔记》中，列宁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多次阐明过这一思想，如他在列举辩证法要素之后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还指出“……辩证法的本质。对立面的统一、同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现着这个本质”^②；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又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③毛泽东同志更明确地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所以，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写的《矛盾论》就是抓住了辩证法的这一核心和本质问题而展开的。

宇宙观（第274页）

宇宙观就是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例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事物是发展的还是不变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事物内部还是在事物外部等等。在阶级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5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同阶级的人们，由于在社会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特别是阶级地位的差异，逐渐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各种世界观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一般情况下，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先进阶级和进步势力的世界观，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反动阶级和保守势力的世界观，对社会发展起着阻碍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德波林学派（第274页）

德波林学派是二十年代后期在苏联出现的一个哲学派别，代表人物是德波林。他在十月革命前曾参加孟什维克派，一九二九年后任苏联科学院院士。德波林学派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差异就是矛盾。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而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这一学派还鼓吹用对立面的“互相调和”来解决矛盾，反对对立面的斗争。这些观点在三十年代初曾受到批判，斯大林称它是一种“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

形而上学（玄学）（第275页）

形而上学是从希腊文“物理学之后”一词翻译而来的。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一生写了许多著作，不仅写了一部《物理学》，研究自然界的运动发展变化，而且还写了许多研究世界本质及其属性等哲学著作。后来，他的学生在编辑他的著作时，把这部分哲学著作放在《物理学》的后边，命名为《物理学之后》或《后物理学》。我国在翻译时，根据《物理学之后》一书所涉及的是关于世界的本质、神、灵魂、意志、自由等超越具体有形事物之上的抽象哲理的内容，这恰与我国古代《易经·系辞》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里的“形而上者”意思相近，因此就用“形而上学”来翻译《物理学之后》。由此看来，形而上学一词开始指探讨抽象哲理的学问，是哲学的代名词。另外，我国魏晋时期的玄学也是研究深奥、玄妙的哲学道理的，所以将形而上学和玄学两词互相换用。

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哲学名词，现在有两种涵义：（1）自黑格尔以后，形而上学成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才彻底揭露了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它的特点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彼此孤立，永远不会变化；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增减和场所变更，而这种增减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等。（2）形而上学指一种研究感官不可达到的东西即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神、灵魂、意志、自由等。这一用法在马克思以前已存在，至今流行于资产阶级哲学家之间。我们通常所说的形而上学指反对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庸俗的进化论（第275页）

庸俗进化论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资产阶级用来对抗唯物辩证法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其代表人物有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等。这一学派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庸俗化，夸大了其中的缺点。它否认事物的质变，只承认事物的量变；否认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它用这种观点歪曲地解释社会生活现象，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主张逐渐进化、点滴改良和阶级调和。这种发展观是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

内因和外因（第277页）

内因和外因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因指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指一事物同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即外部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变化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内因是第一位原因，即根本性原因，外因是第二位原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必须一方面要看到内因在一般情况下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作用，反对“外因论”；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离开外因，单靠内因事物也不会发展变化，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外因对事物的发展方向、速度等起着决定性作用。

古代的辩证法（第278页）

古代的辩证法，又叫朴素辩证法，是古代人的一些朴素的、简单的辩证法思想。它直观地认识到事物是互相联系的，是运动变化的，并对事物的对立和统一等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了解。如我国古代《周易》中认为阴阳是普遍存在的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中谈到许多事物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联系与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等。在欧洲，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斗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等等。由于科学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等条件限制，古代辩证法只能直观地描述整个世界的轮廓，而不能具体说明世界各个部分的联系，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它不仅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并且一深入事物的细节问题，则往往陷入错误。

黑格尔的辩证法（第278页）

黑格尔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辩证法思想集大成者。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着一种绝对精神，它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源，自然界，人类社会等都是绝对精神发展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但是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首先把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写成一个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次，揭示出一切发展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还阐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以及真理是具体的，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精神与物质可以相互转化等辩证法思想。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存在很大局限性。例如他不是把辩证法看成客观事物自身的规律，而看作绝对精神的表现；他还把自己的哲学视为终极真理，并认为矛盾只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在绝对精神里矛盾则消声匿迹。这些表明他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是掺杂着形而上学成分的不彻底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摒弃了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并加以革命的改造，创立了唯物辩证

法。因此，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第280页）

这句话引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①。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意思指任何一种运动都是矛盾的运动，即矛盾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一切运动都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表现和结果。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最简单的机械运动和最复杂的生命运动以及思维活动等方面来阐明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道理。在机械运动中，运动的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②生命运动也是矛盾的过程，生物体内每一瞬间都有大批旧细胞死亡，新细胞产生，这使生物体同时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如果生物体内“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③《矛盾论》引用恩格斯“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目的在于说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第三等级（第282页）

通常指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前有纳税义务的一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阶层，他们占有大量土地与财产，有不受法律审判、不纳税等特权。第二等级指世代相袭的贵族，他们也拥有大量土地，并享受不交税等特权。第三等级，当时指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平民和已形成的资产阶级等。在经济上，他们有纳税义务，政治上受第一、二等级的压迫。在反对僧侣和贵族的斗争中，第三等级有着共同的利益，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在他们内部也存在着矛盾，随着反封建斗争胜利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第三等级内部的矛盾则逐渐趋向明朗化、尖锐化。

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290页）

辛亥革命是指一九一一年（旧历辛亥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

^{①②③}《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阶级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这次革命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开始酝酿。二十世纪初，以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团体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并把反清斗争逐渐推向高潮。一九一一年五月，广东、四川、湖北等地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发动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陆续响应，清政府统治迅速解体。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害怕触动帝国主义，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一九一二年四月，孙中山被迫辞职，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取。革命遂告失败。

袁世凯窃据大总统地位后，建立了封建买办的军事政治集团——北洋军阀，控制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分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各系军阀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混战。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其子张学良宣布加入南京国民党政府。历时十七年的北洋军阀从此覆灭，开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

新军阀战争（第290页）

新军阀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代替北洋军阀而起的、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阀。其主要代表是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不断进行战争。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间，新军阀间的大规模混战，主要有一九二七年十月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同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十月、十二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间的战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三〇年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一九三〇年四月到十一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此外还有各小军阀间的混战等。这些战争都是蒋介石方面取得胜利。经过这些战争，蒋介石国民党的南京中央政权表面上统一了

全国。

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第290页）

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一九二四年，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进入战后暂时稳定时期，它们结成反革命统一战线，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中国成为它们主要掠夺对象。它们一方面靠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另一方面又分别扶植中国各派军阀进行混战，以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国内军阀的野蛮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严重地损害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日益增长，这就为全国性的大革命和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革命要求，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样改组后的国民党组织，就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统一战线的建立，迅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军校。党利用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了工农群众中的工作，工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在我党的参加和领导下成立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非常恐惧，他们采取种种手段，收买国民党右派分子，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成为帝国主义从内部破坏中国革命的代理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叛变了革命，使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第一次统一战线遂告破裂。

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第290页）

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即一九三七年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军队、阶级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抗日统一战线包括进步力量、中间力量、顽固力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同时对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290页）

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第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个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党推动和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建立了革命的武装，因而形成了强大的战斗中心支柱，使北伐战争得以迅速发展，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打败了统治中国十余年的北洋军阀。在这次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党组织也由五卅运动前的九百多人发展到五万七千九百多人。

但是由于党内存在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党没有掌握武装力量，没有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因而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没能挽救革命，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第290页）

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也

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它是以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所以叫作土地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起义。同年十月，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随着斗争的发展，党还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等地领导了武装起义，成立了几支红军和几处革命根据地。从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反革命“围剿”。同年，日本进攻东北，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并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而蒋介石不仅采取不抵抗政策，并且加紧向苏区进攻。于一九三二年六月至一九三三年十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在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指挥下，粉碎了第四次“围剿”。同时，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扩大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内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长征途中，党又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取得长征胜利。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又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芦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共两党第二次重新合作，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就此结束。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290页）

指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确定国民党革命方向的政策。当孙中山经过革命的多次挫折正陷入绝望境地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了他新的希望。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根据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陈独秀主义（第291页）

陈独秀主义是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使革命遭到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

陈独秀原是北大教授，因编辑《新青年》而出名。一九二〇年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由于他是党的创建人之一，以及他在“五四”时期的影响，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作无原则的妥协；第二，不敢支持农民革命斗争，甚至为了迁就国民党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第三，在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问题上，陈独秀机会主义忽视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不懂得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使陈独秀主义统治了中央，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第296页）

指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由于英国对中国长期实行侵略政策，大量输入鸦片，攫取了我国大量白银。这一方面麻醉和毒害了我国人民的身心，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痛恨；另一方面大量白银外流引起银价飞涨，财政困难。在此情况下，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清政府派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到广州后，严厉禁烟，并多次打退英军挑衅。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决定用大炮保护鸦片贸易，于一九四〇年发动了鸦片战争，要挟清政府谈判。清政府即派琦善赴广州求和，并将林则徐革职。英国侵略军一爬上中国土地，就进行疯狂的屠杀抢掠。他

们攻占了定海、大沽、厦门、广州，并向长江下游进攻。英国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广州城郊三元里人民联合附近各村，迅速组成数万抗英武装力量，奋起抗英，歼敌数百，迫使英军撤回军舰。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在英军的大肆进攻下，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及其相勾结的封建势力同人民群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第296页）

即甲午中日战争。十九世纪末期，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蓄意发动侵华战争。一八九四年七月，日军突然袭击中国海军，并进攻我国的东北、大连、旅顺等地。值此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和广大陆海官兵以民族利益为重，同仇敌忾，要求抗战。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于同年八月一日被迫对日宣战，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陆军也连吃败仗，东北大片土地丧失，并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第299页）

同盟会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全称是“中国革命同盟会”。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美国的檀香山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一九〇五年，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其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举孙中山为总理。自一九〇六年起，孙中山领导同盟会举行了多次起义。一九一一年领导了著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曾一度取得了胜利。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平衡论（均衡论）（第301页）

平衡论又叫均衡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它认为事物运动发展的原因不是事物内部矛盾，而是外部因素。它把事物的各种矛盾以及矛盾的

各个方面平列起来，平均看待，不分主要和次要，不讲重点和一般。它把矛盾的暂时相对的统一看成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否认矛盾的斗争和转化。还认为平衡、渐变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不平衡、质变、革命是不正常的。这种观点在政治上表现为主张阶级调和，否认阶级斗争，否认社会变革，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之一。主要代表有孔德、斯宾塞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306页）

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法国发生了推翻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末，法国封建制度已极端腐朽，以国王路易十六为首的第一、二等级与广大的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情况下，一七八九年五月，国王被迫召集“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团因受到歧视退出会议，自行召开国民会议，宣称自己是全国国民的代表。国王得知后，调动军队进行镇压，把巴士底狱碉堡的大炮对准人口密集的市区，激怒了法国人民。七月十四日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革命于是爆发。在群众力量推动下，革命步步深入。其间，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利益的斐扬党人，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雅各宾派先后执政。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专政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达到高潮。它颁布了一七九三年宪法，废除封建所有制，取消封建特权，镇压了反革命分子，粉碎了欧洲君主国家的武装干涉。但是，即使激进的雅各宾派也仍然摆脱不了其阶级的局限性。它上台后，继续保留一些反动法令，并先后镇压了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愤怒派和阿贝尔派。一七九四年七月，罗伯斯庇尔的敌对派利用革命政府群众基础的削弱，推翻雅各宾派专政，建立“热月党”统治。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不仅摧毁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而且动摇了整个欧洲的封建体制，推动欧洲各国革命。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矛盾双方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同一性问题时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就是说，它们

之间没有互相转化的同一性。因为当时不具备这种转化的条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当时资本主义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社会主义还没有提到历史的日程上，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都没有产生，这种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的前途只能导致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不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

巴黎公社（第306页）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利用普法战争的危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而建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的产生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马克思曾指出，巴黎公社所创立的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原则是永存的。另外，一百多年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也证明巴黎公社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原则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巴黎公社建立后仅存在了七十二天，于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失败。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壮举，但它为什么又终究失败呢？总的来说，当时不论在客观方面，还是在法国无产阶级本身，都还没有充分具备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例如公社首先缺乏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领导，由此而导致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一系列错误。如没有及时向凡尔赛进军，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没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没有及时没收法兰西银行等。就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来讲，资本主义正在向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与此相联系，各国无产阶级正在积蓄革命力量，他们还没有能力最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因为这些原因，巴黎公社的失败是难免的。

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和社会主义的联系（第306页）

蒙古，指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影响下和苏俄的援助下，蒙古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废除君主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中亚

细亚，指现在苏联亚洲部分西南部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等加盟共和国所在地区。十月革命后，这个地区逐步并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无论是蒙古，还是中亚细亚，它们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都是处在落后的游牧制度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来看，它们都属于超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当时这些国家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没有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落后的游牧制度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则不会发生直接联系。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的历史背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当时，毛泽东同志曾以这一著作的内容在陕北红军大学做过讲演。后来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这一著作只写了五章就搁笔了，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和其他问题没有写。毛泽东同志写这篇著作主要是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阐明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使中国革命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许多地区举行了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的秋收起义，创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进入井冈山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也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个时期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坚持正确的建军原则和适合我国情况的军事战略战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红军各方面军连续击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革命声势日益壮大。

但是，毛泽东等同志为我党制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

原则，多次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和破坏。王明等人否认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不平衡的特点，否认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长期性，反对关于依靠农民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和在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长期积蓄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他们总是梦想以弱小的红军攻取中心城市，由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达到迅速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在军事上，他们不认识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反对游击战和运动战，主张打阵地战和单独依靠红军主力的所谓“正规战”；反对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主张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在优势敌人面前采取防御手段，主张实行所谓不间断的进攻的军事冒险主义。而当冒险主义遭到失败被迫转入防御时，又反对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分兵把口、节节抵御的消极防御方针。结果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丧失了大部分根据地，并被迫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王明“左”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已告结束。会上，党中央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军事问题上的争论作了结论，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从思想上，认识上系统地总结两条军事路线的历史经验，当时还来不及进行。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后，为了使全党深刻记取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教训，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在系统地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重大问题的同时，又在一九三六年底写了本书，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高度系统地总结了这一时期在军事路线上的历史经验，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的根本观点和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进一步从

理论上清算了王明的错误军事路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既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又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它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篇著作中已经包含了《实践论》、《矛盾论》中所详细展开论述的许多重要哲学思想。它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已逐步趋于成熟。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释

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第157页）

机械论是指以机械的（力学的、物理学的）观点去解释自然界和认识方面问题的机械唯物主义。它往往是某种错误观点的认识论根源。这种错误观点的特点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个侧面，或一个时候的表现，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这里反对的“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指的是那种只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是只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是套用过时的北伐战争的经验，而不根据战争的时间、地域和性质研究我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错误观点。此外，如只看到武器而看不到人力的唯武器论；只看到敌强我弱一个方面，而看不到其它方面的亡国论；对敌方估计过低，对我方估计过高的速胜论，从认识根源上说也都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战略、战役、战术（第159页）

战略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是指导和筹划战争全局的方针、策略。它根据战争的性质和敌我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分析战争的过程和结局，规定战争力量的准备和运用。

战役是军队为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按照统一的作战计划，在一定的方向上和时间内，所进行的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的总称。其规模大小，决定于参加兵力的多少。

战术是根据战略上的要求和敌我双方具体情况、自然条件来指导战斗的原则和方法。

战略、战役、战术三者的关系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作为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的战役和战术，是由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所统帅

和决定的。战役、战术必须适应战略的要求，服从战略的需要，受战略所制约。正由于这种关系，所以不仅战略指导者要研究战略问题，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也必须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这样，才能深刻了解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才能更自觉地使战役、战术服从战略的要求，在统一的战略指导下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争取战争的胜利。

持久战（第161页）

指持续时间较长的战争。通常是由正义的一方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采取逐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转劣势为优势，最后战胜敌人的方针，以打破对方速决战的方针而形成的战略。中国革命战争，由于敌强我弱，在战略上必须坚持持久战，但战役、战斗上则应集中优势兵力，采取速决战的方式。这样，每战必胜，就能积小胜为大胜，变局部胜利为全局胜利，最后赢得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是一个持久战的典型。

速决战（第161页）

指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决定胜负，解决战斗的作战形式。通常是在一方力量处于绝对优势并指导正确时，才有可能实现。中国革命战争，由于敌强我弱的特点，在战略上必须坚持持久战，但在战役、战斗上必须实行速决战。这是因为我们在兵力、弹药补充和后勤供应等方面均不如敌人，就不能在战役和战斗上和敌人拖时间、拼消耗，必须集中兵力，在一个局部范围内形成对敌人的绝对优势，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歼灭或打败敌人，迅速解决战斗。这样就能一步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使敌我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因此，从全局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战役和战斗上的速决战不仅是实现战略上持久战的保证，而且是我们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

阵地战（第161页）

是交战双方凭借阵地进行防御和攻击的作战形式。分两种：一种是防

御阵地战。在防御阵地战中又分为积极防御的阵地战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前者是采取积极防御的办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时间，为战略反攻准备条件；后者则是处于挨打被动地位。另一种是攻击阵地战，是配合运动战的阵地战。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由于在很长时间内存在着敌强我弱的形势，技术条件也远不如敌人，因此，很少使用阵地战的作战形式（后来的解放战争例外）。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般也不主张和日本侵略军打阵地战。但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也往往采用攻击阵地战，以配合运动战。在战争第三阶段，由于我们武器装备等均有所改善，要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阵地战的地位也就相应提高。

运动战（第161页）

指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便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通俗地讲，运动战就是在运动中作战，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运动战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毛泽东同志认为运动战是最重要的作战形式。他指出，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这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如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基本打的是运动战。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由于否定红军小的游击和小的流动，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来了一个大的游击和大的流动——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作战形式主要的仍然是运动战。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抗战的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游击战上升为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以阵地战和游击战。当然在不少情况下，运动战和游击战可以灵活地交替使用，比如把正规军

分散开来打游击战，集中起来又可以打运动战，这是我军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72页）

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罗章龙等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这些决议肯定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确地指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

党的六大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党的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但是也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

苏联内战（第173页）

一九一八年初，英、法、美、日等协约国的干涉军，先后进犯苏维埃国家，占据大片土地，并扶植傀儡政权，发动武装叛乱。在南方有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叛乱；在中部和东部有高尔察克反革命政权和与之相勾结的捷克军团叛乱；在西北部有尤登尼奇的叛乱；同时，德国军队继续盘踞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一带，当时四分之三领土陷入敌人手中，苏维埃国家处在四面包围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红军同国内外敌人进行英勇斗争。一九一八年底，东线粉碎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南线两次打退白匪对察里津的进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一九一九年初到一九二〇年底，协约国又先后组织高尔察克、邓尼金、波兰地主武装对苏俄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武装干涉，但这些干涉都被英勇的红军所击

败。到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除东方日本外，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结束。

游击主义（第175页）

游击战是比较弱小的军队战胜比较强大的军队采取的一种作战形式，它对正规战起辅助作用。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游击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如果把游击战绝对化，不注意和正规战配合，也不重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就会犯游击主义的错误。所以，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承认红军的游击性，一方面又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

两个拳头主义（第175页）

在同一个时期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战略方向，但要克敌制胜，在战略上同一个时期只应有一个方向，这样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这叫一个拳头主义。如果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就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这叫做两个拳头主义，是一种“左”的冒险的军事指导思想。

“围剿”和反“围剿”（第176页）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蒋介石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九三一年五月、一九三一年七月、一九三二年六月、一九三三年十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它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与此同时，红军进行了五次反“围剿”。前四次反“围剿”由于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和贯彻了他正确的战略、战术，因而取得了很大胜利。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我们打退了敌人十万兵力的进攻，歼敌一万多名，缴枪一万三千多支。第二次反“围剿”，红军打退了敌人二十万兵力的进攻，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二万多支。第三次反“围剿”打退敌人三十万兵力的进攻，歼敌三万多，缴枪两万多支。第四次反“围剿”打退了敌人五十万兵力的进攻，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支。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

者拒不采用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战略、战术，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以及逃跑主义的错误战略，因此使这次反“围剿”斗争遭到严重失败，迫使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第177页）

这是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红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争的历史。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以后，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但红军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围剿”红军和红军反“围剿”的过程。小的“围剿”和反“围剿”不算，从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大的“围剿”和反“围剿”战争就有五次。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仍命令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进行“围剿”。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一九三七年七月全国抗战爆发以后，国共两党重新建立统一战线，这种“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才暂告一段落。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的历史。

战略防御（第178页）

防御是战争中的基本作战形式之一，是战争中的一方为抗击敌人的进攻，保存自己，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而采取的手段。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战略防御，是根据对敌我力量总的情况的分析，规定的在敌人处于优势时我军所应采取的战略原则。实行这一战略原则是为了避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敌决战，而对敌人尽量予以消耗、打击、阻挠，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努力争取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出现，相机转入战略进攻。

战略进攻（第178页）

进攻是战争中的基本作战形式之一，是军队主动攻击敌人的行动，也

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战略进攻是毛泽东同志规定的在我军力量整个超过了敌军力量时所应采取的战略原则。战略进攻是使用优势兵力，主动造成战机，迫使敌人实行决战，对敌人举行攻击、包围、歼灭，迅速解决两军间的胜负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当中国革命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时，虽然局部地区或某一战役、战斗的积极防御还将存在，但这种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湘赣边区的三次“围剿”（第179页）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湘赣两省反动武装对根据地进行过三次“围剿”。第一次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七月，正是南方反动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多次进攻，进攻的敌军少时八、九个团，多时十八个团。红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在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指挥下，紧紧依靠群众和地方武装的配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一次一次粉碎敌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第二次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当时由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人，乘毛泽东同志不在井冈山之际，强行把红军大队拉出去攻打湘南郴州，造成八月失败，敌人乘机向井冈山发动进攻。八月三十日，留守井冈山的红军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卫了井冈山。随后，毛泽东率领从湘南返回的红军，又先后收复了边界各县，重新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第三次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发动了新的军事“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扩大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主力决定进军赣南、闽西，只以一部分红军留守井冈山，从而打乱了敌人的围剿计划，使其目的未能达到。而红军在赣南和闽西则得到很大的发展。

福建的两次“围剿”（第179页）

一九二八年春，福建西部的龙岩、永定等地的农民在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闽西地方武装。一九二九年二月到十月，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红四军三度入闽，与闽西

地方党相结合，开辟了闽西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四月，国民党陈国辉、卢新铭率部“围剿”红军。红军从龙岩撤退，转向上杭发展，迅速消灭了卢新铭一个团。然后回头攻打龙岩城，将陈国辉部三千多人全部歼灭。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蒋介石又组织江西金汉鼎、福建刘和鼎、广东陈维远等部“围剿”红军，号称“三省围剿”，向闽西等区逼进。红四军前委决定将红军转移到敌人后方去，转移敌人目标。一九三〇年初，红四军便从左田出发，去江西展开游击战争。结果使敌人在闽西扑了空，加之闽西各地开展游击战争，敌人到处挨打，只好撤退，声势浩大的“三省围剿”就这样冷冷清清结束了。

军事冒险主义主张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第187页）

“御敌于国门之外”是王明军事冒险主义的一个极其错误的战略。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在这次“围剿”中，国民党采用了碉堡推进，步步为营，堡垒主义的作战方法。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在战争一开始就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他们反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全线出击”，“不丧失寸土”；反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主张“分兵六路”，“两个拳头打人”。结果使红军陷入了被动挨打地位。这时，他们又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和堡垒政策所吓倒，转而采取防御中的保守方针，主张全线防御，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

曹刿（第187页）

曹刿（guí 贵），即曹沫。春秋时代鲁国武士，能勇善谋。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齐国攻鲁，曹刿随庄公战于长勺。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被曹刿阻止了。曹刿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成为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

立三路线以前的党中央（第188页）

指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担任总书记时期的党中央。

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第189页）

这是指在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一个决议。决议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夸大了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过低地估计了农民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为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达到总崩溃，亿万人民的革命斗争剧烈紧张，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否认工人运动还暂时落后于农民运动，错误地要求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工作中心转为用最大力量开展城市罢工斗争，要求红军攻占中心城市，把夺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放在党的全部工作和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这个决议集中地反映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第192页）

出自《孙子兵法·军事篇》。这里的锐气，是指战斗初起时军队强的攻击力和凶猛气势；惰归是指军队松懈、疲劳和退却之态。意思是说要避开敌军强的攻击力，待其松懈、疲劳和退却时再攻打它。毛泽东同志要求学习古代战争的这个经验，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打击敌人，以减杀强敌的优势。

孙子所谓“示形”（第193页）

示，即显现；形，即状态。“示形”出自《孙子兵法》《计篇》，孙子认为，在战争中要设法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敌人，如势强装作势弱；要打装作不打；要近攻装作远攻等，用此扰乱敌人的耳目，以便乘机取胜。毛泽东同志主张在作战时要采取“示形”的灵活战术，特别是在敌强我弱，实行战略退却时，用“示形”方法可以人为造成敌军的过失，乘敌之隙，

消灭敌人，变退为攻，这里举例说“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第195页）

出自《老子·三十六章》。原文为：“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意思是说，要想得到别人东西，一定得先给别人东西。

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第195页）

阿比西尼亚即现在北非的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入侵阿比西尼亚期间，全国人民在塞拉西一世皇帝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抵抗。但由于阿比西尼亚不願意方力量过大的客观情况，一味硬拼硬打，不愿意丧失一点土地，结果还是被意大利吞并了全部领土。毛泽东同志借助于这个历史教训，说明在敌我力量悬殊过大的情况下，不应采取硬拼硬打的错误战略，应该采取有攻有守，有进有退等灵活的战略、战术。有时失去一部分土地和城市，是为了保住大部分的土地和城市，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辩证法。

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第196页）

十月革命后，苏俄决定退出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但这引起了英、法等协约国的仇恨。他们想把苏俄继续拖入战争，并企图借德帝国主义之手，来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当时苏俄的情况十分严峻，前线的沙皇军队已处于瓦解的局面，国内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疲于战争，而德帝国主义随时都有发动新的进攻的可能，苏俄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因此，争取一切时间来巩固苏维埃政权，是当时最关键最紧迫的任务。列宁正是从这样的实际出发，主张和德国谈判，签订和约。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内以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却竭力反对列宁的主张，他

们高喊世界革命的口号，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德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甚至荒谬地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牺牲苏维埃政权也在所不惜。列宁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争取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在布列斯特签订和约。这个条约本身当然是屈辱的，苏俄要割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和部分白俄罗斯等大片领土，还要赔款三十亿卢布。但对苏俄来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种革命妥协，对德和约使它赢得了时间去巩固苏维埃政权，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军，粉碎十四国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协约国对德签订的停战协定签字后两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便宣布废除这个条约。毛泽东同志借用布列斯特和约的历史事件来说明以暂时妥协求得最终胜利的辩证道理。

堡垒主义（第204页）

堡垒主义，也叫“碉堡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时采取的作战方式。一九三三年十月间，蒋介石调集一百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国民党军队改变了前四次“围剿”时的作战方法，在革命根据地周围遍筑碉堡，依据碉堡步步前进，企图逐渐压缩革命根据地，消灭中国工农红军。据统计，仅在江西，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就筑碉堡二千九百座。当时红军由于受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遭受严重损失，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灭此朝食”（第217页）

这是批评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上的一种“速决”思想时，引用《左传·成公二年》中的一句成语。意思是消灭了敌人再吃早饭。用来比喻急于消灭敌人的心情。但在实际上，中国革命的敌人是不可能在一个早上被打败的。所以，这里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

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

福建事变（第219页）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攻击，十九路军同上海人民一道进行了抗战。此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至福建和红军作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和广大官兵的推动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认识到同红军作战没有出路，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进行反蒋，并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当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同时又派兵去攻击十九路军，毛泽东同志主张借助福建事变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堡垒战，进入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并能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这一正确主张遭到王明路线执行者的拒绝，使红军错过了一次扭转战局的良机。同样，福建政府也由于孤立无援，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蒋介石优势兵力攻击下失败。

歼灭战（第220页）

消灭敌人全部或大部的有生力量的作战叫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各个歼灭敌人，是歼灭战的正确的作战方法。在中国革命战争和中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毛泽东同志不主张战略上进行歼灭战，而主张在战役或战斗上多打歼灭战，因为它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所以进行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历来是我军作战的根本指导原则之一。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的历史背景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最早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四十期上；《论持久战》是同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

一九三八年五月，正是芦沟桥事变后，全面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十个月的时候。当时形势的发展表明，摆在抗日军民面前的已经不是要不要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实行抗战的问题。

芦沟桥事变后，日寇来势汹汹，骄横拔扈，幻想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采取“闪电式”的进攻方式，至多三个月就使中国丧失全部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投降。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已经占领了北平、天津，几乎控制整个华北；继而又占领上海、南京等城市，正准备向武汉、广州进攻。

面对日寇的猖狂进攻，我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抗战是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和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担负的敌后战场联合进行的。两个战场，由于实行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而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场面。国民党正面战场，由于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几百万军队在日寇几次打击之后，节节败退，一溃千里，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危机。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由于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正确的战略方针，勇敢挺进敌后，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还在抗战爆发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就叫嚣“中国武

器不如人，战必败”，以后又说“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幻想依赖外援迅速取胜。当时在党内以于明为代表的部分同志，由于麻痹轻敌和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也幻想依赖国民党取得速胜。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广大军民，迫切要求正确回答这些问题。

为了澄清党内外的混乱思想，推动抗战的胜利发展，早在抗战爆发不久，党的洛川会议就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此后朱德、周恩来等同志也曾在报告和文章中阐述过持久战的思想，明确提出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为了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揭示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全国人民指明胜利的方向，毛泽东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在这个时候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是两篇光辉的军事著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深刻阐明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实行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战略原则。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时代条件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论述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和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客观依据，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预见了持久战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对怎样进行持久战提出了一整套的方针。

这两篇著作也是光辉的哲学著作。都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光辉的范例。其中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战争问题的宝贵经验，也有对《实践论》、《矛盾论》中一些哲学观点的深化和发展，都是我们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必读著作。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注释

元朝灭宋（第374页）

从公元一二三五年开始，元朝灭宋的战争持续了数十年，到公元一二七九年，南宋王朝终于被元所灭。

南宋属于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朝代，地处江南比较富饶地区，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而蒙古族当时刚摆脱奴隶制，进入早期的封建制，经济文化比南宋要落后得多。元朝所以能灭宋，主要是由于南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人民普遍不满。在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况下，南宋当局一味投降求和，不敢组织人民进行有力抵抗，反而阻挠和破坏人民的反元斗争，这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在元朝方面，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统治集团，是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新兴统治力量，它们有严密的军事行政组织，战斗力强。虽然经济文化落后，却能接受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取汉族封建统治者的经验。例如由任意掠夺人口土地转为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对贵族大量掠夺人口土地也采取了限制的措施等等，这些是它能够灭亡南宋的重要原因。

清朝灭明（第374页）

小而强的满族统治者灭了大而弱的明王朝，这是在农民起义战争摧毁了明王朝的基础上，由满汉官僚地主阶级联合扑灭农民起义军和消灭南明抗清势力后实现的。战争从公元一六四四年清顺帝入京当皇帝开始，到一六六一年明桂王被俘，明朝政权彻底灭亡。

清朝之所以能够灭亡明朝，主要由于明王朝的腐败无能。明朝末年，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沉重打击了明王朝的统治，满族统治者伺机准备进攻关内。但明朝的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对满族统治者的掠夺和进攻仍

然采取放任态度，倾全力镇压农民起义。李自成起义失败后，曾出现各派政治力量（农民军、明朝的地方势力等）共同抗清的局面。但偏安一隅的南明小朝廷，内部争权夺利，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仍然苟且偷安，醉生梦死，对清统治者存在幻想。排挤打击抗清派人物，对真正的抗清力量——农民起义军，仍然坚持敌视立场。因此，虽然当时南明政权尚拥有数十万大军，控制着江南的广大富饶地区，但仍难以避免灭亡的命运。

英国占领北美和印度（第374页）

英国侵占北美和印度的事件，发生于十七世纪初期至十九世纪中期。

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它加紧向世界各地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从十七世纪初期开始，英国殖民主义者便采取贸易欺诈、土地掠夺、疯狂屠杀印第安人等手段，逐步侵占了北美洲的大片领土。北美印第安人虽然多次起义抗英，但由于各部落之间互相敌对，加之武器很差，终于被镇压下去，使北美变成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利用其东印度公司开展贸易之便，施展种种威逼利诱、收买拉拢、挑拨离间等伎俩，到十九世纪中期，完成了对整个印度的占领。

作为一个小小岛国的英国，之所以能够占领广大的北美和东方大国印度，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北美的土著民族印第安人，则处于落后的原始公社制阶段，部族之间矛盾很深，容易被英国侵略者所利用；印度当时处于封建割据的阶段，宗教对立、种族矛盾都很剧烈，也为英国的入侵提供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严厉地揭露和驳斥了日本侵略者重演十七世纪英国占领北美和印度那样的悲剧，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的痴心妄想。指出，时代已经进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支坚强的红军武装，有适合中国特点的抗日游击战争，英国侵占北美和印度的美梦再无任何现实价值了。

拉丁系国家占领中南美（第374页）

拉丁系国家是指使用拉丁语系的国家，这里主要指西班牙和葡萄牙。

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上半期，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通过一系列战争和掠夺，侵占了现在的中美洲、南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整个拉丁美洲，使世代生长在这里的千百万印第安人遭受了最残酷的奴役和灭绝种族的屠杀。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之所以能够占领中南美洲的广大地区，主要是由于它们处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进步时期，它们有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较强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而中南美洲则处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加上部族之间的相互矛盾和敌对，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外来侵略，这就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拉丁系国家，能在短时间内占领广大的中南美洲。当时代已经进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时候，处于退步的时代、快要灭亡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还在做这类美梦，当然是行不通的。

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第377页）

战争中处于防御和被包围态势下的一方的作战，叫内线作战；处于进攻和对敌人实施包围态势的一方的作战，叫外线作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提出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是指红军虽然在全局上处于防御和被包围状态，但在局部的战役和战斗中却要利用和创造各种条件，进攻和包围敌人之一部，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一作战原则是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历史上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第387页）

流寇，即到处窜扰之寇。明代以来封建统治者常用以污蔑流动作战的农民起义军。在我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军习惯于流动作战的方式，不重视建立根据地或不重视巩固根据地。这些农民起义虽然给封建统治者以

沉重的打击，但由于没有战略基地作为依托，而易于被反动军队击败或消灭。这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唐末的黄巢起义和明末的李自成起义，便属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要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这个教训，在革命战争中要彻底克服流寇主义，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利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论持久战》注释

亡国论、速胜论（第407——408页）

亡国论和速胜论是抗日战争初期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两种错误论调。

亡国论主要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散布的一种谬论。在抗战以前，他们散布“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做阿比西尼亚”等悲观论调。抗战开始后，他们又说什么“再战必亡”。速胜论是党内王明等人和国民党的另一些人的观点。他们存在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以为中国抗战很快就能取得胜利。

亡国论和速胜论者的错误观点，在认识论上的根源是唯心论和机械论。亡国论者看重了敌强我弱的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根据，而忽略了大国小国、进步退步、多助寡助这些矛盾。速胜论者则从另一个片面出发，他们或者看不到敌强我弱这个矛盾，而只强调大国小国、进步退步、多助寡助这些矛盾；或者夸大中国的长处，抹杀中国的短处；或者把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看成整个强弱现象。

上海战争（第409页）

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开始的日本进攻上海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夏季，日本在华北准备发动武装进攻，同时就策划进攻上海。同年八月九日，日军官兵二人驾车冲入上海虹桥机场挑衅，机场卫兵不得不开枪阻止，把他们当场打死。日本以此为借口，对上海发动进攻，大批日军陆续登陆，飞机也出动在京沪线的上空侦察。十三日，日军以租界和黄埔江的军舰为作战基地，向闸北一带炮击，中国军队奋勇抵抗。

徐州战役（第410页）

指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五月，国民党在徐州地区组织的一次战役。当时，日军集中兵力企图夹击国民党部队于徐州附近。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一战中取得了胜利。台儿庄一战，冲昏了国民党一些人的头脑，速胜论调更加传播开来。他们宣扬徐州战役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正当国民党大吹大擂和把大量兵力集中于徐州前线的时候，日本侵略军乘隙从徐州两翼迂回插入，切断了国民党军队的后路，形成了对徐州的包围，结果使国民党军队立即陷入极端混乱之中，几十万大军迅速崩溃，徐州也在五月十九日失守。徐州战役之后，国民党速胜幻想迅速破灭，于是又陷入了亡国论。

汉奸托派（第410页）

汉奸，泛指那些投靠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充当其走狗，出卖祖国利益的中华民族败类。托派，托洛茨基派的简称。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列宁主义的政治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国际性的反革命匪帮。一九二七年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托派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人相结合，接受托洛茨基的指令，从事各种破坏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活动。

芦沟桥事变（第411页）

亦称“七七”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北平西南的宛平城搜查，并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遭到中国驻军的拒绝，日军即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中国驻军，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命令，奋起还击。七月八日，我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在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于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也被迫宣布对日作战。从此，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便开始了。

西安事变（第411页）

亦称“双十二”事变。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

侵略，但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在此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拒绝了张、杨的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乘机策划大规模内战，企图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进一步投降日本。中国共产党从抗日的民族利益出发，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去西安调解，经过和蒋介石谈判，迫使蒋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给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第414页）

这个“决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党中央洛川会议上通过的。全文有八条，主要是指出了七七事变以后，全国已进入抗战的新阶段，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决定”批判了国民党害怕人民、限制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号召共产党员抗日民众和武装力量，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用最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第416页）

二十世纪初，日本进入帝国主义国家行列。它在一开始就具有军国主义色彩。它把从别国掠夺的巨额物资，大部分用于海陆军扩建及装备，发展与军事生产有关的重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成为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它对内无限制地增加军费，军需工业畸形发展，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强迫人民服兵役，加强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实行军事独裁；对外加紧镇压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干涉、破坏他国主权，进行颠

复活动，以致疯狂发动侵略战争。

在日本，垄断资本不但与军国主义，还同国内的封建残余密切结合。由于明治维新自上而下改革的不彻底性，农村仍保留着大土地所有制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这种封建剥削关系也被带到城市的资本主义企业里。契约劳动非常普遍，甚至可以买卖女工。在政治上，地主和封建军阀仍占统治地位，他们与财阀一起实行联合专政；在思想上用封建武士道精神麻醉人民。因此说“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个特点就决定了侵华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经验（第420页）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爆发了反对沙皇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孟什维克的分裂和背叛行为，无产阶级本身未能实现统一，从而未能充分发挥革命的主导力量和领导作用。同时，由于一部分农民受封建皇权和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对沙皇和国家杜马（即议会）抱有幻想，在革命行动中过于散漫缓和和不够坚决，因而没有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再加上沙皇及其帮凶德、法、奥、英、美等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而失败。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总结一九〇五年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了党的领导，深入地发动群众，密切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团结，才取得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在俄国，没有一九〇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用以说明革命斗争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流年（第430页）

旧时算命看相的人，称一年的运气为“流年”。毛泽东同志这里说“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是指谁也不好预测中日战争每个阶段的具体情况。

张伯伦的“现实主义”（第433页）

张伯伦，一九三七——一九四〇年期间担任英国首相。一九三八年张

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承认墨索里尼侵占阿比西尼亚(现名埃塞俄比亚),默
认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同年九月,缔结慕尼黑协定,执行纵容德、意法西斯
侵略的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被迫卷入战争,不久张
伯伦下台。这里所说的张伯伦的“现实主义”,是指张伯伦承认法西斯对外
侵略的既成事实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抗日战
争的相持阶段中,当日寇占领大片中国领土之后,国际上也可能有要求承
认日本侵略的既成事实的这种“现实主义”出现,但总的形势将更有利于
中国抗战,经过我们的努力,就会改变这种“观点”,夺取抗战的最后胜
利。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449页)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内容为:(1)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
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
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
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代表我党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
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抗战建国纲领(第449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召
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内容包括抗
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特别是规定了组织国民参政机关,
对于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给以保障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坚
持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所谓的抗战建国纲领只不过是一
纸空文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第456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两个对抗的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之一(另一个是以德

国为首的同盟国)。最初由“俄法同盟”(1893年)、“英法协约”(1904年)、“英俄协约”(1907年)三个条约的成员组成,战争期间先后共有美、日、意等二十五国加入。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退出。在战争中协约国取得了对同盟国的胜利。

盖然性(第458页)

指有可能性但又不具有必然性。毛泽东同志这里说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带所谓“盖然性”,是指认识掌握战争的客观规律比较更加困难。

消耗战(第468页)

军事上的消耗战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指逐渐消耗敌人力量的作战。目的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变劣势为优势,最后战胜敌人。二是指给敌人以消耗而自己付出一定代价的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作战。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所说的我军进行的消耗战,大都是从第一种含义上讲的。毛泽东同志认为,由于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我军还不可能从战争全局上进行战略进攻,消灭敌人全部或大部,只能通过消耗战逐渐消耗敌人的力量。而要达到此目的,又只有通过战役或战斗的歼灭战才能实现,即只有通过局部上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才能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的目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历来主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略上应进行消耗战,而在战役或战斗中则应多进行歼灭战,战役上的消耗战只应起辅助作用。

李服膺(第475页)

阎锡山所属晋绥军第六十一军军长。一九三七年九月,日寇占领大同时,李所率部队在敌人尚距几十里时,即望风而逃,向雁门关以南溃退。在全国抗日军民中造成极坏影响,阎锡山为解脱自己的罪责,被迫在一九

三七年十月将李服膺杀掉。

韩复榘（第475页）

韩复榘（一八九〇——一九三八），国民党军阀，原在冯玉祥部下任师长、军长。一九二九年投靠蒋介石，任河南省主席。一九三〇年任山东省主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在日寇大举进攻山东时，他忠实执行蒋介石的投降卖国路线，不战而逃，把山东拱手交给日本侵略者。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卖国政府的愤怒声讨，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把韩当做替罪羊枪毙。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仅是从李、韩不抵抗日本，实行逃跑主义的意义上讲的，至于蒋、阎杀掉李、韩的动机是比较复杂的。

南京失陷（第479页）

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消极防御战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南京陷入日军包围之中，国民党部署在城内和近郊的十五万大军惊慌失措，仓惶撤退，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刽子手逢人就杀，见房就烧，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血腥屠杀，杀害我军民三十多万人，使当时近百万人口的南京几乎变成了人迹稀少的废墟。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惨案。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铁证。

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第479—480页）

马德里，西班牙首都。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国会选举，包括共产党、社会党在内的人民阵线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但以佛朗哥为首的叛军发动内战，并勾结德、意武装干涉者，先后于一九三六年

和一九三七年三次进攻共和国首都马德里，西班牙人民在人民阵线领导和发动下，为保卫共和国，保卫马德里而浴血奋战。一九三九年三月马德里失陷，共和国被颠覆。但西班牙人民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是永远值得学习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是指中国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动员，在什么地方达到当时西班牙人民保卫首都那样的程度，我们就能组织一些象保卫马德里那样的著名战斗，来打击侵略者的气焰，推动全国抗战。

《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历史背景

《战争和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阶段。这篇著作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发表的。

从“七七”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陷的一年零三个月内，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结果，国民党军队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一直退到四川，大半部中国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而党所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执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解放区战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八路军、新四军进一步壮大和发展，建立了人口达五千万以上的十几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抗击着四十万日军（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使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遭到了彻底破产，从而使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在党内，一九三七年十月王明由苏联回来，就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集中了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倾向，反对党的洛川会议确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一九三八年三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以及此期间的文章中，提出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要是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吹捧蒋介石是“抗战领袖”，反对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的区别；极力反对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放弃党的领导权；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

服从统一战线”；在军事和党的工作重心问题上，轻视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轻视游击战争的作用；把抗日战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在组织纪律上严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他所把持的长江局变成与党中央对抗的独立王国。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在王明负责的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东南局工作中，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例如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失守以后，党中央指示要求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开创华中抗日根据地，以便和华北连成一片。但王明等人拒绝中央指示，回电中央，表示党的工作中心是“保卫武汉”，而不在农村，战略方针是正规战，而不是游击战，并主张“华北八路军集中起来攻城市”，以致丧失了长江流域发展新四军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时机。很明显，要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就必须及时克服这条错误路线。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方针，批判和纠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2—505页）是结论的一部分，其中阐明了党的领导权问题，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坚决地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战争和战略问题》是结论的另一部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条件，阐述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

通过回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党的三次军事战略转变，强调了必须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适时地转变党的军事战略；同时，进一步阐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毛泽东同志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系统说明，使全党在思想上和行动取得了统一。

《战争和战略问题》注释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第513页）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陈独秀推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武汉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撤消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职务，坚决地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这次会议使党在认识军队问题的重要性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第513页）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全党并未对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加以彻底清算。以王明为首的一些人，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向中央施加压力，以达到其“改造领导，改造中央”的目的。一九三一年一月，他们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从各方面压迫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结果是接受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路线，使王明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我党历史上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

《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背景

《新民主主义论》写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在《中国文化》的创刊号上。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反对派改变了对策，由原来的军事进攻为主转而采取政治诱降为主；英美加紧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他们的反共活动。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成立了防共委员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方面在军事上向我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也向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搜罗一批反动文人，开动宣传机器，重新弹起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滥调，狂叫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时他们还竭力宣扬“一次革命论”，高唱基马尔主义，叫嚣什么“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

国民党反动派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猖狂进攻，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党内的一部分人发生了影响。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进攻面前，犹豫动摇，力图走“中间道路”，幻想在抗战胜利以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党内的王明等人则变本加厉地坚持推行他们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投降主义。正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

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正是在这一形势下，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进攻，为了向全国人民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以便彻底剥夺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一切追随者的精神武装，而给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装，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间，分别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滥调和党内的右倾错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运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树立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这一著作发表以后，对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在思想文化上的进攻，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论》注释

观念形态（第624页）

观念形态，即社会意识形态。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

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和新范畴的民主主义（第626页）

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旧民主主义，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这种理论，以维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纲领。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劳动人民并未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在我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期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例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奉行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理论纲领，都属于旧范畴的民主主义。

新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理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

大的道路。我国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范畴的民主主义。

社会形态 （第627页）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观点，以及适合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的整体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已经历过的五种基本形态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由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及中日战争和各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国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发生改变，无论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等都具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所以，《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

中法战争（第627页）

一八八三年（清光绪九年），法国政府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并向驻越南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清政府屈辱妥协，与法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一八八四年六月，法军向谅山的中国驻军进攻；八月，法国舰队向台湾进攻，并在福建马尾港击沉七艘中国兵船。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起用冯子材、王德榜等，抗击法军。一八八五年三月，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大败法军。但腐败的清政府却在胜利之后，授意李鸿章与法国签定了屈辱的《中法新约》。

国体（第637页）

国体，国家的阶级实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任何国家都实行一定阶级的专政，不同阶级的专政形成不同的国体。例如，奴隶主阶级专政、地主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都是国体。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体。他指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

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只能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体制。

政体（第637页）

政体是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就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任何统治阶级为了反对敌人，保护自己，都必须采取一种适当的政权组织形式。政体是与国体相适应的。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国体相同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政体，但都体现一定阶级的专政。毛泽东同志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适合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可以充分体现革命人民的意志。

节制资本（第639页）

节制资本就是把私人资本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是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提出的一个口号，是他民生主义的纲领之一。他主张凡私人企业有垄断性质，或者规模过大，私人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等等，由国家经营管理，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经济的命脉。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的内部经济关系时指出，节制资本是我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平均地权（第639页）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针，是民生主义的纲领之一。他主张用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的办法，消除地主从地租及地价增涨中获取暴利的非法剥削。一九二四年又进一步提出，农民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应当给予土地，资其耕作，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的内部经济关系时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应该实行“平均地权”的方针，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的经

济关系。这就使平均地权的口号具有了彻底的革命内容，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土地纲领。

基马尔主义（第641页）

基马尔是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23——1938）。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基马尔为首的商业资产阶级领导了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苏联的援助下，战胜了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希腊对土耳其的侵略，于一九二三年成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共和国。但是，土耳其的这次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它实质上是反对农民和工人，阻碍人民革命的。基马尔政权成立后，就开始镇压工农运动，向帝国主义妥协，靠拢，最后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基马尔的这种企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模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的思潮，被称为基马尔主义。

一九二七年我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以及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曾竭力高唱过这种基马尔主义，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批驳了这种谬论。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这种阴谋很快宣告破产。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第643页）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为了向日本妥协投降，加紧了反共活动。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以防共反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通过了蒋介石所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二月，国民党又秘密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动文件。在这些反动文件中，规定要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敌后根据地的一切抗日军政组织，要在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建立反共据

点和施行保甲制度。

人莫予毒（第644页）

毒，伤害；予，我。人莫予毒，意思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自己，转意为我想怎样就怎样，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用“‘人莫予毒’的派头”辛辣地嘲笑了国民党顽固派不听中国共产党的劝告，一意孤行，专横跋扈，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狂妄企图。

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第648页）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总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最初提出于一九〇五年。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即文中所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主要精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新三民主义中改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内实行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民权主义是他提出的关于政权问题的纲领。主要内容是主张推翻满清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新三民主义中改为政权归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一切自由和权利只给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和团体，凡效忠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者均不得享有。

民生主义是他提出的经济纲领，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重新解释时发展了平均地权思想，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

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

民生史观（第649页）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们把“民生”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古今人类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正由于人的求生欲望和本能才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这种民生史观的产物。

孙中山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相信人类社会一定会进步，会走向光明，主张“唤起民众”、“扶助农工”，进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革。但是他离开社会的基本矛盾，超脱阶级斗争，把历史的重心看成是“民生”，而不是物质；他的“民生”，既是指社会物质生活，又是指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因而具有二元论的色彩，从根本上说是唯心主义的。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

平民文学（第660页）

“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口号。它反对旧的封建的文化，提倡文学的“大众性”。但这种平民文学的大众化范围，在当时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

叶青，张君劢等人的反动（第663页）

叶青是叛徒托派分子。张君劢，当时因为他热衷于鼓吹“精神文化”的“玄学”，人们都叫他“玄学鬼”。这两个人都是抗战时期的反动政客、文人。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失守以后，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阶级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一些反动文人也公开活动积极反共。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张君劢就在蒋介石授意下，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叫嚷要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到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的这种反动论调更加猖獗。与此同时，叶青也跳出来诬蔑“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等等。

《论联合政府》的历史背景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

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都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苏联红军从一九四四年向德国法西斯发动总反攻，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不仅把德国侵略军全部赶出苏联国土，而且包围了德国首都柏林，正在准备发动对柏林的最后攻克。英、美军队乘势也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在法国北部登陆，与法组成联军，开辟了第二战场，正式对德作战。

在国内，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大反攻的前夜。一九四四年春，我各敌后解放区对日寇开始局部反攻，到一九四五年春，日寇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已处在我军包围之中，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确定。但是，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抗战以来一直推行一条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他们在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妄图在抗战胜利后，发动新的大规模内战，抢占人民胜利果实，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为此，他们玩弄“召开国民大会”

“还政于民”的骗局。蒋介石还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法西斯主义，诬蔑共产主义，叫嚣要在两年之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

这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将

是什么样的前途。是继续回到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旧中国，还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光明的新中国。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中国处在这样严重转折关头时召开的。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

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国共两党统一和分裂的历史，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指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坚持独裁是抗拒历史潮流的，也是没有前途的，而中国共产党主张由各个革命阶级组成联合政府，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才是顺历史潮流，才有光明前途。为实现这个光明前途，毛泽东同志为我党规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马列主义政治路线，在这个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不仅夺取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为粉碎蒋介石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内战，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夺取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做了充分的政治上、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

《论联合政府》注释

法西斯（第980页）

指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最反动、最野蛮的公开恐怖，它对内残酷迫害和屠杀人民，对外疯狂地发动侵略战争。法西斯专政最早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以墨索里尼为首领。以后又流行于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第982页）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五年，法西斯国家德、意、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开始是德、意、日和英、美、法两大政治集团之间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随着欧亚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苏联参加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转变为反法西斯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在战争中，以中、苏、美、英、法五个大国为主，结成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最后取得了胜利。

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第983页）

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之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人民和国民党在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这些武装统称抗日义勇军，一九三二年曾发展到三十万人。由于这些部队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没有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又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采用游击战术，本身组织涣散，成分复杂，内部矛盾重重，到一九三三年春，除一部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外，其余大部在日寇的猛烈进攻下很快就瓦解了。

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其中包括

一部分接受党的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这些抗日武装在东北人民的支持下，艰苦奋斗，不断壮大。一九三四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把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等先后改建成十一个军。一九三五年二月，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在党的领导下，这支武装力量长期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第983—984页）

十九路军是国民党的军队，总指挥是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是蔡廷锴。“九一八”事变后被调往上海驻防。东北沦陷后，日寇积极准备侵犯上海，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日本的新阴谋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奋起抗战。仅头两天激战，中国军队就夺回天通庵、北站等地，击毙日军千余名，粉碎了日寇扬言在四小时内占领上海的狂言。在这次抗战中，许多士兵、工人、青年学生，积极参与，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上海军民孤军奋战一个多月，使日寇四次更换主帅，死伤万余，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短期内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蓄意破坏上海抗战而对日寇无耻妥协，不给十九路军援助，迫使十九路军于三月三日退出上海，日本侵略者便占领了淞沪。五月五日，蒋介石反动集团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一九三三年在热河、察哈尔的抗日同盟军（第984页）

热河、察哈尔的抗日同盟军，即察、绥抗日同盟军，是冯玉祥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抗日队伍。

热河和察哈尔是旧省名，今分别并入河北、内蒙、辽宁和河北、山西。一九三三年春，日本侵略者攻占热河，向河北、察哈尔进犯，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这年五月，原国民党将领冯玉祥、吉鸿昌（共产党

员)、方振武等,以国民军旧部为基础,在张家口成立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支持下,抗击进犯察哈尔的日、伪军,收复了宝昌、沽源、多伦等地,部队发展到十余万人。八月,在蒋介石的破坏和威胁下,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吉、方等宣布成立抗日讨贼军,继续在热河和长城一带抗击日、伪军。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夹攻下,至九月底失败。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国民党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第984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孙中山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合作,组织北伐军,连续击败北洋军阀的反动军队,革命风暴席卷南部半个中国。国内外反动阶级看到北洋军阀即将覆灭,大为恐慌,便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物色代理人。隐藏在革命队伍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密谋策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蒋介石就与白崇禧、汪精卫等人举行一系列反共会议,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准备。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四月十五日,留守在广东的李济深等人也举行反革命政变。他们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惨案。随后,国民党反动集团还在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相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政策,把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排斥出国民党。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第一次大革命终于失败。

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第986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为了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阐明了党的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强调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这次会议，批准了一九三五年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第986页）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大举南进，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失利后，向豫东、皖北撤退。八月，日军以三十五万兵力沿长江南北两岸分兵五路西进，并以海军溯江而上配合陆军夺取武汉。国民党军队以三倍于敌的兵力进行所谓武汉保卫战。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对发动人民抗战，采取片面抗战的路线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术，仅在九宫山、大别山等地阻击敌人。结果日军于十月下旬攻占鄂城、信阳、逼进大冶、黄陂，对武汉三镇形成三面包围。国民党军队即于十月二十五日撤出汉口，二十六日撤出武昌，汉阳也随即失陷。武汉的失守，是国民党采取的压迫人民的片面战争的结果。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第992页）

抗战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将原来对国民党采取的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政策，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并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英、美也企图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日本，蒋介石集团则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设立“防共委员会”。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实行“政治限共”的同时，还加紧了“军事限共”，在山东、河北、湖北、河南等地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杀害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干部、战士。针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同志及时向全党指出，国民党的投降倾向已成为时局的主要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成为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为从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作好准备，以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

受意外损失，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党中央发表了纪念抗战两周年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领导全国人民与国民党的反动投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使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第992页）

一九四四年，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上已经陷入了相当不利的地位，为了使中国大陆的日军和孤悬在南洋的日军联络起来，并且准备在中国大陆上作最后挣扎，日寇发动了打通从北京到广州、南宁的大陆交通线战役。在这一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表现得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日寇只用十多万兵力，就使国民党数十万兵力土崩瓦解。短短八个月，日寇就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的大部分和贵州的一部分，六千多万同胞陷于日寇的铁蹄奴役之下。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结果。

曲线救国（第993页）

指抗日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执行的“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抗日”的联日反共卖国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他们觉得公开投降日本、反对共产党会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便以所谓“曲线救国”的骗人宣传，先后指使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解放区。这一反动政策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终于破产。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第994页）

西安事变后，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提出了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

证。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商讨对共产党及对日本的政策。宋庆龄、何香凝等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和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一个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此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继续和国民党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和准备对日抗战等问题。芦沟桥事变后，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保卫华北，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国、共两党在抵抗外侮上亲密团结。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并约定由国民党通讯社发表。《宣言》中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但国民党接到《宣言》后，一直拖延，不予发表。后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强大压力下，经我党的不断批评和督促，国民党当局迫不得已，才于九月二十二日将《宣言》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不论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还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上，完全实现了这一宣言。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千方百计地阻挠宣言的实行，破坏国、共合作。

先亚后欧论（第995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反动主张。一九四三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国法西斯开始节节败退，陷于灭顶之灾。在此战局急转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非常惧怕德、意、日法西斯一齐垮台，自己的法西斯独裁专制被彻底推翻。因而主张叫苏联去单独拚希特勒，并挑起日寇去攻苏联，叫英、美不要在欧洲开辟第二、第三战场，而把全力集中在亚洲，先把日本打垮，再把中国共产党消灭掉，然后再去解决欧洲的问题。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名为抗日，实为准备内战的“先亚后欧论”。

一九四四年九月的国民参政会（第1000页）

国民参政会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在广大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的压力下，不得不设立的咨询机关。它形式上包括各抗日党派的代表，实

际上主要成员是国民党员，是国民党的御用工具。中国共产党派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为参政员。国民参政会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会议。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同志明确地提出了立即召开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

训政（第1016页）

即孙中山先生设想的建立民国的三个程序中的第二个程序。孙中山曾把建立民国的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训政时期，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协助各县筹备地方自治，一省内全部县已实行自治时，才可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全国过半数省份开始实行宪政时，才能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以训政为名，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实行法西斯的一党专政，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第1020页）

袁世凯，北洋军阀首领。他因出卖戊戌维新运动而深得慈禧太后的宠信。一九〇一年继李鸿章后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他以实行新政为名，扩编北洋军为六镇。辛亥革命时，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任内阁总理大臣，出兵向革命党要挟议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要挟清帝退位，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建立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并培植党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为了实现专制统一，逆时代潮流而动，复辟帝制，做了八十三天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主要首领先后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錕、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先是段祺瑞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一九一七年，张勋演出了复辟的丑剧；此后，北洋军阀的头目走马灯似地先后占据统治地位，都想建立以自己为首的封建王

朝，将全国统一于自己专制统治之下。军阀之间不断发生混战，其结果“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第1021页）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仍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一九四二年夏和一九四三年冬，先后两次派代表到重庆会谈，都因国民党反动派缺乏诚意而毫无结果。一九四四年春，我党又派林伯渠同志先到西安，后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并向国民党提出了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二十条意见。当时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认为二十条意见“无异暴露国民党之罪状”，拒绝转呈国民党政府。后林伯渠同志又请示我党中央，在文件上只写关于民主政治及编军、停攻、停封锁等十二条，其余八条改为口头要求。六月五日送交张、王。张治中、王世杰亦在同一时间将国民党的所谓“提示案”交给林伯渠转我党中央。这个“提示案”不回答我党的各项要求，却不顾抗战需要，要将我军十个师以外的数十万军队“限期取消”，并要将十个师“限期集中使用”，取消解放区民主选举的抗日政府。这些无理的要求，被我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中国民主同盟（第1021——1022页）

简称“民盟”，爱国民主党派之一。一九四一年成立，其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二五减租（第1025页）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的一种减租减息政策，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定租额减去25%。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曾决定实行二五减租，但因国民党官僚与地主阶级勾结，一直未能实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

区，真正实行了这项政策，从而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群众抗日和生产积极性。

国民党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第1033页）

抗日战争期间，驻在内蒙古伊克昭盟的国民党反动派二十六师陈长捷所部，奉行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解散当地各种抗日团体，杀害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排挤倾向抗日的蒙古族骑兵部队。一九四三年三月，扎萨克旗、乌审旗等地蒙古族武装部队及蒙、汉各族人民，为了捍卫抗日民主权利，反对民族压迫及其它反动措施，实行武装反抗。但却遭到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事件发生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坚决斗争，才制止了他们的暴行。

国民党一九四四年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及对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第1033页）

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奉行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新疆柯克托海县、青河等地的人民举行武装起义，遭到了国民党盛世才的残酷镇压。一九四四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强迫伊犁、塔城等地牧民捐献一万匹骏马，激起了牧民强烈不满，九月二日，尼勒克境内的哈、维等族人民，发动了反对献马的起义。紧接着，伊宁市也爆发了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都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血腥镇压。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甘肃省海原、固原的回族农民为争取抗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先后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参加人数最多时达三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间，甘肃临夏、临洮一带的回、汉等族农民，也举行暴动，参加人数达十万多人。这些暴动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后，大批群众投奔延安。